荣新江 著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學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旭辉　　封面设计　孙　曙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
ISBN 978-7-309-07419-2
9 787309 074192 >
定价：22.00元
www.fudanpress.com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荣新江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荣新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309-07419-2

Ⅰ. 隋…　Ⅱ. 荣…　Ⅲ. 长安(历史地名)-文化史-研究　Ⅳ. K29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3797 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
荣新江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125　字数 117 千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19-2/K·292
定价: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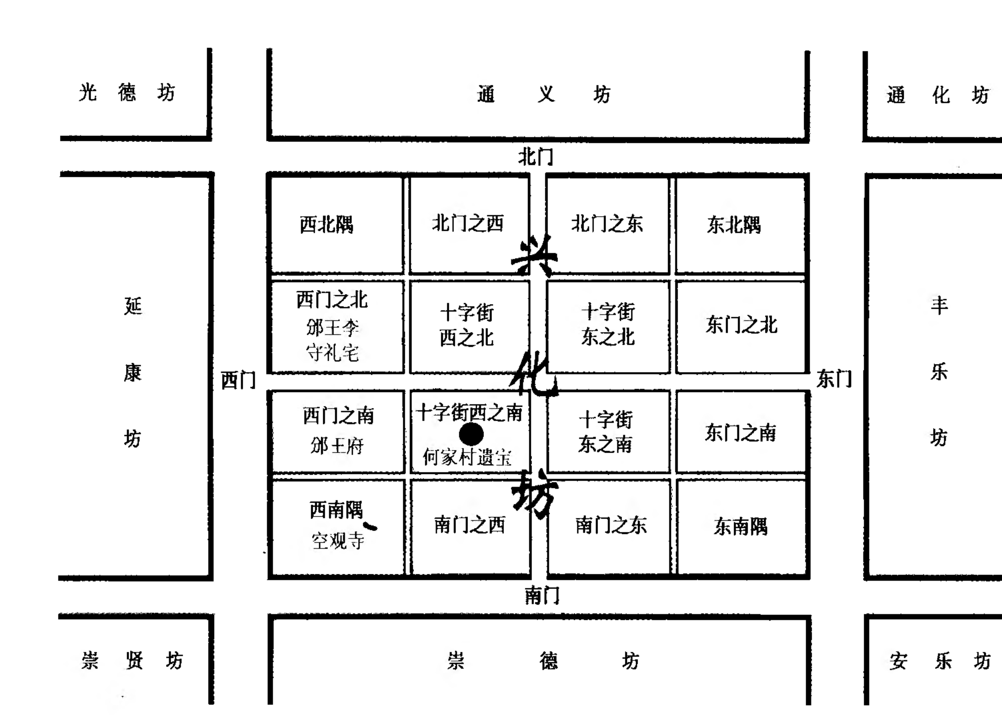

光德坊
通义坊
通化坊
北门
西北隅
北门之西
北门之东
东北隅
兴
延康坊
西门之北
邠王李守礼宅
十字街西之北
十字街东之北
东门之北
丰乐坊
西门
化
东门
西门之南
邠王府
十字街西之南
何家村遗宝
十字街东之南
东门之南
坊
西南隅
空观寺
南门之西
南门之东
东南隅
南门
崇贤坊
崇德坊
安乐坊

图2 兴化坊复原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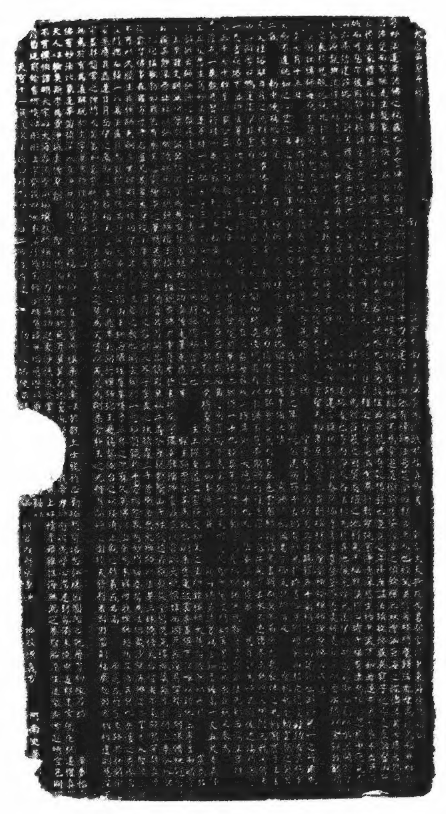


图3 原在长安千福寺的《多宝塔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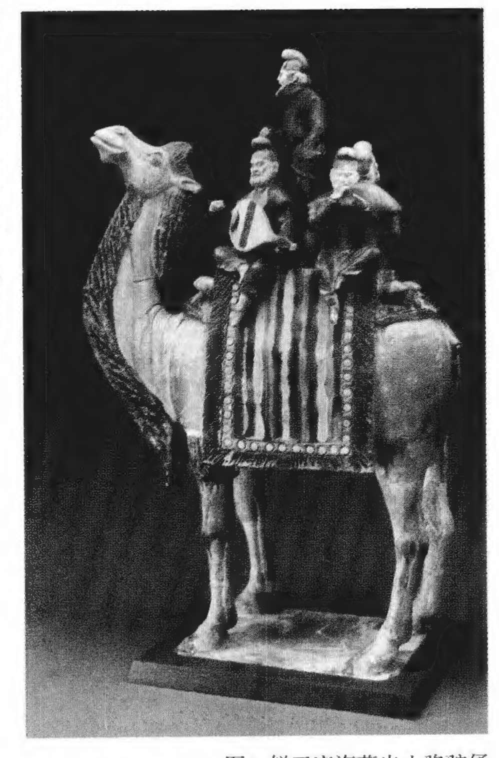


图4 鲜于庭诲墓出土骆驼俑



图6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头戴帷帽的骑马女俑



图8 段蕳壁墓头扎带子侍女

图9 新城长公主墓系抹额捧蜡烛盘侍女



图11 阿史那忠墓怀抱弓、箭囊的侍女



图13 薛儆墓捧包裹侍女



图14 苏思勖墓手持如意侍女



图16 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

图20 高足杯



图21 素面银碗



图26 《清明上河图》中的牵驼人



图27 《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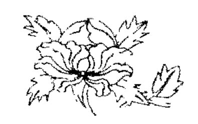


图30 敦煌发现的唐代牵驼画像砖



图31 益都北齐墓发现的牵驼胡人像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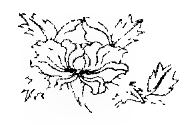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小序



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是隋唐史，但是我那时的兴趣在隋唐的西北史地，更确切地讲，集中于西域的于阗国史和敦煌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政权。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主要是做敦煌文书的研究，因此对于隋唐史的一些核心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记得田余庆先生多次告诫我，一只脚要踏出去，另一只脚要站在中原，他的意思是不要忽略了中国史的基本问题。

在各种各样的唐朝历史的舞台中，西北固然重要，但与于阗、敦煌相比，都城长安无疑是演出唐朝历史故事的最大舞台。所以，我选定长安作为自己研究隋唐史基本问题的出发点，因为长安是我们隋唐史研究者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用来探讨的场域。1995年，我提交给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唐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敦煌文化与长安文化》，但并没有写成正式的文章。一方面，我虽然想“告别”敦煌学，但敦煌研究毕竟是我用功较多的领域，我与敦煌学界的联系也最为密切，一些学术会议要参加，一些纪念论文要撰稿，所以无法“脱身”；另一方面，我从敦煌吐鲁番资料出发，更多地转向汉唐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从1992年发表《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开始，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古时期来华的粟特人。好像冥冥中有神在安排，1999年我发表《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的同时，太原发现了虞弘墓，转年西安发现安伽墓，随后史君、康业墓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也随着一股“粟特热”，写了一系

贡献。当陈平原先生建议我给“三联人文书系”写本十万字的小书时，我就想到了这些陆续发表的、在我长长的已刊论著目录中非常不起眼的“长安学”论文来，把他们集合起来，便于向隋唐史、“长安学”的学者请教，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鞭策自己：现在，自己已经在为“长安学”大厦的建造垒上了一块砖，作为一个起点的标志，应当在这一领域继续添砖加瓦。

最后，我要感谢提供照片的单位和私人；感谢帮我整理稿件的李芳瑶同学；也感谢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陈翠玲女士接纳这本小书，应她的要求，写几句关于选文的闲话，以便读者理解这些文章撰写的缘由。是为序。

荣新江

2009年2月12日于香江

简体字版题记

本书出版不到一年，欣闻复旦大学出版社打算出版简体字本。因为对于大陆的学者特别是学生来说，港版还是比较贵的，而且在内地买不到。书中的《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和《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也没有在大陆发表过，所以我听说了出版简体字本的消息，着实地感到高兴。而且听说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把香港三联的黑白图版变成彩色图版，更让我为他们的热情和用心由衷地表示敬意和感念。

本书的文字没有变动，仅对港版的个别错字做了订正。

最后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张旭辉先生，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改版和校对工作。

2010年7月于北京

列的有关入华粟特人的活动及相关文献、图像研究的文章。

记得1998年王静来跟我读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我当时就说我们一起研究长安吧。可是，王静从硕士到博士，2004年7月毕业时，她已经在长安研究的领域有了一些贡献，而我却没有真正投入到长安的研究中来。还好，我在北大历史系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后来也叫"隋唐长安读书班"）由于许多博士、硕士生和年轻教师的参与，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而且部分成果发表在2003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上。我在这个专辑的前面，写了《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阐发了我对隋唐长安研究的一些想法，特别强调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有待推进：一、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二、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三、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四、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也就是说，要用新的视角，来审视长安，推动"长安学"的研究；以长安为平台，来讨论隋唐史的各个方面，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长安，是个巨大的舞台，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讨论，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观察，可以利用多种史学方法来加以分析，可以撰写不同类型的史学著作。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指导下，我陆续写出《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等论文，希望从性别、物质文化、历史记忆、社会变迁等研究视角，来描写唐朝长安乃至整个唐朝的某些历史画面。这项研究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文章也往往是为了应某个学术研讨会而写成，所以没有什么系统，但在我的研究理路中，这些是我多年来阅读长安史料的一点体会，也是我对"长安学"的些许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图34 王芳媚墓志



图32 妹尾达彦教授的长安西市复原图



图28 《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2）



图29 《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3）



图25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授戒牒

图22 药盒



图17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扮男装骑马俑



图18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



图19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猎豹狩猎男俑



图15　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图12 永泰公主墓女性群像



图10 新城长公主墓捧卷轴侍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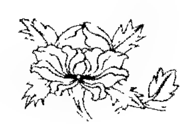


图7 韦浩墓侍女所戴高顶翻毛胡帽



图5 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上的羃䍦

目录





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

一、隋大兴城——宇宙之都

唐朝都城长安，承继自隋朝之大兴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在汉、晋、北周长安城东南13里处的龙首原，始建新都城。三年三月，新都初具规模，隋文帝即移入新城，自此翻开了中国历史走向盛世的新篇章。

大兴城主要是由富有巧思的宇文恺规划设计，参与建造的还有阎毗、何稠等人，这些建筑家都带有一些西域胡族的血统，但本人又生长于中华，一直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因此，大兴城的宫城和坊市的基本模式，应当取法于北魏太和以后的洛阳城以及东魏、北齐的邺南城，但建筑技巧则借助了西域的工艺，使城市既像大理石建筑一样宏伟壮观，又精准巧妙地符合中国传统都城建造所遵循的《周礼·考工记》的制度。

隋之大兴城、唐之长安城，作为中国古典时代理想的都市，规划成方形的城市布局(图1)。城内以坊墙为界，分成规整的108个棋格状的坊，其数字与《周礼》所言正合；城的北部是皇帝居住的宫城和百官衙署所在的皇城，皇城与南北干道成直角方形；东、西、南三面城墙各开三座城门，北面则是皇家禁苑；宫城的南面是“前朝”，左为宗庙，右为社稷；这些基本的规划布局，都是遵循着《周礼》规定的理想化都城的制度。

位于大兴、长安城的宫城——太极宫内侧的太极殿，就如同清朝紫禁城的太和殿一样，是皇帝主持重大朝政的地方，也是隋唐都城的核心。太极殿正对着北极星，天子上应天帝，受命治国。太极殿前承天门外的大街，即名承

天街，从承天门经过皇城的正门朱雀门，到长安外郭城的正门明德门，一条笔直的中轴线，构筑了一条国家礼仪的延长线，以皇帝所在的宫城为中心，整个长安都是左右对称的布局。因此，从都城设计上来看，长安的建设充分考虑了传统的礼仪制度的实施，是承接天帝旨意、遵循祖宗礼法的充分体现。大兴城在建造之初，可以说是为显示新王朝政权的正统性而建筑的"宇宙之都"。

二、唐长安城——生活之都

大兴城的设计者们，虽然是按照《周礼》的制度来建造新的都市，但新王朝的恢弘气度，给这座都市安排了广阔的居住空间，亦为随之而来的唐朝，提供了一个走向辉煌的舞台。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这里既有王公、将相、贵族的高门深宅，也有靠典当才得渡过年关的穷苦大众所栖息的陋室小屋；这里既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国际都会，也是各种宗教信徒传播教法、建立寺院的神圣道场；这里有各色商贩经营牟利的东市西市，也有科举考生借宿的旅店和寻欢的青楼。300年的唐长安，不仅是皇家庄重的礼仪举行的场所，也是市井百姓平凡生活的空间。

物质性的空间架构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社会关系结构的运作反过来又界定、限制或者调节了不同的空间发展趋向。长安城内部的居住构造，也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人员的流动、文化习俗的转移，而产生了整体上的分化趋势。到了被称作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长安的官僚、宦官、武将纷纷向朱雀街东移动，到安史之乱以后，从长安城总的地理空间来看，大体上是街东为官人居住和参政的地方，街西为平民生活和从事商

贸活动的场所。

然而，朱雀大街两侧，依然是进行皇朝礼仪必经的形胜之地，城市中最有影响的佛寺道观排列两边，如开化坊的荐福寺、靖善坊的大兴善寺和安业坊的唐昌观、崇业坊的玄都观。至少在开元、天宝年间，朱雀街两边四坊的范围内，居住着许多重要的人物：街东兴道坊有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李令问宅，安仁坊有玄宗第25女万春公主宅，崇义坊有秘书监马怀素宅、刑部尚书韦坚宅，长兴坊有太子宾客元行冲宅，永乐坊有左丞相燕国公张说宅，靖安坊有玄宗第22女咸宜公主宅；街西安业坊有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去奢宅（三戟张氏），太平坊有御史大夫王鉷宅，通义坊有右羽林大将军邢国公李思训宅，兴化坊有邠王守礼宅，宣义坊有张说别宅、右相杨国忠宅以及安禄山的池亭。

出土何家村珍宝窖藏的兴化坊（图2），位于长安朱雀门街西第二列第三坊，往北过两坊即皇城，东面隔一坊为朱雀大街，西北跨一坊即是西市。在盛唐之际，环视兴化坊的周边，我们就会看出，这一带曾经为皇家贵戚和高官贵族居住的黄金地带。

三、盛唐气象——从长安的物质文化侧面来看

自高祖、太宗削平隋末争霸中原的群雄后，唐朝进入稳步的发展，虽然太宗励精图治创下的进取西域等丰功伟业，险些断送在懦弱多病的高宗手中，但随之登极的武则天，以其空前绝后的气魄，以武周的名字，继承了大唐的衣钵，对内扩大了统治集团，给旧有的贵族体制补充了新的血液；对外拓展了中国的疆域，稳固了与外蕃反复争夺的安西四镇。这一切内政外交的举措，被取代武周政权的李唐王朝，特别是唐玄宗继承下来。唐玄宗和开元年间朝

野的各路精英，共同打造出大唐的盛世。

长安，作为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城镇。长安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以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贵族子弟，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他们惟恐佛教和道教占据了所有的信仰空间。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学校的知识传授、传教士和取经僧的共同努力，长安也成为精神思想最为丰富的空间。或许我们找不到孔孟、老庄那种类型的思想家，因而慨叹盛唐思想界的平庸，但如果我们有机会与长安佛寺中的高僧或道观中的尊师交谈，便会感到他们的思维更加接近神灵。

盛唐气象的造就，一方面归功于她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即对前此400年混乱的中国历史上生发的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的兼收并蓄。长安，既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遗产的承载母体，又是世界中古史上一朵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

在我们仔细品味何家村出土的盛唐珍宝之前，让我们先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去参观一下盛唐的一所“博物馆”和一个私家的“图书馆”。

长安如此广阔的生活空间，搜罗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我们翻阅《通典》所记录的天宝贡赋，或者

看看大明宫夹城内的口味贡封泥，在对唐朝帝王和贵族的淫逸奢华惊讶不已的同时，我们也定会颇感厌烦，那就一起去清净的佛寺和书斋走一走吧。

千福寺，位于长安宫城西第二列第一坊，原本是高宗武则天的次子——章怀太子的住宅。咸亨四年（673），舍宅立为佛寺。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对这所佛寺的描写如下（原小注放括号中）：

〔千福寺〕寺额，上官昭容书。……中三门外东行南，太宗皇帝撰《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西行，楚金和尚《法华感应碑》（颜鲁公书，徐浩题额）；碑阴（沙门飞锡撰，吴通微书）。东塔院（额高力士书）。《涅槃》、《鬼神》（杨惠之书〔画〕）。门屋下内外面，杨廷光白画《鬼神》，并门屋下两面四五间。西塔院，玄宗皇帝题额。北廊堂内，《南岳智顗思大禅师》、《法华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寿王主簿韩干敬貌，遗法弟子沙门飞锡撰颂并书）。绕塔板上，《传法二十四弟子》（卢棱伽、韩干画，里面吴生画，时菩萨现，吴生貌）。塔北，《普贤菩萨》、《鬼神》，似是尹琳画（相传云是杨廷光画，画时笔端，舍利从空而落）。塔院门两面内外及东西向里各四间，吴画《鬼神》、《帝释》（极妙）。塔院西廊（沙门怀素草书）。《天师真》，韩干画。此东塔，玄宗感梦置之。《楚金真》，吴画。《弥勒下生变》（韩干正画，细小稠闹）。院门北边碑（颜鲁公书，岑勋撰）。南边碑（张芬书）。向里面壁上碑（吴通微书，僧道秀撰）。造塔人（木匠李伏横，石作张爱儿）。石井栏篆书（李阳冰，石作张爱儿）。东阁，肃宗置（面东碑，韩择木八分书，王据撰）。《天台智者大师碑》（张芬书）。佛殿东院，西行南院（殿内有李纶画《普贤菩萨》，田琳画《文殊师利菩萨》）。

另外，《唐画断》还记有："千福寺西塔院有王维掩障。一画枫树，一图辋川。"这里之所以把《名画记》所有文字引出，是因为所陈列的书法、绘画作品，是我们今天在上海博物馆"晋唐宋元国宝展"上也无法亲睹之宝物，

其中只有少数属于天宝以后的作品，大多数是盛唐时的杰作。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东、西塔院的门额，出自玄宗和他的宠臣高力士之手笔，表明玄宗对这个寺的特别关注。通览一遍，不难看出这里应当是有意无意地汇集了盛唐时代声名显赫的一批书法、绘画和雕塑家的精品：如杨惠之、张爱儿的雕塑；吴道子、杨廷光、卢棱伽师徒的释道人物，宫廷画家韩干的佛道人物和经变画，王维的水墨山水；颜真卿的正书，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的八分书；真可谓应有尽有。所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甚至还有玄宗时特别推崇的道教天师像。虽然我们现在大多数已经无法得见真迹，但从现存碑林的颜鲁公天宝十一年（752）所书《多宝塔碑》（图3），可以看出这里所汇聚的美术品，绝不可等闲视之。我们把千福寺看作是一座盛唐时代的博物馆，应当是不过分的。

与千福寺同列一坊的，有玄宗时任云麾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鲜于庭诲宅。此一介武夫的墓葬在1957年被发现，里面出土一件精美的三彩驼俑，上面是一个主要由胡人组成的乐队（图4）。这件多年来一直摆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上的三彩精品，也可以折射出千福寺那些艺术巨匠们的水准和影响。

我们再去看看天宝年间集贤院学士、最早记载长安的专著《两京新记》的作者韦述的私家图书馆。《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记：

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

韦述出身于京兆韦氏，是唐朝长安附近有名的大家族。他少年时，家有藏书2000卷，笃志好学，又曾饱读其父之

姑子、当时大儒元行冲的藏书。后举进士，与元行冲等一道于秘阁详录皇家四部书。开元九年（721），与元行冲等编成皇家藏书目录《群书四部录》200卷。其间，韦述于课余抄录柳冲《姓族系录》200卷，期年后毕功，并在柳书基础上撰写《开元谱》20卷。开元十年撰成《两京新记》5卷。以后供职集贤院，先后勒成《国史》113卷，并《史例》1卷；二十六年参修《六典》成；天宝十五年撰《集贤注记》3卷。还有《唐职仪》30卷、《高宗实录》30卷、《御史台记》10卷，所著书凡200余卷，皆在世流行。

根据《唐会要》卷三五记载，开元十九年时的皇家图书馆——集贤院所藏四库书，计有89 000卷。两相对照，我们不禁惊讶于韦述一人竟至聚书2万卷。今天让多少学者穷毕生精力从事研究的敦煌藏经洞出土写卷，大体上是5万个编号，如果按古代书籍的一卷卷来计算，许多残片方可算一卷，5万号相加，恐怕未必多于韦述家藏之书。况且，韦家的书房里，不仅仅有图书，而且还有古今人物画像、名人图画、各种法书、尺牍，法令格式、钱谱、玺谱、药方等各种写卷或图卷，古碑、古器等实物，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称羡不已。有如此之书斋，于写作时即可信手拈来，得心应手。难怪他编撰的《两京新记》，于长安坊里寺观、人物、古迹，皆以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读后历历在目，而《长安志》以后的同类书只记某坊某宅而删掉相关故事，有时读之不免有枯燥乏味之感。

韦述书斋的收藏，对于我们理解何家村窖藏原本的性质或许有一些启发的作用。这批有意识地埋藏于地下的珍宝，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食器、饮器、盥洗器、日用品，质地以金银为主；还有炼丹用的大量药材和药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批显然是专为收藏之用的货币，从春秋时齐国的“节墨之法化”，到唐天宝十五年以前的“开元通宝”，

甚至有罗马金币、波斯银币，以及极其罕见的“凉造新泉”和“高昌吉利”。这些大多数属于盛唐时期的器物，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乃至皇族的生活侧面，也显示了盛唐物质文化的辉煌和工艺水平的精湛。如果我们把何家村的器物镶嵌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它们将被吸纳为空间的一部分。结合人的物质文化活动与器物本身的功能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器物本身已不仅仅只是物体，在其发挥作用的时空之内，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意识载体，其背后的文化心态、生活方式、社会背景却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历史的时空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这些器物的主人是谁？它们来自哪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透过那一尊尊熠熠生辉的金银器，一件件晶莹剔透的宝石，去寻觅、去探索。

2003年1月24日稿；原载齐东方、申秦雁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第47—53页

参考文献：

《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新唐书》卷一三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王溥：《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张彦远著，俞剑华注：《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五卷，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二卷,京都:法藏馆,1989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D.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 by 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第409—425、401页。
妹尾达彦:《长安の都市计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
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0—242页。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0—42页。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

隋大兴城亦即唐长安城[1]，既是从皇帝、百官到庶民、僧道的生活居住空间，又是帝国各项行政制度运作的舞台，这里是隋唐帝国的核心，因此，对于长安城的理解和研究，是我们研究隋唐时代许多方面的基础。

长安是隋唐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中枢，盛唐时代的长安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乃至当时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都。但从安史之乱开始，长安成为历朝历代军阀劫掠的对象，文化时聚时灭，加上自然力的破坏，使得长安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有关的典籍图书也大多散佚。唐代长安地面上的建筑大多早已不复存在，然而其昔日的荣光，仍然通过唐朝的地志、画史、碑记、寺塔记以及诗人的吟咏篇什、笔记小说的故事等等，多多少少地保留下来，让我们可以透过文献记载，去想象大唐都市的辉煌。

对于长安，我们已经拥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增补

有关长安的文献，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开元十年韦述撰《两京新记》残本和北宋宋敏求撰《长安志》，清人徐松以《长安志》为基础，参照其他相关文献，撰成《唐两京城坊考》，成为近人研究长安的奠基之作。在此基础上，近代以来，学者们在《两京新记》的校订、辑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

1 以下为行文方便，以长安城统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

绩[1]；并且遵循着徐松的做法，发掘古籍文献记载、考古调查成果以及新出土碑志资料，对长安宫室建筑、坊里住宅都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和考订[2]。

二、都城制度及其演变的探讨

长安以其宏大的城郭、整齐的宫城与坊里设计而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学者们为了追寻这种都城建筑设计的思想来源，提出了多种说法，探讨了从《周礼·考工记》所记城郭制度以及汉魏以来北方主要王朝的都城与长安城的关系[3]，虽然迄今尚无一个统一的看法，但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于长安城设计中折中取舍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因素的认识。

---

1 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原载《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36年，第503—521页，收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53—968页；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史语所集刊》第9本，1947年，第545—580页；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美术研究》第170号，1953年，第31—66页，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3年，第105—184页；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3页；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3—336页。

2 主要成果有张忱石《唐两京坊宅补遗》，《古籍整理与研究》1988年第2期，第38—72页；阎文儒、阎万钧编著《两京城坊考补》，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 主要观点见那波利贞《支那首都计划史上より考察したる唐の长安城》，《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0年，第1203—1269页；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二章附都城建筑，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Arthur F. Wright, "Symbolism and Func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1965, pp.667-679；田中淡《隋唐建筑家の设计と考证》，《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209—306页；妹尾达彦，"The Urban Systems of Chang'an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D. 583-907", *Historic Cities of Asia. 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Cities from Antiquity to Premodern Times*, Ed. by Muhammad Abdul Jabbar Beg, Malaysia 1986, pp.159-200；又《长安都市计划》，东京：讲谈社，2001年；Xiong Cunrui, "Re-evaluation of the Naba-Chen Theory on the Exoticism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Sui Capital",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987, pp.136-166；又"The Planning of Daxingcheng, The First of the Sui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7, 1988, pp.43-80；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79—285页；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兼论日本平城京的宫室制度》，山田庆儿、田中淡《中国古代科学史论(续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1年，第753—805页；傅熹年《隋唐长安洛阳规划手法的探讨》，《文物》1995年第3期，第48—63页。

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长安这种整齐划一的都城制度对于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1]，以及随着唐朝政治的发展，大明宫、兴庆宫的建立改变了长安的宫室格局，从而影响了唐朝中央的政治格局和制度变更[2]，甚至官人的宅第也逐渐从西街向东街转移，形成“东贵西富”的新格局[3]；而长安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旧有的坊里制度不再适应新经济体制和文化需求，从而导致了坊墙的突破和侵街现象的出现[4]。

三、考古发掘的成就

对于长安城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正确认识文献记载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并且把长安局部的研究细致到一砖一瓦。虽然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但我们已经从有关考古发掘的报告中，重新认识了唐长安城的地基、坊里的基本情况[5]，大明宫及其内部含元

---

1 参看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第647—656页，妹尾达彦《唐代の科举制度と长安の合格礼仪》,《律令制——中国朝鲜の法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239—274页；又《唐长安城の仪礼空间——皇帝仪礼の舞台を中心に》,《东洋文化》第72号，1992年，第1—35页；金子修一《唐の太极殿と大明宫——即位仪礼におけるその役割について》,《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44号，1993年，第52—64页。

2 参看佐藤武敏《唐长安の宫城について》,《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考古、美术篇》，东京：山川出版社，1976年，第227—241页；松本保宣《唐后半期における延英殿の机能について》,《立命馆文学》第516号，1990年，第71—115页；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构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又《唐代宫廷防卫与宦官权力渊源》,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58页；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第97—108页；又《中唐の社会と大明宫》,《中唐文学の视角》,东京：创文社，1998年，第339—356页。

3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第35—74页。

4 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陆杂志》第82卷第1期，1980年，第31—48页；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441—480页；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郭城街道及坊里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第1—25页；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312页；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48—306页。

5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第79—94页；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钻探组《唐长安兴化坊遗址钻探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43—4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安定坊发掘记》,《考古》1989年第4期，第319—323页。

殿、麟德殿的建筑布局在逐步澄清[1]，长安城明德门、含光门的基址有助于推测其壮观[2]，大寺院如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也部分揭露出来[3]，还有西市遗址、何家村窖藏以及扶风法门寺地宫等处的发掘[4]，都为长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实物资料。

四、历史地理研究的丰富成果

对于长安城及其周边地域的历史地理学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方面，大到长安城周边的环境变迁、自然山河对城市的影响、长安与各地的交通路线，小到坊里名称的变化，宫室、寺院或住宅的位置所在，都有不同层次的探讨[5]。

然而，相对于长安的重要性来说，我们对于它的研究还是非常不够的，涉及的方面也不够广泛。特别是多年来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第341—344页；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7期，第385—392页；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第30—48页；又《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第131—15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第341—406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1期，第33—39页；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考古》1977年第6期，第409—412页；又《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讨论》，《文物》1998年第4期，第76—87页；马得志《唐长安皇城含光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5期，第441—448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5期，第322—327、321页；又《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第231—262页；又《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第45—55页；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唐研究》第6卷，2000年，第337—352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年第5期，第248—250页；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0—42页；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第1—26页。

5 主要成果见武伯伦《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3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李之勤《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一辑），西安，1998年；又《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论文集第二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1999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又《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的长安研究，主要局限在历史地理、考古、都城建筑等学科范围，而没有和长安丰富的历史内涵结合起来。

笔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学的过程中，不断在思考一个问题，即长安是兴盛的大唐帝国的首都，敦煌是唐朝丝绸之路上的边陲重镇，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经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丰富的文献和图像资料，引发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热潮；相反，虽然有关长安的资料并不少于敦煌，但因为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发现，所以有关长安的研究远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样丰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学”那样的“长安学”来。然而，只要我们读一下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关于长安千福寺的记载，看一看《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关于其家藏文献文物的有关文字，我们就可以断言，敦煌资料的丰富远远不能和长安相比拟[1]。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惊叹于敦煌艺术的精美，那当年长安寺院的图画一定更加精美绝伦；如果我们说敦煌文献丰富多彩，那也只是长安寺院藏经阁或学者书斋的冰山一角。

为了追寻长安昔日的辉煌，笔者组织了《两京新记》读书班，希望借助这部开元十年的著作，部分复原盛唐长安的景象，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长安的社会、文化等等方面。

长安的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读书班更加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视角：

1 参看荣新江《盛唐长安：物质文明闪烁之都》，《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7—53页。

一、打破从北到南的长安文献记载体系，注意地理、人文的空间联系

因为自从《两京新记》以来，有关长安坊里的专书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叙述的，这种叙述方式必然影响到研究者对长安的理解，使得人们常常更多地考虑南北坊里之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与东西相邻坊里的联系。其实，由于长安北面是皇宫禁苑，虽然有南墙上的三座门通向城南广阔的天地，通向终南山，乃至巴蜀湘江。但从社会生活、东西交通等诸多角度来说，从金光门到春明门和从延平门到延兴门的两条大街，对于长安的意义更加重要。即使北面被皇城隔断的部分，东西的关联也大于南北，如《两京新记》记辅兴坊金仙、玉真二女观称："此二观南街，东当皇城之安福门，西出京城之开远门，车马往来，寔为繁会。而二观门楼、绮榭，耸对通衢，西土夷夏，自远而至者，入城遥望，窅若天中。"东西南北的道路，把一些里坊从空间上联系起来，使得坊和坊之间的一些建筑物得以归入一组，而坊里之间一些人物的交流情景也就浮现出来，这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有生动的写照[1]。

二、从政治人物的住宅和宫室的变迁，重新审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

过去研究发生在首都长安的政治事件的论著，很少注意事情发生的地点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所处的地理位置。陈寅恪先生曾强调玄武门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势高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性，是关注地理因素在政治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少有的做法。其实，不论是玄武门之变还是唐朝前期历次宫廷革命，皇帝和争夺皇位的双方所处的地点，都是

1 朱玉麒《隋唐文学人物与长安坊里空间》(《唐研究》第9卷，2003年)即从文学作品中揭示了许多长安坊里间的人物关系。

取胜与否的重要因素[1]。而仔细分析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的争夺皇权的斗争各方所居住的地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李氏家族和武、韦集团成员，是泾渭分明地分别住在宫城和皇城东西的大坊中的[2]。而唐玄宗以后不再发生皇子争夺政权的流血事件，和玄宗把皇子集中到长安城东北角的16宅加以集中管理有密切关系[3]。

唐朝中央的职官设置和运作，更是与相关职官的衙署密切联系在一起。开元时玄宗听政于兴庆宫，天宝以后诸帝转移到大明宫起居，都对唐朝中央官僚体制和权力结构产生重大影响[4]，其中内侍省从太极宫掖庭西南角隅之地，迁徙到大明宫右银台门内唐朝中枢神经的核心地带，为中晚唐宦官专权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空间[5]。从政治人物的活动地点和一些重要的官府所在地，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唐朝政治史的演进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

三、走向社会史，对于长安进行不同社区的区分并分析研究

前人已经总结出长安城内坊里“东贵西富、南虚北实”的特征，妹尾达彦先生对于唐朝官人从西街向东街的迁徙走向做过详细的研究，给我们以许多启发。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其城内范围之广阔，其与城外别墅、山林、寺院的广泛联系，构成长安城内外的不同区域特色，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长安城内城外这些不同区域

---

1 参看孙英刚《唐前期宫廷革命研究》，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263—288页。

2 参看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第185—214页；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同上，第215—234页的相关部分。

3 参看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

4 参看王静《唐大明宫的构造形式与中央决策部门职能的变迁》，《文史》2002年第4期，第101—119页。

5 参看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新1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89—116页。

的特点，将会使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到长安社会的一些细部，同时也可以揭示出长安社会的一些变化情形。由于吐鲁番文书中幸存下来唐朝前期新昌坊当铺的文书，对比唐后期文人官僚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唐代前后期新昌坊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的变化[1]。而条理分析终南山与长安城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看到长安社会的一个重要侧面[2]。

四、找回《两京新记》的故事，追索唐朝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及神灵世界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两京新记》卷三的抄本和《太平广记》保存的一些佚文来看，《两京新记》区别于《长安志》以后记载长安坊里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一些著名的建筑物，不论是贵族百姓的住宅，还是官衙或寺观，都有生动的传说故事。有些故事在后人看来荒诞不经，所以被《长安志》的作者、正统的历史学家宋敏求删削追尽，但事实上这些故事恰恰反映了长安居民的宗教信仰，并且赋予某些建筑物以人文色彩。《长安志》以后的长安坊里研究，受宋敏求的影响至巨，今人的研究更是以考证地理位置、新增宅第为主要目的，只要见到一方墓志，即补一个宅第，甚至使父子异户，夫妻分居，我曾在课堂上戏称长安研究几成“录鬼簿”。其实，把《两京新记》散失的故事找回来，我们可以从中聆听到长安居民讲述的美妙传说，观察长安居民的神界鬼域，思索长安居民的精神境地。那些今天看来是荒诞的故事，才是长安历史的真实；那些鬼怪传说，才是长安的精神世界。

---

1 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第7卷，第229—248页。

2 参看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唐研究》第9卷，第129—168页。

长安是唐朝最辉煌的佛寺道观所在，但丰富多彩的佛教、道教研究论著中，大多数是有关宗派和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他们所住或所学的寺院。长安的佛寺道观既是名僧高道的修习讲学之地，也是皇家、贵族、官僚、百姓供养的对象，它们和世俗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唐朝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和某所大的寺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寺院有的是他原来的本宅，像唐中宗和荐福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非同一般[1]。即使是保存下来的材料十分稀少的祆教神祠，如果汇集各地祆祠的有关记载，我们也可以观察到长安祆祠的社会功能[2]。对于长安各种宗教寺宇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必将加深我们对唐朝宗教、信仰以及宗教社会史的认识。

长安的研究充满了魅力，长安的研究也是颇有收益的。我们的读书班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陆续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上面提到了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我们编辑这卷以“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为题的研究专辑，为的就是集中展示长安研究的成果，我们邀请了妹尾达彦、齐东方教授赐以专文，并汇集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关于祭祀、台阁、陵墓的研究，我想这必将大大丰富人们对长安社会、文化的认识，推进唐代历史的研究。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我所主持的“《两京新记》读书班”的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大学“盛唐研究”计划的资助，并得到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大力支持，没有这里的丰富藏书，也就无法开展这项研究工作。在编辑这卷研究专辑的过程中，得到雷闻博士、王静、毕波两位同学的大力帮助，朱

1 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25—150页。

2 参看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祆祠的社会功能》，《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第385—412页。

玉麒教授在北大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也积极参与此项研究，他也为本卷的编辑出了力，在此我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原载《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8页



女扮男装

——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

一、前言

在中国古代的性别意识里，“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周易·家人》），是天经地义的规范，妇女的主要活动被局限在家内、院内、宫内，像北朝时期的花木兰那样，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非常举动，是极其少见的情形，因此，一曲《木兰辞》被千古传诵。

然而，与北朝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不同的是，唐代前期，特别是盛唐时期，从宫廷侍女到士流之妻，女扮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表明盛唐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南北朝甚至唐以后不同的性别意识。

本文在收集、整理、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图像的基础上，拟探讨这一社会风尚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并进而分析图像和文字背后所隐含的盛唐妇女的性别意识问题[1]。

二、文献记载的唐代前期女性服装的演变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前期妇女的服装有一个从全身遮蔽到逐渐简化暴露的过程。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记载了各阶层妇女的衣服穿戴的基本准则，包括三种皇后服装、三种皇太子妃服装和六种命妇服装，其中，最后一类服装包括了内命妇、外命妇[2]、宫官、女史、品官妻女乃至庶人女的服装。至于常服，夫人的服装要按夫、子的官

1 这里所说的“盛唐”，大体上是指武后到玄宗时期（684—756），而称高祖到高宗为“初唐”（618—683），不过两者之间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两者合称，则为“唐代前期”。

2 《唐会要》卷二六“命妇朝皇后”条：“国朝命妇之制，皇帝妃嫔及皇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73页。

品而定，“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僭上”[1]。但是，服装是一个社会物质文化中最易变化的因子，也是人们思想意识转变的物化标志。《旧唐书·舆服志》接着上引文说：“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说明这种服饰奢靡的风气，是唐朝《格》、《令》规定所不能限制的，从宫廷妇女到民间士庶，不分贵贱，都同样仿效。

那么，这种社会风尚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旧唐书·舆服志》接着说：

武德、贞观之时（618—649），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羃䍦。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650—655）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671）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着帷帽，遂弃羃䍦，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684—704），帷帽大行，羃䍦渐息。中宗即位（705），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䍦之制。

开元初（713），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天宝中（742—756）〕，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2]

---

1 《旧唐书》卷四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9—1957页；《新唐书》卷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1—531页。对此，孙机《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有详细解说，载氏著《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95—346页。

2 《旧唐书》卷四五，第1957页。“则天以前”部分，又见《唐会要》卷三二《舆服》下。按唐人刘肃著《大唐新语》卷十《厘革》文字略同，唯“咸亨二年”作“显庆中（656—661）”，时间更早；又“天宝中”为《旧志》所遗，今据补。见许德楠、李鼎霞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页。《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略同，其最后一句作“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应当是作者极力想把这种服装的变化，和天宝末范阳安禄山的叛乱联系在一起，即后文所说的“当时以为服妖之应”（第531页），不足取。

唐朝妇女的服装，除了参加朝会、仪式时穿的礼服外，平日的便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其中帔可能是受到西域影响而流行起来的，但基本的样式与汉魏以来的传统服装没有太大的区别[1]。

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唐朝前期女子时世妆的变化。据上引文，唐初武德、贞观年间，宫女和王公家的女子出行，要戴羃䍦，以为这是北齐、隋的制度。向达先生曾举《隋书·西域传·附国传》所记"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羃䍦"和《旧唐书·西域传·吐谷浑传》所记"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䍦"，以为是西戎之服[2]。隋代的附国，应当就是唐代的吐蕃，在青藏高原[3]；隋及唐初的吐谷浑，则游牧于今青海和新疆塔里木盆地东南部[4]；两者均为西域民族，其戴羃䍦的目的是遮挡西北的风沙。重要的是，这种羃䍦在西域是男子的服装，而在唐初，则变成宫女和王公家内妇女出行时的服装，遮挡风沙的长披巾，变成窥视女性的屏障。我们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迎佛图》，217、103窟《法华经·化城喻品》中骑马出行的妇女身上，在大谷探险队所获新疆吐鲁番出土唐代绢画上（图5），看到这种遮盖程度不同的羃䍦形象[5]。人们常常用穿戴胡服来说明唐朝妇女的开放程度，实际上，我们应当

1 参看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78—180页；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70页。

2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载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44—45页。按，向文以附国为白兰国，又将吐谷浑与吐火罗混同，似有未谛。

3 参看郑天挺《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原载《国学季刊》第6卷第4号，收入作者《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3—242页。

4 参看G. Mole, *The Tu-yu-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 Roma 1970；周伟洲《吐谷浑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5 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1、233页及图十。按段文所附为线图，原图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版66（323窟）、100（217窟）；关于吐鲁番绢画，见《周刊朝日百科》第87号，1979年，第175页彩版，参看东野治之《伝トルファン出土树下美人图について》，《佛教艺术》第108号，1976年，第53—64页。

区别不同的胡服，像这种遮蔽全身的胡服，不仅不能证明唐朝的开放，反而说明了唐初皇帝和王公贵族对于妇女的狭隘自私观念。

高宗永徽以后，女子开始戴帷帽。这种帽子的主体是席帽，特征是在形如斗笠的帽沿上，装一圈下垂到颈部的纱网，这样可以将面部遮住。这种缩短了的羃䍦，暴露了身体，但仍遮盖着五官，用意还在于不让外人见到。但是，我们从考古发现的陶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到的帷帽，大多数的纱网是从面颊两旁向后撩的，面部的主体是露在外面的[1]，所以《旧志》说是“渐为浅露”，故此政府要下敕禁断。最明显的例子，是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墓出土的骑马女俑，头戴帷帽，纱网尚存，三面遮障，正面露出妩媚的朱唇与桂叶双眉（图6）[2]。这个墓葬出土的墓志和文书分别属于武周和天宝初，反映的正好是“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䍦渐息”的情形。

开元初年，宫人跟从皇帝出行骑马者，都着胡帽。这种胡帽有的是尖顶的，有的则形圆如钵，其帽耳可以上翻，也可以遮住耳朵，但不论哪种戴法，都是“靓妆露面，无复障蔽”了[3]。从考古所见戴胡帽的具体人物形象看，并非只有骑马者戴胡帽，许多站立的女俑也着胡帽；并非只有宫人戴胡帽，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唐西州绢画上的仕女，也着胡帽。还有一点应当指出，就是胡帽在开元以前就是时髦的东西了，中宗景龙二年（708）入葬的扬州大都督

1 见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第233页图十之1莫高窟第217窟远行妇女图；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第186页图16-7：1戴席帽的唐女俑，四唐画《关山行旅图》中戴帷帽露面的妇女。

2 金维诺、卫边《唐代西州墓中的绢画》，原载《文物》1975年第10期，此据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精美的图版，见新疆博物馆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版127。

3 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第183—184页，图16-6。

韦浩墓中，就有了戴高顶翻毛胡帽的侍女（图7）[1]。正是由于戴胡帽在开元时已经十分普遍，所以甚至连开元十九年（731）的敕书中也规定："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2]

《旧志》称天宝年间，上庶相互仿效，帷帽已经绝不行用。女子露髻骑马驰骋，或者穿着起男人的衣服和靴衫，而且不论尊卑内外，都有仿效者。这种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3]，主要是翻领、对襟的窄袖袍衫、竖条文裤和尖头鞋[4]，这种式样的胡服可以在唐代陶俑、壁画和线刻画上经常看到。

三、考古文物所见的女扮男装形象

文献所说的天宝年间女子穿男人衣的这种社会风尚，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文物中形象地展现出来。笔者根据已经发表的资料统计，从太宗贞观十七年（643）葬于昭陵的长乐公主墓，到天宝四年（745）的苏思勖墓，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几乎所有保存清晰壁画、石椁线刻图、彩绘陶俑的墓葬，都有女扮男装的形象发现。

1982年，宿白先生《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一文，根据1980年代以前发表的资料和相关记录，把唐墓壁画大致分成五个阶段，讨论了每个阶段的内容和新出现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女扮男装像，文后附有各墓壁画大致内容和所在位置表[5]，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女扮男装图的出现墓葬以及具体位置。1984年，王仁波、何修龄、单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86页。
2 《唐会要》卷三一《舆服》上"章服品第"条，第665页。
3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全唐诗》卷四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692页。
4 有关胡服，参看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第91—92页。
5 《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晖三位合撰的《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也分析了唐墓壁画的题材演变和分期，并附《陕西省唐墓壁画位置表》[1]，但所利用的材料与宿白先生上引文基本相同，而1980年代初以来，陕西等地又有不少新的发现。1997年，王彬先生《唐代妇女常服的分期与演变》一文，利用了八九十年代出土的新资料，包括壁画、陶俑，把唐朝妇女常服的发展演进分成四个时段，并概述了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其所附长安、洛阳女装分期表，区分了一般女装和女着男装[2]。这些分析，特别是他们根据已刊和未刊资料所列的壁画、陶俑、线刻图的女性装饰情况，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墓葬中的女扮男装形象极有参考价值。以下根据上面三篇文章附表和我们所见到的西安、吐鲁番、固原、太原等地唐墓考古发掘报告，把重要的墓葬情况表列如下[3]：(见31页)

表一是我们从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中所见到女扮男装和女着胡服的情况，由于从古到今，大多数墓葬曾经被人为毁坏或者盗掘，一些墓的壁画因盗洞进水而被泥土淤塞，难以清理出来；存放陶俑等随葬品的小龛大多数被盗墓者扰乱，因此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主题极具参考价值的陶俑，相对来讲保存较少。另外，1950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新发现使得地方考古工作者应接不暇，许多重要的墓葬，如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等，都只发表了简报，有的简报实在太简单，使得我们不能明确地辨认

1 《文博》1984年第1期，第39—52页；1984年第2期，第44—55页。

2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1997年，第32—45页。参看王彬《唐代妇女常服浅议》，《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3辑，1996年，第48—54页、页124及图一、二。

3 以下图版出处所用缩略语如下：《壁画集》= 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大唐壁画》= 李国珍《大唐壁画》，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6年；《新出壁画》=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按，《壁画集》和《大唐壁画》为摹本，但有些资料不见于他处，故作参考。

有关的女扮男装形象，如懿德太子墓壁画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其中许多形象无法判定。而考古学界对于墓葬中女扮男装图像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所以在1950、1960年代的报告中，往往把女扮男装图像错定为男侍，这些在后来的研究论著中有的被更正，有的则仍然没有人指出，上表尽可能地做了改订。最后，我们从最近出版的唐代墓志汇编类的著作，如《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以及一些考古工作者的论著中，知道还有大批唐前期的墓葬已经发掘，但连简报也没有发表，如金仙公主墓，我们期待着在这些没有发表的资料中，看到更多的女扮男装形象，也相信有更为丰富多彩的图像，将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上述已经发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概述一下女扮男装图像的基本形式。因为陶俑和石椁线刻画的颜色都容易脱落，所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在唐墓壁画上面看得最为真切。我们这里不是做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所以略按时代先后，举几个例子，以见女扮男装形象的基本情况：

段蔺璧是唐高祖女高密大长公主之女，唐太宗的外甥女，高宗的表姐，卒于永徽二年（651），可以作为唐朝早期墓葬的典型。其墓第五天井东壁小龛南第一位侍女，头扎红色带子，身穿白色窄袖圆领袍，束腰，佩鞶囊，下穿红白相间的条纹波斯裤，裤脚饰以花边，足着花鞋，袖手而立（图8）。

表一：考古发现所见的女扮男装图像

年代	墓主	出土地	女扮男装（附胡服女性）
643	长乐公主	昭陵	男装女骑马俑；胡服女骑马俑[1]。
649	司马睿	西安	胡服女骑马俑[2]。
651	段蔺璧	昭陵	男装女骑马俑；天井4—5壁画：男装侍女[3]。
657	张士贵	昭陵	男装女骑马俑；胡服女立俑[4]。
660	新城长公主	昭陵	过洞2—5壁画：男装侍女，有捧包裹、秉烛、持诗卷者[5]。
664	郑仁泰	昭陵	男装女立俑；男装女骑马俑[6]。
667	苏定方	咸阳	过洞6壁画：男装侍女[7]。
668	李爽	西安	墓室壁画：男装侍女，一捧物，一吹箫[8]。
673	大长公主	献陵	甬道与墓室壁画：男装侍女，有提壶、持花托盘者[9]。
675	虢王李凤	献陵	甬道壁画：男装侍女，一持团扇，一捧包裹，一持如意[10]。
675	阿史那忠	昭陵	过洞3—5壁画：男装侍女，有托盘、捧包裹、端盒者；天井3—5壁画：男装侍女，有持物、捧幞头帽，抱弓及箭囊者[11]。

1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第13页，图版贰：4—5。

2 员安志、王学理《唐司马睿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第46页，图版伍：6。

3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蔺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第5、9—10页，图版贰：5，图六：7—8，图版肆：3—4；《壁画集》图16、17。

4 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第171页，图四：2，第173页，图四：11，第176页。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第18—22页，图15—16；《新出壁画》第34—35、37、45—46、49、51、53、58页。参看王彬《新城公主墓壁画起舞、秉烛二侍女图》，《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第277页。

6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36—37页，图15、22，图版十：2、十二：2。

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考古》1963年第9期，第497页，图九：4。墓主人的确定，据上引宿白文。

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1959年第3期，第53页，图10、32，报告认作男子，误；《壁画集》图31。

9 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第3—4页，图版壹：3、5；《壁画集》图48、49、51、63、65、68。

10 富平县文化馆等《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第316—318页，图四：1、5；《壁画集》图72、76。

1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第133—135页，图一，图版十：2；按，《简报》均作男侍，然从其服装和手执物品来看，应当是男装女侍。《壁画集》图86、88。

续表

年代	墓主	出土地	女扮男装（附胡服女性）
684	安元寿	昭陵	男装女立俑；过洞壁画：男装提壶侍女[1]。
688	麹氏	吐鲁番	男装女戏弄俑[2]。
699	梁元珍	固原	墓室壁画：男装侍女，一捧包裹，一端果盘[3]。
706	章怀太子	乾陵	甬道壁画：托假山男装侍女；墓室壁画：捧包裹侍女及宫苑侍女[4]。
706	懿德太子	乾陵	甬道壁画：男装侍女；墓室壁画：男装侍女[5]。
706	永泰公主	乾陵	甬道壁画：男装女侍；墓室壁画：男装女侍；石椁内外：男装侍女，有持瓶、捧方盒者[6]。
706	李嗣本	洛阳偃师	胡服女骑马俑[7]。
708	韦泂	韦曲	石椁画：男装侍女，有捧包裹、托盘、托瓶、持花、抚鸟者[8]。
708	韦浩	韦曲	墓室壁画：男装侍女，男装喂鸟侍女[9]。
710	节愍太子	定陵	过洞、天井、甬道壁画：男装侍女，有持壶、拱手、相向而语等多种[10]。

---

1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第38、42页，图版二：1，三：3。按，《简报》称过洞提壶者为男童侍，从装束、面容看，也应是男装女侍，况且其他同类表现宫官的形象中，很难插入一个男童。

2 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原载《文物》1976年第12期；此据金维诺《中国美术史论集》，第158页。

3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黑白图版100至104。

4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7—18页，图7、17、20、图版一：1；《唐李贤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壁画集》图123、140、141、143、144、146、147；《大唐壁画》，第40、49页。

5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29页，文字极为简略；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李重润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壁画集》图103—105。

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第14、16—18页，图52、55、58—59，图版陆，其中墓室壁画中的男装侍女，往往被误识作男侍；陕西省博物馆《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壁画集》图163、162、164；《大唐壁画》第21、22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8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第8期，第10—12、18页，图8—11。

9 《新出壁画》，第87—89页；《大唐壁画》，第73页。

10 《新出壁画》，第125、127—128、130、134、136—138、140—141、143、147、151页。

续表

年代	墓主	出土地	女扮男装（附胡服女性）
710	薛氏	咸阳	墓室壁画：男装侍女，一提物，一托盘[1]。
718	越王李贞	昭陵	男装女骑马俑[2]。
718	韦项		石椁画：胡服女侍。
721	薛儆	山西万荣	石椁画：男装侍女，有捧包裹、端碗、拱手、捧方盒者[3]。
724	金乡县主	西安	男装女立俑，胡服女立俑；男装骑马伎乐俑；天井壁画：胡服侍女，捧方盒；墓室壁画：男装侍女，抱包裹[4]。
728	薛莫	西安	墓道壁画：捧盘女侍。
737	李承乾	昭陵	男装女立俑[5]。
745	苏思勖	西安	墓室壁画：男装女侍，持如意[6]。

新城长公主为唐太宗第21女，先嫁长孙诠，又嫁韦正矩，后暴薨，年30岁。龙朔三年（663），高宗以皇后礼制葬于昭陵。其墓第四过洞西壁北侧侍女，头梳平髻，髻上的黑色锦带挽结垂于脑后，额头上系一红色抹额，这原本是军队和仪仗中用的标识性装束。身着左襟圆领紧袖褐色袍服，束黑色腰带，右垂承露囊，下穿黑白条纹紧口波斯裤，脚穿浅绿软锦透空鞋，双手捧一红色高足蜡烛盘（图9）。

又第五过洞东壁南侧侍女，头戴黑幞头，身穿圆领紧袖桔红色长袍，腰束黑色鞢鞢带，脚蹬黑色高靿靴，双手捧一捆卷轴（图10）。

---

1 《壁画集》图178、179。

2 昭陵文管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7—54页，图63至69，图版76至89。

4 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第6、9、12、15页，封三，彩色插页一：3，图九，彩色插页二：2；韩保全编《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第28—29、59—64页。

5 昭陵博物馆《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第18页，图5。

6 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第36页，图版五；《壁画集》图186。

阿史那忠是入仕唐朝的突厥人，因擒东突厥颉利可汗功，太宗妻以定襄县主。县主永徽四年（653）卒，阿史那忠上元二年（675）卒。其墓第五天井西壁北侧侍者，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左襟长袍，下身穿条纹裤，腰束带，着线鞋。《简报》称作男侍，但穿戴与其他男装女侍相同。惟独不同的是她怀抱弓、箭囊各一，这可能与阿史那忠是武将有关（图11）。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中宗的女儿，大足元年（701）被杀，年仅17岁。中宗即位后，于神龙二年（706）葬之于乾陵。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同样，代表了武周到中宗时期的壁画风格。其墓前室四壁，绘有多幅女性群像，一组七人或九人，往往是一个较高大的人物在前，后面是跟从的侍女，长裙帔肩，飘逸动人，每队最后，有一男装侍女，有穿圆领长袍者，也有穿翻领胡服者，下身也是穿条纹裤，有的手中捧物，有的则拱手向前（图12）。

同样的女性群体，也见于懿德太子墓前室东壁壁画上，其最后一位女子，也是露髻男装的侍女[1]。

山西万荣县出土的薛儆墓，埋葬于开元九年（721），其石椁上的线雕人物图是盛唐时的代表作。薛儆出身河东望族，娶唐睿宗女荆山县主（后封鄎国长公主）。其石椁内侧所雕侍女之一，戴幞头，着半臂、圆领窄袖衫，外穿翻领小袖长袍，边有花饰，腰系鞢韄带，下垂四条小带，以悬挂算带、小刀、砺石、针筒等物，即胡服上的“鞢韄七事”。又佩圆囊，下身着条纹裤，脚穿小翘头软锦靴。双手捧包裹。面部圆润，有盛唐妇女的丰满姿态（图13）。

苏思勖是内侍省的宦官，天宝四年（745）卒。其墓室北

1《唐李重润墓壁画》图版31。

壁绘高髻阔服之丰满女像，后随一形体略小之"男像"，戴幞头，穿圆领长袍，下身不清。双手抱于胸前，左手执一如意靠在左肩上。从其神态和位置看，应当是女扮男装（图14）。

总体来说，这种女扮男装形象，前后变化不大，一般头戴幞头，或扎布条，或露髻，身穿圆领或翻领长袍，腰束带，下身着紧口条纹裤，脚蹬线鞋或翘头靴，双手或隐于袖中，或捧包袱等物。这种形象初看起来很容易被认作男性，但从其服装艳丽的颜色，发髻或幞头下的发丝，长袍下露出的花裤和女式线鞋，人物面部的柳眉细眼，小嘴红唇，面施薄粉，以及身姿、动作、持物等情形，可以判定出其女性的特征[1]。这种女扮男装的图像似乎有同样的粉本（古人画稿谓之粉本），所以逐渐固定下来，一些像条纹裤那样的图案，成为女扮男装的特殊标志。这些图像在考古发现中越来越多，使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加以判定，同时，我们也可以辨识或确认一些传世绘画作品中的女扮男装形象。

传为宋徽宗所摹唐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上，中间为虢国和韩国夫人，前后为三男装、三女装的侍从（图15）。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男装的侍从是"从监"[2]。对比唐墓壁画，这种戴幞头，穿圆领长袍，蹬靴，如此近侍女主人的侍从，应当是女扮男装的女侍[3]。这是开元年间长安宫廷妇女出行时女扮男装的真实写照。

在西北的敦煌，盛唐时开凿的莫高窟第130窟，有《都

---

1 齐东方教授曾从唐墓壁画中男子脸形粗糙，女性眉目清秀，男侍不执日常生活用品等情况，来区分唐墓壁画中的男女，见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荣新江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67页。又参看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第187页。

2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34页。

3 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第232页；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王世平执笔）《盛唐气象——恢宏灿烂的华美乐章》，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52—53页，即持这种看法。

督夫人礼佛图》，其中女主人的侍女，也有戴极薄的皂罗幞头，裹高髻，圆领衫，腰束带的男装女侍[1]（图16）。这则是唐朝边镇妇女的现实生活写照。

诚如前人研究唐代墓葬壁画时所指出的那样，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唐代现实生活的反映[2]。墓室中宫女的女扮男装，是唐朝前半期妇女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这些考古发现的墓葬陶俑和部分保存的绘画作品，大大丰富了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所得的唐前期妇女外部形象的认识，也可以改正文献上的一些不确切的记载。

（一）根据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开始，墓葬中就有了女扮男装的骑马女俑了。高宗永徽二年（651），又出现在段蔺璧墓的壁画上[3]。从后者成熟的图像看，这种女扮男装形象的出现，应当从唐朝初年，至少从唐太宗统治初期就开始有了[4]，远远早于文献所记载的"天宝中"。而且，贞观年间的女着男装骑马俑，说明那时女子不仅穿男子装，而且乘马驰骋了。

（二）从总体上看，在同一个墓葬的侍女形象中，女扮男装的侍女虽然从来没有超过女装侍女的数量，但从初唐到盛唐，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薛儆墓石椁线刻画的19位侍女中，有7位着男装，占三分之一强[5]。这无疑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时尚所趋，也和文献记载强调盛唐妇女着男

1 段文杰《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第232页，图九。

2 参看Mary H. Fong, "T'ang Tomb Wall Paintings of the Early Eighth Century", *Oriental Art*, XXIV.2, Summer 1978, pp.185-194，关于这些唐墓壁画所见生活题材的论述。

3 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1994年）第115页、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29页，都指出段蔺璧墓的男装女侍要比文献记载的早半个多世纪。

4 贞观四年（630）埋葬的淮安靖王李寿墓，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壁画和石椁线刻画，其题材主要是沿袭魏晋南北朝的传统，没有见到女扮男装形象，似可作为一个上限的弹性尺规。有关该墓的情况，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1—88、61页。

5《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74页。

服相符。但是，从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看，天宝以后，女扮男装的现象立刻消失。人们常常举《唐语林》所记武宗与王才人同一装束，于苑中射猎事，说明唐后期也有女扮男装的情形[1]，但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没有相同时代的考古和文献材料给予佐证。

（三）女扮男装的形象，不仅大量出现于唐朝京师长安周边埋葬的王公贵族墓中，也见于唐朝东都洛阳、山西万荣、宁夏固原、吐鲁番阿斯塔那等地的唐墓壁画、石椁线画、绢画和陶俑上，虽然目前所见这种风尚流行的范围在地域上主要是两京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包括了唐朝的核心长安、洛阳和边远的西州地区，但不排除河北、山东和南方地区也有同样的风尚，只是唐朝的壁画墓主要发现于气候干燥的西北地方。从墓主人的身份看，有唐朝皇帝的太子、公主，如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新城长公主、永泰公主；有王公贵戚，如虢王李凤、越王李贞、驸马都尉薛儆；有五品以上的文臣武将，如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司刑太常伯李爽；有入仕唐朝的西北民族将领，如突厥人阿史那忠、粟特后裔安元寿；有宦官苏思勖；也有隐士梁元珍；说明这种女扮男装的形象主要为唐朝社会上层所喜好。

（四）唐墓壁画中的侍女大多画在墓道以后的过洞、天井，特别是甬道和墓室当中，石椁当然也是在墓室当中的，表明包括男装侍女在内的侍女，主要是她们在宫中的形象。如新城长公主墓，墓道先绘朱红大门，有持剑的门吏守卫，然后两壁绘仪仗、车马出行、担子及仪卫，第一过洞两壁绘男侍，从第二过洞开始，均为女侍，表明已经

1 孙机《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第186—187页。

进入后宫[1]。懿德太子墓的墓室里面，绘制的也全是女性[2]。这些壁画和石椁上的侍女，表现的主要是宫内或王公贵族家内的女性形象，有人认为章怀、懿德太子墓中的这些侍女，即《唐六典》所记的女性官员——宫官（六尚、六司、六典）的形象[3]，从她们所处的位置和手中所捧的团扇、诗卷、包裹来看，这种看法很有见地。

（五）与壁画和线刻画有所不同，陶俑中的骑马俑，则更能说明盛唐妇女的外部形象。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女扮男装骑马俑，身穿翻领胡服，昂首挺胸，双手作持辔，正准备出行[4]（图17）。又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头梳双垂髻，身穿圆领窄袖缺袴袍，腰系褡裢，足蹬黑色高鞠靴，左手控缰。骑一匹大红马，身后马背上有一红圆垫，上面蹲踞一头猞猁（图18）。这种狩猎者的形象，与同墓的骑马抱犬、架鹰、带豹的男性胡俑的形象没有多少区别[5]（图19）。这里的猞猁（Lynx）是一种似猫而大的猛兽，而豹子则是一种原出北非或西亚的奇塔豹（Cheetah），这两种猛兽可以被人驯服而成为狩猎的极佳工具，两者都善于奔跑，而猞猁可蹦到高九英尺处捕捉猎物。猞猁和奇塔豹都要经过猎师的复杂训练，骑马驮着它们的人，也就是驯服它们的猎师[6]。由此不难想象唐代女性的社会形象。

总之，考古资料提供了比文献更为丰富多彩的女扮男

1《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第16—18页；《新出壁画》图版说明，第1页。
2 Saehyang P. Chung, "The Sui-Tang Eastern Palace in Chang'an: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Its Plan", *Artibus Asiae*, LVIII.1-2, 1998, p. 26.
3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第47—48页。
4《盛唐气象——恢宏灿烂的华美乐章》，第63页。
5《唐金乡县主墓彩绘陶俑》，第44—56页。这种马背上带着猎豹出行的图像，还可以在章怀太子墓壁画上见到，见《唐李贤墓壁画》图版九。
6 参看张广达《唐代的豹猎》，《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装的形象资料，为我们探讨这种形象出现的背景、原因，以及这种社会风气背后所隐含的性别意识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四、女扮男装流行的原因与盛唐女性的性别意识

关于唐朝前期女扮男装的现象出现的原因，研究者的解说不一，主要有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性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1]。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像太原金胜村三三七号唐墓壁画中袒胸的妇女[2]，要比男装的侍女开放得多。

要探讨女扮男装出现的原因，还应当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女扮男装的服饰特点做仔细的考察。以下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目前来看，女扮男装的最早的材料是贞观十七年（643）长乐公主墓出土的男装女骑马俑，这个时间恐怕不是偶然的。现把其中一些相关的主要史实罗列如下：

贞观四年（630），灭东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内部的胡

1 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67页；尚民杰《唐代妇女的艺术形象》，《文博》1992年第6期，第40页；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第124—126页；张庆捷《唐代薛儆墓石椁及其线刻人物考察》，《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第98—99页。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金胜村三三七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彩色图版。参看Patricia E. Karetzk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Medieval China: Rec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 *T'ang Studies*, 17, 1999, p.229。

人大批进入长安，其中包括大首领安菩等人[1]。占据伊吾的粟特首领石万年率七城降唐，唐朝以其地为伊州，下辖三县[2]。

贞观五年，有祆教传法穆护何禄到，入阙奏闻，敕令于长安崇化坊立祆寺[3]。

贞观初，于阗国王以尉迟乙僧丹青巧妙，推荐到唐朝阙下，授宿卫官。乙僧善画外国及佛像[4]。

贞观九年，大秦国景教上德阿罗本至长安。贞观十二年（638），下诏允许在长安义宁坊造波斯寺（后改大秦寺）[5]。

贞观中，康国（Samarkand）大首领康艳典率众东来，居鄯善城，因成聚落，并修筑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其聚落中有祆舍[6]。

贞观十四年，高昌王国阻断西域使者、商人前往唐朝的道路，唐朝出兵灭高昌王国，在吐鲁番盆地立西州，掠高昌王族及大臣到长安、洛阳，高昌之胡汉民众成为唐朝编民[7]。

由以上主要事件可以看出，因为唐朝在贞观四年打败东突厥，使得原本在突厥汗国内部的粟特胡人大批进入唐朝都城和北部边地。随后，唐朝以高昌断绝商路为由，征服高昌，并开始向西扩张，原本属于高昌的胡人，也成为唐朝的编户，西域于阗等国的今伊朗民众，也较容易地进

1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72—73页。

2 敦煌写本《沙州伊州地志》（S.367）。参看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37页。

3 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2页。

4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6《沙州伊州地志》、敦煌写本《沙州图经》（第5034页）。参看荣新江上引文，第30页。

7《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高昌条，第5293—5296页。关于高昌之胡人及东西交往情况，参看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2—83页。

入中国。与此同时，阿拉伯势力向东进军，也迫使波斯、粟特等伊朗民众向东迁徙，如康国大首领的率众东迁。随之而来的是伊朗系统的文化也进入唐朝本部，这里有早就在西北地方流行的祆教，也有初次到来的景教。

所谓“胡服”的“胡”，在隋唐时期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1]。在安禄山对哥舒翰说的一段话中，有最清楚的陈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2]安禄山父是粟特人，哥舒翰母是于阗人，两地的民族和语言都属于东伊朗系统。因此，唐朝所谓胡服，应当主要是从西域粟特、于阗等国的民众那里学习来的。而在贞观以前，虽然粟特、于阗等国与中原王朝有使节往来，但使者多为男性，中原的女性很难看到粟特等伊朗胡人女性的模样。

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从魏晋以来就大量进入中国西北地方，形成许多独立的聚落[3]。这种移民运动，到贞观时达到一个高潮。而粟特移民聚落中，包含了大批女性成员。同时，粟特商人也经营贩卖女奴的生意，阿斯塔那出土过高昌延寿十六年（贞观十三年，639）的粟特文买婢契约[4]，说明不少粟特或突厥的女奴也被粟特人口贩子运到中国。这样，唐朝女性民众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都可以看到胡人妇女。从粟特地区一些遗址，如片吉肯特、阿夫拉西亚卜等地发现的壁画上，我们可以看到粟特妇女所穿胡服的样子，可以说正是唐代妇女所穿胡服的原本。目前所见女扮男装形象发现的地点，如长安、洛阳、敦煌、吐鲁番，固原，正是粟特聚落所在之地。

1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1963, pp.4–5；吴玉贵汉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页。

2 《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3 详情见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第27—85页。

4 吉田豊、森安孝夫、新疆博物馆《麹氏高昌国时代ソグド文女奴隶卖买文书》，《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IV，1988年，第11—50页图版一。

因此，贞观初身着胡服的粟特男女大量进入中国，可能是男装、特别是男式胡服被唐朝妇女当作时髦装束的原因之一。

（二）这种社会风尚在高宗、武则天时期迅速扩散，而大约从660年开始，由于高宗多病，武则天就以皇后身份操纵唐朝的政局。到684年，武则天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皇帝。在她于705年被迫退位以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先后活跃在唐朝的政治生活当中，直到712年李隆基杀太平公主，即位为玄宗以后，才基本上回复到中国传统的男性政治的局面。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所记的故事：

> 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1]

武则天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的长安，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说武德时就有女扮男装的风俗，因为则天当时还是个男女不分的幼童。但武则天的父母给她穿男孩的衣服，并让相士看相，表明其父母是用男子的形象来展现自己的女孩的。

1《旧唐书》，第5093—5094页；又见《大唐新语》卷一三《记异》；《太平广记》卷七六"袁天纲"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79—480页。

有关武则天的论著非常之多，大多数是把她作为参政的皇后和掌权的女皇来写的[1]，有些学者讨论到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统治中国的艰难[2]，有的学者提示了她为妇女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提高所做的贡献[3]，有的学者甚至以为武则天是中国前女权主义者的代表[4]。武则天曾经利用僧人造《大云经疏》和翻译窜改《宝雨经》，倡言佛教女主转世为王的说法，来为自己作皇帝寻找理论根据[5]。这表明她如何面对作为一个女性要当男性社会的皇帝所要克服的挑战。同时，当她正式掌握权力以后不久，先是自称为“圣母神皇”（688），但很快就正式称作“圣神皇帝”（690）了，说明她在正式当皇帝以后，从性别上把自己认定为与男性没有两样的皇帝。遗憾的是，没有表现武则天当皇帝时的图像保存下来，我们不清楚她的穿戴是否与传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的帝王像或《步辇图》中的唐太宗像一样，我们现在只能从龙门奉先寺上元二年（675）毕功的卢舍那佛像和敦煌莫高窟延载二年（695）建造的弥勒像上[6]，揣摩佛像装束（男装）的武则天形象了。

武则天之后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女性——太平公主，也

1 W. L. Guisso, *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ization in T'ang China*,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Denis Twitchett and Howard Wechsler, "Kao Tsung and the Empress Wu: The Inheritor and the Usurper",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09-332，汉译本《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42—286页。

2 胡戟《武则天本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牛志平《武则天与唐代妇女》，张玉良与胡戟编《武则天与乾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8—47页；Jennifer W. Jay, "Vignettes of Chinese Women in Tang Xi'an (618-906): Individualism in Wu Zetian, Yang Guifei, Yu Xuanji and Li Wa",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XXXI.1, March 1990, pp.80-81。

4 Chen Jo-shui, "Empress Wu and Proto-Feminist Sentiments in T'ang China", *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 ed. F. P. F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4, pp.77-116.

5 Antonino Forte, *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Naples: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76；较新的讨论见古正美《武则天的〈华严经〉佛王传统与佛王形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9—322页。

6 龙门佛像见《盛唐气象——恢宏灿烂的华美乐章》，第88页。

有穿男装的记录，《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曰：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所谓"折上巾"，即幞头，《梦溪笔谈》卷一说："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而"纷砺七事"，即《梦溪笔谈》卷一所说："带衣所垂蹀躞（即鞢韄），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1]这些都见于上节所列举的考古资料所见的女性男装头上和腰带上，只不过有些只绘出四条带子，而不具备七事了。这条材料说高宗与武后看到武装的太平公主后觉得好笑，但这却是太平公主的时世装束，她在宴会上作此状，也是要表明自己不同于女性的社会面貌。

这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的男装事例，表明她们对男装的喜好，而这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2]，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

盛唐时期的女扮男装，还可以从唐朝女性的教育、家内户外的生活、宫廷都市的活动、道教佛教的影响、个人性格的不同等方面加以分析，而且，不同社会群体，或不同社会阶层妇女女扮男装的情形也不相同。从总体上看，

1 沈括著，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23页。
2 Jennifer W. Jay, "Imagining Matriarchy: 'Kingdoms of Women' in Tang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6. 2, 1996. pp. 220-229. 谢慧贤在此只讨论了武则天和同时代新罗、日本、吐蕃的女王，我们希望今后能有学者从妇女或性别的角度来研究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这一系列大唐女性。

唐朝前期的社会选择，并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我们只要把唐朝前期这些女扮男装的图像，拿来和汉魏时期的最为流行的“贞妃烈妇”图，如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1]，或唐代以后闺门之内的妇女形象[2]相比较，就可以凸显出盛唐女子的社会风貌。

以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上的女性群体像为代表，盛唐妇女的完美形象，既不同于《女史箴图》中女性形象的雷同，虽然从艺术上继承了顾恺之“髭发秀润”的画法；也不同于张萱以后受杨贵妃形象影响而显得有些臃肿的形象[3]，尽管这种形象来源于唐前期的女性图像；她们身材匀称，颇具个性，而且和“男性”（女扮男装）同列。

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盛唐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区分当然是无法泯灭的。因此，当时的女性在展现外部形象时，有时是用男性服装来改变自己的女性特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论墓主人是女性还是男性，墓葬中都绘制有女扮男装形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盛唐时代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不论是长安宫廷的妇女，还是边州吐鲁番地区的大女[4]，她们本身恐怕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意识。

唐朝中晚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像才女李季兰、鱼玄机，无法充分

1 参看金维诺、李遇春《张雄夫妇墓俑与初唐傀儡戏》，《中国美术史论集》，第168页；Karetzk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Medieval China: Rec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p. 214-217。

2 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Life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5.

3 关于杨贵妃形象及其影响的讨论，参看Karetzk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Medieval China: Rec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p. 233-240。

4 关于吐鲁番唐代妇女的形象，参看Deng Xiaonan, “Women in Turfan during the Sixth to Eighth Centuries: A Look at Their Activities Outside the Hom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1999, pp. 85-103；邓小南《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5—237页。

舒展自己的才华，只能出家入道，或当情人。前者因为被迫写诗赞颂反叛唐朝的朱泚而被皇帝杖杀[1]；后者则只能看着新进士的题名，“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了，《唐才子传》的作者对此不无感慨地说：“使为一男子，必有用之才。”[2]

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中的女扮男装情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以上在清理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这种探讨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研究，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分析。

附记：本文初稿在2000年6月“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得到张邦炜、Patricia Ebrey两位教授的评论指教。本文修改时，参考了两位教授的一些意见，特此致谢。在改订过程中，正好接到张广达先生投给《唐研究》的大文《唐代的豹猎》，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初稿所举金乡县主墓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的意义，故文中据以略加说明，在此也向张先生表示谢意。除此之外，文章没有做大的改动。2001年9月13日。原载邓小南主编《唐宋妇女与社会》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723—750+图1—15。

1 李季兰上朱泚诗早佚，所幸在近年公布的俄藏敦煌写本中找到，见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研究》第5卷，1999年，第70—72页。同时发现的还有专门收录李季兰等唐朝女诗人诗作的诗集——《瑶池新咏》的残本，见荣新江、徐俊上引文及《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唐研究》第7卷，2001年，第125—144页。

2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52页。



何家村窖藏与唐长安的物质文化

一、何家村窖藏的发现与研究

1970年10月5日、11日，在西安何家村，即唐朝长安城兴化坊的范围内，发现了2个陶瓮和1件银壶，里面装有1 000多件器物，包括金银器、玻璃器、玛瑙器、玉器、钱币，以及药材等等，具体来说，有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玛瑙器3件，玻璃1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 900多两[1]。按照这些器皿的用途分类，则主要是属于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装饰用品和食用的药物及丹砂，还有纯的金银、收藏的古代和外国货币。目前这些遗宝都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2]。

这是一个有意埋藏的宝藏。

多年来，学者们对这批宝藏的内涵、埋藏年代和埋藏原因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解决了不少问题。但由于史料的缺少，目前对于这批窖藏的主人还有种种推测，而且没有一致的意见。最初的考古报告推测窖藏发现的地点“在唐长安兴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埋藏的时间在“盛唐晚期（8世纪末）”[3]。此后，韩伟等先生认为，这批宝藏是天

---

1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0—42页；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

2 参看申秦雁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金银器》，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

3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同上刊，第34页。

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时，邠王李守礼的儿子嗣邠王李承宁逃走时，他的家人匆忙埋藏起来的[1]。段鹏琦先生根据对何家村金银器上装饰花纹的分期研究，认为金花鹦鹉纹提梁银罐、镀金银盒、金花银匜上的花纹，以羽鸟、团花为主，时代在玄宗末到代宗时期，而金花银盖碗的图案则更晚到德宗时期。他还对比了何家村窖藏的具体方位，认为不是在邠王府或邠王宅，而在邠王府东面的区域内[2]。齐东方先生虽然指出用考古类型学判断花纹的起止年代缺乏很强的说服力，但他接受了德宗时期为窖藏年代下限的看法，并根据《唐两京城坊考》注引《刘无双传》的有关记载，认为窖藏是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在自己的宅第中埋藏了这批宝藏[3]。对此，黄正建先生认为，《刘无双传》是一篇小说，而其所记"尚书租庸使刘震"其人，没有其他文献的任何印证，应当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即使按照小说理解是刘震埋藏了金银宝藏，也可以想象他会在任伪官后把它们取出来享用[4]。此外，沈睿文先生从考古学的功能研究视角出发，把窖藏文物分成四组，认为是与道教有关的遗存，推测窖藏出土地是一个在家中炼丹的贵族高官的药院[5]。迄今为止，不论是窖藏的埋藏年代，还是窖藏封存物品的性质，都没有统一的看法，但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何家村窖藏的性

1 韩伟、陆九皋《唐代金银器概述》，作者编《唐代金银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韩伟《中国金银器概述》，作者编《磨砚书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2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考古》1980年第6期，第536—541、543页。

3 齐东方《何家村遗宝埋藏地点和年代》，《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第70—74页；又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第11—17页。在《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齐东方先生已经推测"窖藏似乎和租庸使刘震有关"，但同时又说："从银盒装药品的情况看是私人用物，故窖藏的归属尚难断定。"见该书，第10页，注6。

4 黄正建《何家村遗宝和刘震有关吗？——与齐东方先生商榷》，《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第73—74页。

5 沈睿文《何家村窖藏再认识——从考古学的功能研究谈起》，《华林》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49—264页。

质，都非常富有启发性。

笔者在研究唐代长安城的物质文化时，时常都在思考何家村窖藏属性，并仔细考察何家村宝藏中每件物品的用途，希望将它们置于整个长安物质文化构成的背景中去分析，从而比较准确地把握它们在唐代长安城中所处的位置。

二、何家村窖藏的私家属性

在讨论何家村窖藏性质的时候，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琳琅满目的金银财宝一定是唐朝皇家的珍贵器物。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种看法的来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发现这批文物的1970年代，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一般人生活都很简朴，没有多少人真正见到过特别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这些金碧辉煌的物品一下子展现在人们眼前时，首先让人想到的一定是皇家的宝藏，肯定难以相信一般的人家怎么会有这样多的金银财宝。而且，由于其中又有一些应当是属于政府税收所得的银饼和银铤，更容易让人认为这些宝藏应当属于唐朝宫廷或者是与宫廷有关的王府和官人，窖藏出自皇亲国戚邠王的府第，显然和这样的思考有关，而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强调统治者与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是很容易理解的[1]。即使是把窖藏看作是属于租庸使刘震的想法，也是和这样的一种思路直接有关，即这些金银药材都是官府所有[2]。

但是，我们应当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的钻探结果，以及段鹏琦先生对韦述《两京新记》所记开元时兴化坊住宅具体位置的分析，何家村窖藏不在邠王府的位置上，而应当是在一个现在无法落实的私

---

1 参看《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第33、38页。

2 齐东方先生说：“何家村遗宝从内容上看，可以肯定不是个人财产，而是官府所有。因为遗宝中的银饼……十分明确属庸调银和官府库藏物品。”见上引文，《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第73页。

人住宅或附属建筑物的下面[1]。最近，妹尾达彦先生对与兴化坊同类的坊里内部区划的分析，也证明了这一地域是一个记载的空白[2]。从窖藏出土的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窖藏首先的可能性应当是属于一个私家所有。

从窖藏中保存的实物来看，这些物品中有原本是属于官府的银饼和银铤，也有一些应当是纯粹属于私人的物品，比如那些古钱币和炼丹的药材和器皿。当然更多的器物是官府和私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们一味地看作是官府所有的[3]，但其中的大多数可以用作生活器皿的金银器一类物品，看作是私人所有可能更合理一些。这里也要分清官府所有和官人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官人所有其实就是私人所有。

笔者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仔细考察了盛唐时代长安坊里居民，特别是贵族、官僚家庭所能拥有的财产状况，以及唐朝皇帝的赏赐情况，唐代金银、宝货的转移方式，认为在盛唐时代的长安坊里，拥有像何家村窖藏这样多的金银财宝的人家并不稀见，它们完全可能出自一个我们目前还无法确知的贵族和官人家庭中。

在唐朝前期，金银器制作主要是在中央少府的掌冶署作坊和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中完成的，所以官人贵族家里的金银器主要来自皇帝的赏赐，赏赐品出自内库。《唐六典》卷一二内侍省内府局条记："内府令掌中宫藏宝货给纳名数，丞为之贰。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及杂彩、金银器于殿庭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赐亦如之。"[4]说明在朝会时，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机会得到包括金银器在

1 段鹏琦《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第540—541页。

2 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19、29页。

3 段鹏琦、沈睿文两位先生显然倾向于这些物品属于私家，见上引文。齐东方先生也曾认为是私人用物，见《唐代金银器研究》，第10页，注6。

4 《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61页。

内的赏赐。唐代中晚期，皇帝赏赐金银器的做法仍然继续。如李肇《翰林志》记皇帝每年对翰林学士的给赐中，就有“金花银器一事”[1]。得到赏赐的官员如果住在长安，那么赏赐品最有可能放在自己的宅中。

史料中所记载的皇帝赏赐的个案很多，如《唐张士贵墓志》记其助唐太宗平定群雄，“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铤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2]。太宗一次赏赐就有400余铤，可见数量之多。张士贵把所得金银散给部下，这些金银当然也就流散在宫廷之外。

何家村窖藏中的一些金银器、宝物、丹砂、药材等，也可以通过买卖得来。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有经营各种珍稀物品的店铺。《长安志》卷八称东市“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还有专门经营金器的“金市”[3]。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会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钱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可知其中有各种金、银、钱、药出售。长安的东西市也聚集着许多西域胡商，何家村窖藏中的一些舶来品，也可能是一些官宦人家从市场上购买得来的。

何家村窖藏中的古代钱币和外来货币，大多数都是一种一枚，因此夏鼐先生已经指出，“这窖藏的主人是搜集古钱和外币的爱好者”[4]。其中与炼丹有关的器物和药材，正如沈睿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也应当属于私家的财产[5]。

1　见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　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3　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据《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五《王四郎》条补，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4　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原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此据《夏鼐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5　沈睿文上引文。但是，我们很难认同他把所有何家村窖藏的东西都看作是与道教，特别是炼丹有关的器物，并由此推测出土地是一个药院，因为其中有不少日用品，如镂金银锁，有些装饰品，如十件金钗，还有舞马银壶等，都很难看作是和道教有关的物品。

至于何家村窖藏中原本属于官府的银饼、银板是如何进入私家的，需要多费些笔墨来特别加以解说。

何家村出土的银板（银铤）总共60块，其中有53块刻有“五两、朝”字样的银板，2块刻“伍两太北、朝”字样的砝码银板，1块刻“拾两太北、朝”字样的砝码银板，1块刻“三宅”字样的银板。有人推测它们原是唐朝中央政府左藏中朝堂库之物[1]。

何家村出土的银饼共计22块，其中只有四块刻有铭文。其中二块刻“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一块文字基本与上两块相同，只是最后三字作“匠陈宾”；一块刻“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前人已经考订，洊安、怀集两县唐朝时属于岭南道广州，《新唐书·食货志》记“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则这些银饼是作为唐朝的正税庸调折成银子交纳的[2]。

另外，还有12块带有墨书字迹的银饼，可以看到的文字有“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等。这些东市库的银饼，自然是长安东市官府库藏中的银饼。

上述的银板有五两、十两等不同的重量记载，实物的长宽也不一样，其中最多的是长4厘米，宽4.5厘米的“五两”银板。银饼大体上有两种大小，一是庸调银饼，直径都是10厘米多，而带有“东市库”等墨迹的银饼，直径则在15—16厘米，重量标记在47至52两之间。这些银板、银饼应当是国家征收的正税或市场商业税收的折纳物，以银的形式存在，原本当然是属于官府的。

---

1 秦波《西安近年来出土的唐代银铤、银板和银饼的初步研究》，《文物》1972年第7期，第55页。

2 秦波上引文，第55、57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2分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35—463页。

除了何家村之外，西安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也出土过一些金银铤、银饼、银板等。如西安北郊八府庄（大明宫遗址内）窖藏出土的郎宁郡天宝二年（743）贡银铤、岭南采访使彭杲进银铤、信安郡天宝十年税山银铤、宣城郡天宝十年和市银铤，据后两件背面的铭文，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把这些地方进贡中央政府的银铤，进奉给皇帝，存入内库。又洛阳唐代宫城遗址出土安边郡天宝十二年进和市银铤、西安南郊出土河南府伊阳县天宝十二年窟课银铤，据另一面文字，也是由杨国忠进奉给皇帝的。此外，还有长安县韦曲镇废品收购站发现的宣城郡天宝十三年采丁课银铤、《尊古斋所见吉金图》所刊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崔慎由进奉银铤、陕西蓝田县古墓出土广明元年（880）进奉贺冬银铤、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通州税口银饼、西安东南郊太乙路出土2枚无铭文金铤、山西平鲁县出土乾元元年（758）岁僧钱金铤等82枚[1]。

可见，天宝以后，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地方上，都有不少金银铤或银饼，这些金银铤主要是税收、进贡和进奉给皇帝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银铤不一定都出自长安、洛阳的宫城当中，有些就出在长安的坊里，甚至流传到地方。这恐怕也主要是皇帝赏赐的结果，上面曾举唐太宗一次赏赐给张士贵的金银铤就有400余，张士贵把所得又散给部下，使这些金银铤流散各处。类似的史料还可以举敦煌写本《常和墓碑》："（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2]皇帝赏赐给臣下的金铤、银铤，许多应当是打着原本的税收名称或进奉者

1 参看砺波护《唐代社会における金银》的整理和研究，见《东方学报》（京都）第62册，1990年，第241—259页。
2 《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页。

的名字的，在进入私家时，并不需要把它们磨去，因为一来上面有的有重量记录，二来可以向他人夸耀这是宫中的真货。要印证这一点，我们可以举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所发现的庸调布，上面的题记表明来自河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剑南道等州县，却调运转移到了西北边陲[1]。何家村的银饼有开元十年和开元十九年两个纪年，埋藏的年代不论是安禄山攻入长安的天宝十五年，还是德宗时期，开元间的庸调银已经没有其铭文所示的意义，而早已转化为普通的银子了。

另外，还可以举一个例证，1997年在印尼雅加达北发现的印坦（Intan）沉船上，有97枚原本是10世纪时的楚国桂阳监（在今广东连县）制作的“盐税银”，在被南汉君主获得后作为货币和来广州的商人交换其他物品，于是这些银锭用银箔包好，作为纯银带到东南亚去进行商业交易[2]。

何家村发现的数量可观的银饼、银板和山西平鲁县发现的大量金铤，很可能就是作为纯银和纯金而保存的，何家村窖藏的主人当然是一个金银器的爱好者，他存有纯银准备拿去制作其他的银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何家村窖藏中金银宝石制作的饮食器皿，炼丹或制药的金银宝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药品、金银钱，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装饰品，作为收藏的古代和外国货币及一些属于收藏或受赠的物品，对于它们从何处来和为何收藏于私家，我们完全可以给出比较合理的解说。

长安坊里官贵人家的金银财宝的来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途径，比如在外地做官带回京城的，朋友馈赠或他人贿赂

1 王炳华《吐鲁番出土唐代庸调布研究》，作者《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2—345页。

2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与思鉴（Janice Stargardt）合撰《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9—397页。

的，一些药材和装饰品，来历可能更为复杂，我们不应当只是从官府或者皇室一个方向来思考何家村窖藏物品的来历。

以上费了这么多笔墨来讨论何家村窖藏的可能来源和性质，主要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在盛唐时期的长安，拥有何家村窖藏所出这样多宝藏的人家并非极其少数，不一定非得是皇家或政府不可。

三、从何家村窖藏看唐朝物质文化

如果从一个私家窖藏的角度来看何家村宝藏的话，综合考古报告、展览图录和前人研究成果[1]，加上笔者本人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等处对原物的仔细观察的体会，何家村窖藏中的物品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类物品：一是金银宝石制作的饮食器皿；二是炼丹或制药的金银宝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药品、金银钱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装饰品；四是作为收藏品的中国古代和外国货币，可能上面的饮食、制药器皿及装饰品中，也有一些是属于收藏或受赠的物品；五是一些作为纯银储藏的银铤、银饼、银板等。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记载，从长安物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何家村的窖藏。就何家村窖藏和文献记载所见的盛唐物质文化情况，我们可以分做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钟鸣鼎食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舍宅舆服器物条称：“器

1 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图录，有助于这项研究，如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申秦雁主编《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金银器》；陕西省文物局、上海博物馆编《周秦汉唐文明》，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112—199页；James C. Y. Watt et al.,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8-319；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编《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朝日新闻社，2005年。

物者，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1]《唐会要》卷三一《杂录》记：“神龙二年（706）九月，《仪制令》：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2]前人已经指出，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纯金、纯银的器皿在唐朝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住在长安坊里的贵族、官人家中。

唐朝人对金银有一种观念，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3]，或者说黄金为“食器则益寿”[4]，因此大量使用金银器来作为饮食器皿。这当然是长安社会中富豪人家使用金银器的原因之一。

我们先看私家的金银器皿的情况，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因为长安的金银器主要是由中央少府的掌冶署作坊和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制作的，所以贵族、官僚家庭中的许多金银器皿都是得自皇帝的赏赐，以下举几个例子：

《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记：“(永徽)六年(655)，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5]长孙无忌宅在长安街东崇仁坊，龙朔三年（663）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673）改为僧寺[6]。

《旧唐书》卷一〇六《王琚传》记唐玄宗登基后，赏赐拥立功臣王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等“金银器皿各一床、杂彩各一千匹、绢一千匹，列于庭，宴慰终夕，载之而归”[7]。归于何处？当然是回到各自的宅第。以上四人，我们现在所知有二人宅在长安者，如李令问宅在街东兴道

1《唐律疏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88页。
2《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2页。
3《太平御览》卷八一二，珍宝部银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8页。
4《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18页。
5《旧唐书》，同上，第2454页。
6《长安志》卷八，《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旧唐书》，第3250页。

坊，原为他帮助玄宗灭掉的政敌太平公主的宅第；姜皎宅在街东光福坊，原为窦怀贞宅[1]。他们的宅第里，应该都是有皇帝赏赐的金银器皿的。

在天宝十四年以前，长安坊里宅第中金银宝货储藏之富，可以安禄山在亲仁坊的住宅为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年条记载："上命有司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贴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为禄山护役，筑第及储偫赐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2]《安禄山事迹》卷上记亲仁坊宅赐于天宝六年。《事迹》原注称："九载，禄山献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赐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一具，方圆一丈七尺；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锁二具……又赐金平脱五斗饭罂二口，银平脱五斗淘饭魁二，银丝织成筹筐、银织笊篱各一，金银具食藏二。"同年秋，"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瓶四，大银魁二并盖，金花大银盘四，杂色绫罗三千尺。"[3]这些赐物，显然是曾经放在亲仁坊安禄山的宅第中的。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永崇坊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宅条记："兴元元年（784），赐晟永崇里甲第，诏宰臣、诸节将会送。是日，特赐女乐八人，锦彩、银器等。令教坊、太常备乐，京兆府供具，鼓吹迎道集宴，京师以为荣观。"永崇坊在街东。这次大规模的赏赐，是德宗对李晟从朱泚乱军手中收复长安的奖赏，同时受到赏赐的还有河中节度

1《长安志》卷七。
2《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909页。
3《安禄山事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7、9页。

使兼中书令浑瑊，他在同年赐宅大宁坊，兼赐女乐五人、锦彩银器等，也是宰臣节将会送[1]。

《唐摭言》卷一五记："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2]王源中后为户部尚书，宅在街西太平坊。

有关唐朝皇帝赏赐臣下金银的事例很多[3]，这里举出的仅是一些长安的例子，希望藉此说明长安有不少金银器是来自宫中。这些金银器当中，有金银挺、银平脱屏风、金饭罂、银淘盆、织银丝筐、织银笊篱、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锁、金平脱饭罂、银平脱淘饭魁、金鞁花大银胡瓶、金花大银盘、金花银器、金碗、金钱等，其中有的可以和何家村出土物加以对比，如银挺、银淘盆、银锁、金碗、金钱、金花银器等都有同样类型的物品见于何家村窖藏。

何家村的金银器当中，有大量的金银器制作的饮食器皿，有金碗、银碗、银盘、银碟、金杯、银杯等（图20），形式众多、花纹繁复、工艺精湛。这些器皿，有些花纹非常精美，好像是专供人观赏而非实用的。但其中有素面大小银碗45个（图21），素面大小银碟51个，这显然是实用的物品，而且可以供相当多的人一起用餐。笔者以为其中不少带有花纹的器皿也是实用的，因为贵族或高级官员家中时常有高贵的客人，甚至包括皇帝，所以在招待这些人吃饭饮酒时，餐具就不仅仅是一种器皿，同时也是一种被

1 此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2 又见《太平广记》卷二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510页。
3 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汉译本，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44年；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5—9页；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265—267页。

赏玩的艺术品了。我们在何家村窖藏中没有看到像韩森寨等地发现的那种超过30厘米的大型银盘[1]，而是一些较小的东西，它们应当是日常饮食中使用的器皿。

从何家村许多金银器展现出来的精湛工艺水准、辉煌大气的造型、细致而又不拘板的纹样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其中有许多是唐朝前期，特别是开元天宝盛世时宫中的产品，它们通过赏赐的方式，流入长安坊里，成为私家用品。

（二）服食丹药

炼丹也是唐朝风靡朝野的一种喜好，是人们为求长生不老而采用的一种服食饵药的方法，从皇帝到一些高级官僚贵族，都沉溺其中。何家村窖藏的主人，不仅是一个金银器皿的爱好者，显然也是一个服食丹药的人，而且自己也炼丹，因此在窖藏中发现有全套的炼丹用具和各种各样的丹药（图22），大概数量可观的金银开元通宝也是炼丹用的。这方面沈睿文先生已有详细的论说，此不赘述。

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金银等炼丹用具和各种各样珍稀的药材与丹砂，表明这个炼丹者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人，他代表了当时炼丹者的极高档次。

（三）家世收藏

长安集聚着许多累世兴旺的贵族，也有不少新贵，他们有的继承了家世历代的收藏品，有的在自己一生当中勤于收集积累，逐渐形成一些十分可观的收藏。如《两京新记》的作者韦述，就有相当可观的收集品。《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

1 关于这种大银盘，参看秋山进午《正仓院金银花盘と唐代金花大银盘》，《美术史》第155号，2003年，第30—47页。

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1]作为史官和学者，韦述主要收藏的是图籍、法书、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但也有占碑这样的实物。另一个例子是永宁坊京兆尹杨凭的宅中，“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尝以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纳之，重复秘固，若不可窥者。”[2]他收藏的也是书画，可见长安有不少各种各样的收藏爱好者。光福坊的李泌，也是一个图书的收藏大家。

何家村窖藏中的钱币，除了30枚“开元通宝”金钱和421枚“开元通宝”银钱可能是皇帝赏赐品外，其他的货币，从最早的春秋时齐国的刀币“即墨之法化”，到唐朝前期的5种7枚“开元通宝”铜钱，大体上按历史年代顺序，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钱币，总共有31个品种，36枚钱币，还有东罗马金币1枚，波斯银币1枚，日本“和同开宝”银币5枚（图23），从整体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时期一枚，其中包括罕见的十六国时期前凉的“凉造新泉”和吐鲁番高昌国的“高昌吉利”钱[3]。从有些钱币已经破损但仍然保留的情形看，这确实是有意积累的结果，是为收藏而保存的钱币，而非用作其他的目的。因为如果是用作他途，一种钱币可以有多枚，特别是一些较为古老的钱币。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批钱币的拥有者，是一个钱币收藏家。这些钱币的来历可能更为复杂，估计可以通过领赏、交换、购买、发掘等方式获得，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像韦述、杨凭、李泌收集图书一样，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当一个社会逐渐富足以后，货币或者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就开始有了收藏，收藏古物、钱币、书画、舶来品等等。

1 《旧唐书》，第3184页。
2 《新唐书》卷一七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9页。
3 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第30、32页。

何家村窖藏中还有一些物品，如一些宝石、玉器、玛瑙器等，可能也是收藏品。

收藏，是盛唐长安积累物质文化的手段之一，何家村宝藏的中外钱币收藏，正好体现了这种物质文化积累的深厚。

（四）舶来佳品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朝时期，有大量中亚的粟特商胡人从西方向中国贩运高级商品，我们从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和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内藏奏得称价钱》文书上，得知他们经营的商品，前者计有金、麝香、胡椒、樟脑、大麻[1]，后者计有金、银、丝、香料、郁金根、硇砂、铜、鍮石、药材、石蜜[2]，这些物品也同样会由这些粟特商人贩运到长安的市场上来。

西市是西域商胡往来更多的地方，其中还有波斯邸。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代长安城考古工作队曾对西市做过部分发掘，出土有大量骨制的装饰品以及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制的装饰品，还有少许金饰品[3]，部分展示了西市经营的商品。另外，在西市附近的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4]；崇贤坊有胡人玉工米亮宅[5]。因此，东西两市以及其他地方的金银珠宝店和作坊，都是长安坊里人家购买金银、宝货、名贵药材的地方。

除了明确属于外来品的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等外，我们

---

1 N.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Philologicaet Linguistica: Historia, Pluralitas, Universitas. Festschrift für Helmut Humbach zum 80. Geburtstag am 4. Dezember 2001*, hrsg. von Maria Gabriela Schmidt und Walter Bisang unter Mitarbeit von Marion Grein und Bernhard Hiegl,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 2001; F. Grenet, N.Sims-Williams and É.de la Vaissière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V",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XII,1998, pp.91-104；毕波《粟特文古信札汉译与注释》，《文史》2004年第2辑，第88—93页。有关研究参看N.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 *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 ed. A.Cadonna e L. Lanciotti, Firenze1996, pp.47-48。

2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图录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50—453页。

3 《唐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第605—608页。

4 《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据《集异记》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第206—207页。

5 《唐两京城坊考》补，同上书，第111—112页。

从何家村的金银器、玛瑙器、玻璃器、宝石、药材等当中，不难判断出其中一些是直接的舶来品，如玛瑙兽首杯（藏品编号：7—282，图24），即西方非常流行的饮酒器——来通（Rhyton）；又如素面罐形银带把杯（编号：7—65），应当是粟特的制品；还有凸纹玻璃杯（编号：7—285），被认为是萨珊的产品[1]。有些物品，虽然不是直接的输入品，但却是粟特或波斯工匠在中国制作的，还有中国工匠照舶来品仿制的物品。这些物品虽然也可能经过唐朝宫廷而进入私家，但更可能的途径是长安的有钱人家直接从市场或胡商那里买来的。

何家村遗宝中有不少外来物品，或者是中外融于一体的金银制品，这些是唐朝前期东西方交通发达的结果。长安居住着大量的外来商胡，而且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他们随时在向长安提供着这个城市所需的各种高档物品，比如各式各样的金银器和各种质地的宝石。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等，就是商胡贩运的结果，它们表现了唐朝时期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给长安带来的异域文化精华。

我们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得到的印证，应当只是实际情形的一个局部或者缩影，由小见大，我们不难推想当时长安物质文化的兴盛发达。于是，我们反过来可以利用何家村的窖藏，来看盛唐长安物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因为何家村窖藏确实拥有非常罕见的和非常珍贵的资料，代表着当时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峰。

关于物质文化汇聚长安，可以参看韦坚的事例。《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记：

1 齐东方《何家村遗宝与丝绸之路》，《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第33—45页。

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袱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屩，如吴、楚之制。[1]

由此可以看出，四方宝物进入长安时的情形。

关于长安一户人家所有的金银财宝，有元载的例子。《杜阳杂编》卷上记：

上纂业之始，多以庶务托于钧衡，而元载专政，益堕国典，若非良金重宝，趑趄左道，则不得出入于朝廷。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焉。而更构沉檀为梁栋，饰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外以玳瑁水犀为押络，络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即鲛绡之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属凝冬，而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而服玩之奢僭，拟于帝王之家。芸辉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白苹。其花红大如牡丹，

1《旧唐书》，第3222—3223页。

不知自何而来也。

与何家村窖藏的物品相比，元载家的物品可以说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结语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而且吸引了东西南北各国、各族的精英来此施展才华，生活享乐。与此同时，东西方大量珍贵的物品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长安，使长安成为一座集聚了各种金银财宝的场所。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金银之都，一个钱币之都，也是一个图籍之都，还是一个人才之都。隋唐时期的长安，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文化结晶，她所集合的部分物质文化精品，又通过使者和僧侣，传播到新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当中，影响着这些东亚都市物质文化的发展。日本正仓院所汇集的唐朝物品，就是长安物质文化东渐的一个最佳的缩影。

2004年12月初稿，2005年12月29日定稿，提交日本中央大学举办“东亚的城市史与环境史研讨会”论文

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

持“唐宋变革论”的学者，一般比较强调唐宋两代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就城市而言，“唐宋变革论”者比较关注的是坊市制的变化，即唐代城市中坊墙的破坏，侵街现象的出现，市场扩大到坊市制度规定的地域范围之外，等等[1]。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近世化”（借用京都学派的说法）并不仅仅在坊市制崩溃这样一个方面，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待考察。本文把视点聚集在唐代长安的王宅向寺观的转移，并考察这种转移的结果，即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2]，最后阐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在唐代“中古式”都城向宋代“近世化”都城转变时的社会史意义。

一、长安的王宅向寺观的转变

唐代长安城是承继自隋代的大兴城，它是开皇二年（582）在汉代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凭空建造的一座规模

1 对于唐代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宋代集市的发展情形，代表性的看法见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1950年初版；再刊于《アジア论考》上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6年；又刊于《宫崎市定全集》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年，1992年；汉译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4—175页。相关论说和争论，参看加藤繁《唐宋时代の市》，原载《福田德三博士追忆论文集——经济研究》，1933年，收入氏著《支那经济史考证》上，东京：东洋文库，1952年，第347—379页；宫崎市定《汉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1962年，第27—50页；刘淑芬《中古都城坊制的崩解》，《大陆杂志》第82卷第1期，1980年，第31—48页；收入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441—480页；妹尾达彦《唐代都市的构造与文化》，《国际中国学研究》创刊号，汉城，1998年，第247—257页；盛会莲《唐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第99—102页；李孝聪《唐代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李孝聪主编《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248—306页。

2 本文的“公共空间”是借用了学者们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公共空间概念，但并不是直接使用他们的概念，而是把这一概念移植到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史中，来指称那些属于社会大众的地理空间。有关此概念的详细论说，别参他文。

宏大的城市，在宫城、皇城东西和南面的外郭城里，以大小不同的里坊分隔着百姓的宅第和佛寺、道观。长安里坊面积约占全城的63.8%，据探测，每坊均长方形，按面积大小可分为三类：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长500至590米、东西宽558至700米；皇城以南其余六列坊较大，南北长为500至590米、东西宽1 020至1 125米；宫城、皇城两侧的坊最大，南北长838米、东西宽1 115米[1]。按照制度，这些坊是被高高的院墙包围着的[2]。

隋代祚短，大兴城中的王宅数量不多，但规模宏大。蜀王秀、汉王谅的宅第都是占一坊之地，现存史料记载秦王俊、晋王广的王宅只有一坊的四分之一，但推测原本或许也是占一坊之地的[3]。但隋代的王宅主要是在京城南面无人居住的几个坊中，蜀王秀宅在归义坊，汉王谅宅在昌明坊，秦王俊宅在崇德坊，也就是韦述《两京新记》卷三所说："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4]只有晋王杨广的宅第在开化坊，距离宫城较近。总的来说，隋代王宅并不在城市中心，而且隋代诸王出镇地方，多不在京城，所以其王宅在城市中的意义和唐朝长安的王宅并不相同。

唐代初年，因为高祖的三子在建立唐朝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除太子建成在东宫外，秦王世民、齐王元吉也都住在宫中。经过玄武门之变，太宗和高宗前期曾以诸王外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第603—605页。
2 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质疑坊墙的普遍存在，见齐东方《魏晋隋唐城市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84页；成一农《走出坊市制研究的误区》,《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5—318页。
3 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9卷，第186—187页。
4 《两京新记》卷三，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刺州郡，但许多人还是留居长安，而且不论他们在京还是在外，都在京城保有王府和王宅。和隋代不同的是，这些王宅以及公主的宅第，不再偏处城南空旷之地，而是位于宫城东西和南面较近的坊里当中，即处于城市中心的位置上[1]。唐代王宅和公主宅第的规模也不小，像贞观初晋王的宅第就占保宁坊一坊之地；有的人还不只一处宅第，如太平公主就有三处宅子[2]。由于唐前期的皇子和公主数量远较隋代为多，他（她）们在京城所占据的居住空间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大多数占一坊四分之一的王宅或公主宅第，按照长安坊里的规模，那也是占据了相当可观的城市空间的，况且是城市中心部位的空间。

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包括公主宅第）间盘桓，从玄武门之变，经过太宗太子的废立、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而登基为帝，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被贬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3]，而诸王宅第最终被玄宗废弃，而将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东北角的“十六王宅”中，以便集中管制[4]。原有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这里面的原因，既有原为龙潜之地不能再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为寺观。

1 有关长安城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研究，参看布目潮沨《唐代长安における王府・王宅について》，《中国聚落史の研究》（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Ⅲ集），1989年，第115—124页；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蒙曼《唐代长安的公主宅第》，《唐研究》第9卷，第215—234页。

2 京洛（李健超）《唐长安城太平公主宅第究竟有几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辑，第181—183页。

3 布目潮沨《唐代前半期における长安公主宅の道观化》，《中国の都市と农村》，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第203—233页。

4 布目潮沨《唐代长安における王府・王宅について》，第118—120页；雷巧玲《从居住方式的变迁看唐王子权利的消长》，《晋阳学刊》1996年第3期，第92—97页；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第193—196页。

以下据《唐会要》、《两京新记》、《长安志》[1]、《唐两京城坊考》[2]（简称《城坊考》）等书，将王宅和公主宅第改作寺院的记录移录如下，并略加考释。个别隋代王府亦附于此。以王府改作寺观的年代为序：

崇圣寺：《两京新记》卷三："崇德坊。西南隅，崇圣寺。隋仁寿元年（601），秦孝王俊舍宅所立。"[3]《长安志》卷九："崇德坊。西南隅，崇圣寺。寺有东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休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677），并为崇圣僧寺。"[4]

兴圣尼寺：《两京新记》卷三："通义坊。西南隅，兴圣尼寺。高祖龙潜旧宅。武德元年（618），以为通义宫。贞观元年（627），立为寺。"[5]唐太宗《舍旧宅造兴圣寺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灵佑，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6]

西明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显庆三年（658）秋七月，敕法师徙居西明寺。寺以元年（656）

---

1 宋敏求《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影印清乾隆四十九年《经训堂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方严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 尊经阁藏金泽文库本《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 · 大业杂记辑校》，第27页。

4《长安志》卷九，第124页上栏。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按崇圣寺下文字引自《长安志》。其中'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误。长安无嘉祥坊，嘉祥为休祥之误。又据1950年在西安市西郊梁家庄出土之《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大法师碑》文中记载：'大业元年（605），有诏令二阇梨为（元德）太子戒师……乃下敕于京邑弘德里为立道德道场。……初以太宗升遐，天经京立，乃于弘德坊寺置崇圣宫，尼众北移在休祥里，即今之道德寺是也。'（道德寺碑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馆）两阇梨是善惠和玄懿尼姑，太子为隋炀帝长子元德太子杨昭。梁家庄出土的道德寺碑正在唐长安休祥坊内。《长安志》所述'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1—182页）

5《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 · 大业杂记辑校》，第26页。

6《全唐文》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7页。

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时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观改就普宁坊。仍先造寺，以其年夏六月营造功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1]玄奘站在佛教的立场上以地窄的理由把道观挤走，实际上西明寺的规模相当大。《两京新记》卷三："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605—618），素子玄感被诛后没官。武德（618）初，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627—649）赐濮恭王泰。泰死后，官市之立寺。"[2]万春公主为高祖女。魏王泰，太宗第四子，后为濮王。

昊天观：《长安志》卷七："保宁坊，昊天观，尽一坊之地。贞观（627）初为晋王宅。显庆元年（656），为太宗追福，立为观。"[3]晋王为太宗第九子，即位为高宗。

招福寺：《长安志》卷七："崇义坊，坊内横街之北，招福寺。乾封二年（667），睿宗在藩立，本隋正觉寺。寺南北门额并睿宗所题。《酉阳杂俎》曰：正觉寺，国初毁之，以其地立第，赐诸王，睿宗在藩居之。"[4]

---

1 慧立、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4页。

2《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 · 大业杂记辑校》，第38页。《城坊考》卷四："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本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宅。大业中，素子玄感谋反，诛后没官。武德中（618—626）为万春公主宅。贞观中以赐魏王泰，泰薨后，官市之。显庆元年（656），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立寺。"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据《两京新记》所载创立的时间是濮恭王李泰死后，官市立寺。李泰死于唐高宗永徽三年十二月癸巳，当时已立寺。另据《长安志》所载西明寺条亦称'泰薨后，官市之立寺'。《唐会要》卷四八西明寺条亦云'泰死，乃立为寺'。徐松在《城坊考》中关于西明寺之创立时间，因引用史料漏掉'泰薨后，官市之立寺'的'立寺'二字，所以把立寺时间推迟四年，实际上是永徽三年（652）已立寺，到显庆元年（656）高宗为孝敬太子病愈在原寺基础上增修，名西明寺。"（第209—页211）

3《长安志》卷七，第111页上栏。

4《长安志》卷七，第111页上栏。

千福寺：《两京新记》卷三："安定坊。东南隅，千福寺。本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673)，舍宅立为寺。"[1]章怀太子，高宗第二子。

太平女冠观：《长安志》卷七："大业坊，东南隅，太平女冠观，本徐[2]王元礼宅。仪凤二年(677)，吐蕃入寇，求太平公主和亲，不许，乃立此观，公主出家为女冠。初以颁政坊宅为太平观，寻徙于此，公主居之，其颁政坊观改为太清观。公主后降薛绍，不复入观。"[3]太平公主是高宗与武则天的女儿。

大荐福寺：《长安志》卷七："开化坊，半已南，大荐福寺。寺院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武德中（618—626），赐尚书左仆射萧瑀为西园。后瑀子锐尚襄城公主，诏别营主第。主辞以姑妇异居有关礼则，因固陈请，乃取园地充主第。又辞公主棨戟，不欲异门，乃并施瑀之院门。襄城薨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684），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中宗即位（705），大加营饰。"[4]襄城公主为唐太宗女；英王为高宗第七子，即后来的中宗，所以他即位后大加营饰。

镇国公波若寺：《长安志》卷十："布政坊，东南隅，废镇国公波若寺。本蒋王恽园地，景龙三年（709）立为寺，景云中（710—711）废。"[5]蒋王恽，太宗第七子。

景龙观(玄真观)：《两京新记》卷二："崇仁坊西南隅，景龙观，〔本〕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

1 《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43页。
2 "徐"，原作"宋"，《城坊考》同。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径改作"徐"(第69页)，是。
3 《长安志》卷七，第112页下栏。
4 《长安志》卷七，第110页下栏—111上栏。
5 《长安志》卷一〇，第125页下栏。

韦庶人数游于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年号为名。词人名士，竞入游赏。”[1]《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俯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2]《长安志》卷八崇仁坊玄真观条补：“天宝十二载，改为玄真观。”[3]按此处“天宝十二载”为“天宝十三载（754）”之误，因为改名“玄真观”的原因，就是十三载二月癸酉玄宗上“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把原本用中宗年号命名的观，改用睿宗谥号来命名，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反映。《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对从长宁公主宅到玄真观的发展有所总结：“崇仁坊。西南隅，玄真观。半以东，本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卫。神龙元年（705），并为长宁公主第。东有山池别院，即旧东阳公主亭子。韦庶人败，公主随夫为外官，遂奏请为景龙观，仍以中宗年号为名。初欲出卖，官估木石当二千万，山池仍不为数。天宝十三载（754），改为玄真观。”[4]东阳公主为太宗女，下嫁高士廉之子高履行，应当与高士廉住在一起。中宗时，韦后当政，其女长宁公主宅第兼并多所宅第、厅堂、庭院甚至金吾卫的官衙，构建自己的豪宅。长宁公主虽然不及其妹安乐公主有名，但也是中宗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

大安国寺：《长安志》卷八：“长乐坊，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710）立为寺，以

1 《太平御览》卷一八○；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 · 大业杂记辑校》，第17页。
2 《新唐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3页。
3 《长安志》卷八，第114页上栏。
4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54页。

本封安国为名。"[1]

福唐观：《长安志》卷八："崇业坊，福唐观。本新都公主宅。景云元年(710),公主生子武仙官,出家为道士,立为观。"[2]公主为中宗长女，嫁武延晖。

九华观：《长安志》卷九："通义坊。西北隅，右羽林大将军、邢国公李思训宅。本左光禄大夫李安远宅，武太后时，高平王武重规居焉。神龙中（705—707），又为中宗女成安公主宅,又为思训所居。思训善画,后为九华观,开元十八年（730），蔡国公主舍宅立，即思训宅。"[3]《城坊考》卷四末句改作："开元中（713—741），睿宗女蔡国公主居之。十八年，舍宅立九华观。"[4]

咸宜女冠观：《长安志》卷八："亲仁坊，西南隅，咸宜女冠观。睿宗在藩之第,明皇升极于此。开元(713)初,置昭成、肃明二皇后庙，谓之仪神庙。睿宗升遐，昭成迁入太庙，而肃明留于此。开元二十一年（733），肃明皇后亦袝入太庙，遂为肃明道士观。宝应元年（762），咸宜公主入道，与太真观换名焉。"[5]咸宜公主为玄宗女。

玉芝观：《长安志》卷十："延福坊,东南隅,玉芝观。本越王贞宅。后乾封县权治于此。又为新都公主宅，施为新都寺。寺废，乃为郯王府。天宝二年（743），立为玉芝观。"[6]越王贞,太宗第八子,后起兵反对武则天而兵败被杀,宅第改为乾封县治。新都公主为中宗女。郯王为玄宗长子。

新昌观：《长安志》卷八："崇业坊，新昌观。天宝

1《长安志》卷八，第118页上栏。
2《长安志》卷八，第123页下栏。
3《长安志》卷九，第124页上栏。
4《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第98页。
5《长安志》卷八，第115页下栏。《长安志》叙述不够清晰，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考释如下："咸宜女冠观，本肃明观，宝应元年，咸宜公主入道，（肃明观）与太真女冠观改换所居，（太真女冠观）并更名曰咸宜女冠观。"（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68页）
6《长安志》卷一〇，第126页下栏。

六载（747），新昌公主因驸马都尉萧衡卒，奏请度为女冠，遂立此观。”[1]公主为玄宗第十一女。

华封观（万安观）：《唐会要》卷五十“观”条：“华封观，平康坊。天宝七载（748），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其地西北隅本梁公姚元崇宅，以东即太平公主宅。其后敕赐安西都护郭虔曜（瓘），今悉并为观，号‘华封’。”[2]华封观《长安志》卷八作“万安观”：“平康坊。西南隅，万安观。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宅置观。”[3]永穆公主为玄宗女。

奉慈寺：《长安志》卷八：“宣阳坊，东北隅，奉慈寺。本开元中（713—741）虢国夫人杨氏宅。虢国即贵妃之姊。其地本中书令马周宅。《酉阳杂俎》曰：安禄山伪命百官，以田乾真为京兆尹，取其宅为寺（府）。后为驸马都尉郭暧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为升平公主追福，奏立奉慈寺。”[4]升平公主为代宗第四女。

可见，唐代长安规模比较大的佛寺和道观，除了极少数的几个由于其他原因而设立外，如靖善坊大兴善寺和崇业坊玄都观从创立之初就是官立寺观，晋昌坊大慈恩寺系高宗在春宫时为文德皇后所立，大多数都是由王宅和公主宅第改建的。也就是说，它们数量上不占大多数，但却是长安的主要寺院和道观。

对于一个中古时期的城市来讲，王宅和公主宅第向寺观的转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主人的更换，而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功能意义的转换，这种社会功能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但是越到中晚唐时期越发明显。

1《长安志》卷一〇，第126页下栏。
2《唐会要》卷五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27页。
3《长安志》卷八，第114页下栏。《城坊考》卷三同，第56页。
4《长安志》卷八，第115页上下栏。

二、从王宅的私密空间到寺观的公共空间

长安城实行坊里制度，每个坊都建有坊墙。在高大的坊墙内，分布着一些民宅，大型的宅第当有自己的院墙，像王宅和公主宅第本身一定是会有自己的院墙的，三品以上的亲王和驸马，按唐朝制度"门列棨戟"，就像我们在长安城郊亲王或公主墓葬壁画中所见到的那样[1]。可以说，王宅和公主宅第是一个被重重院墙包围的私密空间，这里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亲王自家的亲属和服侍人员，偶尔有临幸的皇帝及随行的大臣。因为亲王又有王府，因此亲王与政要的往来应当是在王府进行，而不是王宅。

当一座王宅或公主宅第变成寺院或道观以后，这所私密空间摇身一变，就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举长宁公主宅的例子，上引韦述《两京新记》称："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韦庶人数游于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年号为名（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2]王宅是封闭的空间，"闲人免进"，特别是公主宅第，平日恐怕只有皇帝、皇后以及部分侍臣可以入内；而寺院是公共空间，对公众开放，王宅一旦变成寺院，人们就可以"竞入游赏"了。苏颋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在《景龙观送裴士曹》一诗中说到：

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
池旁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

1 参看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における官人の居住环境》，《历史人类》第27号，筑波：筑波大学，1999年，第1—37页。
2《太平御览》卷一八〇；此据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17页。

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
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1]

据考此诗大约作于开元三年（715），裴士曹指赴河南府士曹参军任的裴耀卿，苏颋时任紫微侍郎兼知制诰[2]。由诗文可见，原本只是听闻的公主宅第，现在变成了仙家道馆，于是文人学士可以在其中约会，赏玩山水，或者迎宾，或者饯行。还有一些游客穿梭于屈曲的池畔，而另外一些游人则在树下赏花。

三、寺观作为公共空间的种种表象

一旦王宅或公主宅第变为寺观，就提供给一个城市一块面积可观的公共空间，虽然不同的寺观也有着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但总的来说，寺观为长安城提供了各种功能的公共空间。以下分几个方面，来探讨寺观的公共空间作用。

（一）公共的政治空间

长安城是唐帝国的权力中心，也是帝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寺院和道观本来是化外之地，不受皇权的控制，但处于长安城中的某些寺院，因为原本与政治的关联，在立为寺观以后，仍然发挥着某种政治空间的作用。我们可以举崇义坊招福寺的例子，这里原本是睿宗在藩时的宅第，立为招福寺后，仍然受到皇室的关怀。“长安二年（702），内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南北两门额，上与岐、薛二王亲送至寺，彩乘象舆，羽卫四合，街中余香，数日不歇。景龙二年（708），又赐真容坐像，诏寺中别建圣容院，是玄（睿）宗在春宫真容也。先天二年（713），敕出内库钱

1 《全唐诗》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册，第805页。
2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 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516页。

二千万，巧匠一千人，重修之。”[1]国家在佛寺道观中设立皇帝的尊像，是为了强化百姓对皇帝的崇拜。

对皇帝偶像的崇拜是和皇帝的圣诞节及国忌行香活动相联系的。《唐会要》卷五〇《杂记》：“（开元）二十七年（739）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2]《唐六典》卷四祠部郎中员外郎条：“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箓）、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已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3]“三元日”指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千秋节日”为玄宗诞辰日；“国忌日”则指帝、后的忌日，唐朝规定这一天有“行香”的制度。“通过皇帝图像在各地寺观中的供奉，以及国忌日寺观行香制度的推行，皇家宗庙祭祀大大贴近民间。于是在唐初‘家国一体’的政治体制解体之后，皇家祭祀又通过宗教的形式而被赋予‘公’的性质。”[4]从地理空间来看，这种在寺观中举行的皇家祭祀，当然具有了公共的意义。

（二）公共的学术空间

寺院原本就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从唐朝初年以来，一些大的寺院作为佛经翻译的译场，集中了许多非常优秀的学术精英，共同翻译佛经。比如太宗时修德坊的兴福寺（弘福寺），高宗时的大慈恩寺，武则天时的崇福寺（太原

1 《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9页。又见《长安志》卷七。
2 《唐会要》第50卷，第1030页。
3 《唐六典》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6—127页。
4 雷闻《论唐代皇帝的图像与祭祀》，《唐研究》第9卷，第276页。

寺），中宗时的大荐福寺等，都是一时的学术中心。但这种有组织的译场，多是官府支持下的活动，秩序井然，民间影响有限。皇家支持的讲经和寺院内部的经义授受式的讲经活动，也是同样，与长安的社会大众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中晚唐时期，寺院作为公共空间，越来越被士人、学子所利用，成为他们读书、聚会、切磋诗句、讨论学术的地方[1]。

长安是科举考生汇集的地方，许多考生就以寺院作为读书、作文的清净之地，《南部新书》乙记："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2]寺院提供给落第考生的栖身之地和学习的场所。如"许栖岩，岐阳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3]。昊天观在保宁坊，规模很大，占一坊之地，因此可以说正是那种安静的习业之所。又如白居易在元和初曾累月居住在永崇里的华阳观，和元稹一起在那里准备制举考试[4]。白居易有诗云："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5]这里的幽静，没有车马的喧闹，正是学子考生读书习业的好地方。等到举子及第后，则有慈恩寺的庆宴，雁塔题名，登塔赋诗等活动，而进士樱桃宴则在崇圣寺的佛牙阁上[6]。这些活动之所以多在寺观中举行，一方面是寺观可以提供这种公众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寺观曾经是士子们辛苦读书的地方。

---

1 严耕望先生曾论中晚唐士子多在山林寺院中习业，以求清静，见所撰《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1959年，第689—728页；收入所著《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第367—424页。不过像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中的大寺观，也可以营造出一个安静的小环境。

2 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2页。

3 《太平广记》卷四七《神仙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4页。

4 白居易《策林序》，《全唐文》卷六七〇，第7册，第6811页。

5 白居易《永崇里观居》，《全唐诗》卷四二八，第13册，第4713页。

6 参看《长安志》、《城坊考》相关部分。

平时的文人聚会也往往选择寺院。张又新《煎茶水记》云："元和九年（814）春，予初成名，与同年生期于荐福寺，余与李德垂先至，憩西厢元鉴室。"[1]大荐福寺在开化坊，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一街自北向南第二坊，属于长安城的中心地带，因此是文人聚会最方便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坊里制度和夜禁制度实施的中古都市，万一在坊门关闭之后没有回到自己居住的坊里中时，就会被巡夜的金吾卫士捉禁，甚至挨打。所以文人学士在寺院中聚会，万一流连时间过长，自可以在寺院中过夜，而不受禁夜制度的限制。

长安佛寺道观里也集中了许多学养精深的高僧和道士，一些文人士子也很愿意和他们进行交流。如高宗时玄都观观主牛弘满，"帝里高门，由多胜侣"，而"帝城豪杰，戚里贵游，仰喻马之高谈，挹如龙之盛德"[2]。《南部新书》戊说："长安……名德聚之安国。"[3]《酉阳杂俎》曰："红楼，睿宗在藩时造。元和中（806—820），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时号为'红楼集'。"广宣与当时诗坛名流如李益、郑细、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杨巨源、王涯、冯宿、欧阳詹、王起、段文昌、雍陶、曹松、薛涛等人都有唱和，自己也留下20多首诗作[4]，可见当时寺院中文人交往的盛况。

白居易的《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写出了文人在道观中交往游玩的情境，可以想见当时道观提供给文人是怎样的一个公共空间：

我与二三子，策名在京师。官小无职事，闲于为客时。

1《全唐文》卷七二一，第8册，第7420页。

2 杜践言《大唐故朝散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玄都观观主牛法师墓志铭并序》，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2—543页。

3《南部新书》，第67页。

4 参看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唐研究》第2卷，1996年，第38页。广宣诗见《全唐诗》卷八二二。

沉沉道观中，心赏期在兹。到门车马回，入院巾杖随。
清和四月初，树木正华滋。风清新叶影，鸟恋残花枝。
向夕天又晴，东南余霞披。置酒西廊下，待月杯行迟。
须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光华一照耀，殿角相参差。
终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1]

我们从诗中可以感受当时作者对于这样一个空间的感受：春色清风，树木上都是清新的叶子，鸟儿嬉戏在花枝上。因为要住宿赏月，所以来时就把车马打发回去，只带着毛巾和手杖。傍晚时分，观赏晚霞。于是在廊下摆上酒席，喝酒赏月，流连忘返。欢歌笑语，彻夜不停。这样的文人雅兴，和寺院外长安城中的名利场形成鲜明对比，也只有长安城内这样的大寺院，才能够显现出这样幽雅和繁闹的空间对照。

寺观作为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的另一个功能，是寺观都有一个公共的图书馆，即经藏。虽然佛寺道观的经藏是以佛典、道书为主，但是我们从敦煌文书所见到的中古寺院图书馆的情形来看，佛寺不仅仅保存佛典，也保存其他宗教的经典以及儒家典籍，还有其他各类书籍，比如学子所用的字书、韵书、诗文集等等。

而且，当印刷术开始应用到书籍印刷时，寺院也是印刷书籍普及的场所，为了弘扬佛法，寺院是最早接受印刷文化的地方，印刷的佛经和佛像，成为向公众传播文化的一种手段。印刷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与公众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能想象印刷书籍从王宅走向民间，但我们从敦煌藏经洞保存的早期印刷品可以看出，印刷书籍更多的是从寺院流传到民间。

1 《全唐诗》卷四二八，第13册，第4713页。

（三）大众文化场所

不过，寺观作为公众文化的场所，更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这里的俗讲和戏曲。

通过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俗讲仪式文》和大量的讲经文、变文文本，我们今天对于寺院面对在俗民众的俗讲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这种俗讲和正统的讲经不同，僧人或其他身份的讲者用抑扬顿挫的声调，通俗地讲解佛经或其他历史故事，寓教化于通俗故事当中。虽然开元时俗讲曾被禁止，但这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是无法禁断的，而且越来越流行开来。到德宗、宪宗时，都颁诏允许俗讲。

中晚唐长安最有名的俗讲僧是金城坊会昌寺或修德坊兴福寺的文溆。赵璘《因话录》卷四角部云："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1]甚至在敬宗宝历二年（826）六月己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2]。

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也记载了长安寺观俗讲的情况：

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841）。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在崇仁坊）令云华寺（在常乐坊）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在翊善坊）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在平康坊）令招福寺（在崇义坊）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在常乐坊）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在金城坊）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在怀

1《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4—95页。
2《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850页。

德坊）、崇福寺（在休祥坊）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在崇仁坊）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1]

又记：

五月一日，敕开讲：两街十寺讲佛教，两观讲道教。当寺（资圣寺）内供奉讲论大德嗣标法师于当寺讲《金刚经》，青龙寺（在新昌坊）圆镜法师于菩提寺讲《涅槃经》，自外不能具书。[2]

我们把这些开俗讲寺院所在放到长安的坊里空间，就可以发现它们散布在京城中部、北部最繁华热闹的地方。其中崇仁坊即开讲佛教，又有道教，而这里也正是京城中最最热闹的地方。

唐代的女性从来也不甘落后，僧人有俗讲，女尼也有俗讲。《南部新书》戊称“尼讲盛于保唐”[3]。保唐寺为大中六年（852）由菩提寺所改，在平康坊，此坊为“诸妓所居之聚”[4]，她们很可能就是尼讲的主要受众。

除俗讲之外，长安寺观也提供给京城大众观看戏剧的场所。《南部新书》戊称：“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在晋昌坊），小者在青龙（在新昌坊），其次荐福（在开化坊）、永寿（在永乐坊）。”[5]讨论唐代士庶问题的学者经常引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庚午条：“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䌹之孙。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故选颢尚之。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轻夫族，

1 圆仁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69页。
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第389页。
3 《南部新书》，第67页。
4 郑棨《北里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04页。
5 《南部新书》，第67页。

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颢弟顗，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1]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看，这也是一条非常说明问题的史料。万寿公主岂能不知道父皇的谆谆教诲，只能说慈恩寺的戏表演得太出色了，使得公主看入了迷，把家中小叔子病危的事情也忘到脑后去了。由此可见晚唐寺院中戏场的魅力。

还有，寺观也是乐舞和歌唱等民间娱乐文艺表演的场所。戎昱有《开元观陪杜大夫中元日观乐》诗：

今朝欢称玉京天，况值关东俗理年。
舞态疑回紫阳女，歌声似遏彩云仙。
盘空双鹤惊几（丸）剑，洒砌三花度管弦。
落日香尘拥归骑，□（好）风油幕动高烟。[2]

按，此处之开元观应当是东都道德坊之开元观[3]，但当时两京寺观的文化面貌应当是一致的。

可以说，中晚唐长安的寺观，已经是民间艺人施展技艺的主要场所。如果没有寺观作为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恐怕宋代的开封街市上和寺院中也不会出现说话和演唱的热闹情形。

1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36页。
2 《全唐诗》卷二七〇，第8册，第3024页。彭庆生《点校本〈全唐诗〉有待修订》下："又（《全唐诗》）第270卷戎昱《开元观陪杜大夫中元日观乐》'落日香尘拥归骑，□风油幕动高烟。'缺一字，《古今岁时杂咏》卷二八作'好'，可据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4期，第7页）
3 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492页，德宗贞元八年（792）戎昱陪杜亚游开元观条。

（四）大众的娱乐空间

长安王宅和公主宅第改成的大型寺观，其中保留了不少亭台楼阁，其雕梁画栋，非常人可以模拟；而且有不少山池树木，屈曲幽雅；还有不少建筑，拥有一些典章故事；当然还有许多绘画高手的画作和书法名家书写的碑石；这些都会吸引文人乃至普通民众前来游赏。

前面提到崇仁坊长宁公主宅第改作景龙观（即玄真观）后，"词人名士竞入游赏"。我们知道，崇仁坊"北街当皇城之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按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1]本来就是一处热闹的繁华地带，而当长宁公主宅第变成道观后，这里的选人和其他诸色人等就很容易地进入玄真观游赏了。长安其他的许多寺院，都是京城民众游玩的处所。

有些寺观还以种植的某种名贵花卉而吸引大批民众，如玄都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洞灵观的冬青、金仙观的竹最为有名。又如晋昌坊大慈恩寺的牡丹。《唐语林》卷七称："京师贵牡丹，佛宇、道观多游览者。慈恩浴室院有牡丹两丛，每开及五六百朵。"[2]《南部新书》丁称："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潾《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3]可见文人墨客是不会错过花开的时节，他们车马奔走，赏花作诗，热闹一时。《酉阳杂俎》卷十九广动植类之四草篇记："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二千一百朵。"[4]《剧谈录》卷下记："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

1《长安志》卷八，第114页上栏。
2 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28页。
3《南部新书》，第49页。
4《酉阳杂俎·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6页。

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1]长安城中的寺院和道观，都以种植名贵花草来吸引信众，而民众到寺院里来欣赏花卉，有的同时向神灵祈福，有的就是来娱乐游玩。

四、结语：唐长安城公共空间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以上仅从四个方面来谈王宅变成寺观后功能的转化，其实长安寺观提供给社会的公共空间不仅仅这四点，其他如政治上的会盟，经济上的交换，商业上的旅舍，慈善方面的病坊等等，在此就不展开讨论了。

城市是由人的活动而产生的地理景观，因此城市的进步要有人的活动来推进，如果城市居民都躲进自己的宅第中，那么这个城市是不会有所进步的。中国中古形态的城市采用坊里制建筑，有着严格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但是，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不会被政府的诏令钳制住的，城市文明的进步会从某些地方生发开来。而长安城中的寺观作为一个公共的地理空间，为城市新文明的生发提供了场所，特别是亲王宅第和公主宅第的规模相当广阔，一旦变成佛寺或道观，就为这种公众文明进步提供了广阔的运作空间。

新的公共空间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活动，其表达方式也必将扩展。寺观本来就有其政治礼仪和祭祀的功能，但这里更是民间文化的舞台。中晚唐佛教、道教都走着世俗化的历程，而民间文化借助寺观这个大舞台变得越来越热闹起来，民间文化使寺观本身也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于是，城市文化生产促进了消费空间的增长，寺观也就逐渐直接介入城市居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受经济因素制约，寺观

1 《剧谈录》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第1483页。

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它推动了城市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北宋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位于宫城南面的汴河大街交通枢纽的位置上，成为四方冲会，既是都城内外的信息中心，又是商旅交易，货物转售的瓦市所在，同时也是士庶百姓参拜、休息、娱乐、游赏等庶民生活场所，常常被看作是宋代步入中国"近世"社会的表征[1]。对比中晚唐长安佛寺的情形来看，寺观中许多庶民文化生活的场景已经与相国寺相当一致，只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所缔造的庞大消费市场还没有明显地出现，但这些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推动各行各业的分工和货币经济的流通，推动消费市场的出现。

可以说，唐代长安王宅向寺观的转变，首先是提供了大众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由此推动了社会分工和消费阶层的增加，如果把庶民生活的活跃看作是中国近世社会特征的话，那么中晚唐的长安，应当已经开始迈出走向近世的第一步。

2007年8月初稿，提交第三届中国史学会"基调与变奏：7—20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3月18日修订，刊《基调与变奏：7至20世纪的中国》①《社会·思想》，台北市，政治大学历史系等，2008年7月，第101—117页

---

1 关于相国寺的一般情况，参看Alexander C. Soper, "Hxiang-kuo-ssu: 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8, 1948, pp.19-45；熊伯履《相国寺考》(修订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徐苹芳《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57—369页；Jinhua Chen, "Images, Legends, Politics, and the Origin of the Great Xiangguo Monastery in Kaifeng: A case-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sacred sites in mediev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5.3, 2005, pp. 353-378。关于相国寺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方面的意义，见赵雨乐《从相国寺看唐宋时期的都城文化》，《新宋学》第2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0—46页，收入作者《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香港：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297页；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其部分章节先期发表在《四川大学学报》、《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上，不俱引)。



盛唐长安与敦煌

——从俄藏《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谈起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当时从东亚、中亚、南亚来的佛教精英也散布在城中大小寺庙中，这些寺庙成为当时东亚世界的佛教中心。敦煌位于帝国的西陲，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中心。由于唐代留存的文献中有大量产生在长安，而敦煌得天独厚地留下了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藏经洞丰富的文书，使得我们对于两地文化交往的探讨有了可能。

过去，我们曾经从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看出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已经传到敦煌。另外，我们从敦煌保留的沙州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以及《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的记载，得知敦煌归义军政权对唐朝“会昌灭法”后的复兴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来谈谈盛唐时期长安佛教文化对敦煌的影响。

俄藏敦煌文书Дx.02881＋Дx.02882《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九日沙州大云寺授菩萨戒牒》[1]，是一件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书，自1998年公布以来，尚未见到与之相关的综合性研究。笔者在所撰评介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的文章中，曾提示这是目前所见敦煌最早的戒牒，有助于我们理解敦煌的授戒及相关问

1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彩色图版一，第109—110页。

题[1]。衣川贤次先生在所撰《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一文中，录出该文书的文字，主要目的是探讨《御注金刚经》的影响问题[2]。除了戒牒和提到《御注金刚经》外，这件文书还和唐朝前期佛教律宗的传播史、佛教律仪制度有关，其上所印的佛像等，也是早期印刷术的绝好资料，不过，本文主要围绕着这件戒牒所反映的长安与敦煌佛教界的联系问题，略作考察。

一、文书的录文和校订

衣川先生在上引文中对这件文书做了校录[3]，对于我们有许多启发，但也有个别文字我们的看法有所不同，现将我们的录文抄出，并略加讨论（图25）：

（前缺）

1）[　　　　　　]菩萨戒□□[　　　　　　]

2）[　　　　　　]□乌波斯迦伍[　　　　　　]

3）[　　　　　　]不发出离之心，恐还[　　　　　　]

4）阎浮□（提）□□□□□（大）唐国沙州燉煌县大云寺僧伽□□□

5）京大安国寺法师讲《御注金刚经》、《法华》、《梵网经》，清净道场，

6）听法二七□（日），然后㤘悔四重、五逆、十恶、谤方等经一切诸

7）罪，今对十方诸佛、一切贤圣、天曹地府、善恶

1 参见拙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原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68页；收入拙著《敦煌学新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2 衣川贤次《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14—125页。

3 此文衣川先生又重刊于《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6号，2004年，第1—75页，其中第6—7页的文本较《新世纪敦煌学论集》所刊文本更佳，故此处以前者为据。

部官、阎罗

8）大王、怨家债主、负财负命、□□道眼证明，令得罪障消

9）灭，授得金刚不图□□□□菩萨戒品具足，任为公验，请

10）乞大乘六念，谨牒。

11）第一念佛　第二念法　第三念僧　第四念戒　第五念舍

12）第六念天

13）开元廿九年二月九日授得菩萨戒

佛像

14）传菩萨戒和尚沙门释道建

15）授菩萨戒同学伴侣十方诸大菩萨

16）证菩萨戒师十方诸佛

佛像

17）教授阿阇梨当来弥勒菩萨

18）达磨阿阇梨释迦牟尼佛

佛像

19）授菩萨戒和尚卢舍那佛

20）图有众多善男子、善女人等，今田我所，求受菩萨戒，□（所）

21）谓摄律仪戒，誓断一切恶；

22）摄善法戒，誓求无上菩提；饶益有情戒，誓度法戒（界）众生；

23）是诸佛三聚净戒。过去诸佛菩萨已受已学已成佛竟，未

24）来菩萨当受当学当作，现今菩萨今□□□时学，即拟行

25）当来作佛。如（汝）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持不？

26）能持。于后如法修行，莫放逸。

文书第13—19行的上部空白处，有三个墨印佛像，刻工甚佳，系早期中国印刷术的遗迹，值得珍视。另外，还有两个方形朱印，作坛城状，一个钤在授戒时间处，另一个钤于第2行和第3行的下部，由于文书下残，只能看到印章的一角，从其他戒牒可以断定，这里是受戒者的名字所在，因此加印其上。

上面是我们据图版校录的文字，对比衣川贤次先生的录文，不同之处，按行说明如下：

第4行开头仅存“阎浮”二字，全称当是“南阎浮提”，即南瞻部洲的异译。《释氏要览》卷下载：“阎浮提，又云剡部，即此洲名，在弥卢山南，故曰南阎浮提。”[1]敦煌文书S.6264《天兴十二年（961）二月八日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中即有“南阎浮提”名[2]。唐朝与于阗在佛教世界中都属于南阎浮提洲，如Дx.02889《乾德二年（964）五月八日沙州三界寺授千佛戒牒》开头称“南瞻部洲娑诃世界沙州三界寺”[3]，仿此，本行缺文或许可以补作“提洲娑诃世界大”，空格大致可以容纳。

第5行“京大安国寺”：敦煌有安国寺，是一座尼寺，据李正宇先生的考证，该寺始见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巳年（789），至北宋淳化五年（994）犹存[4]。开元二十九年时，沙州无安国寺存在的证明，而且敦煌的安国寺，从未加“大”字。其实“大”字旁边补写着一个小小的“京”字，衣川先生未录，我们在电脑中把图像放大，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1 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2127号，第306页上。

2 见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 《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彩色图版一。

4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30页。

此“京”字当补于“大安国寺”前，指的是京师长安的著名寺庙大安国寺。

第6行“悃悔”：衣川先生录作“□晦”，似误。

第9行“金刚不坏”：衣川作“金刚大德”。

第14行：“传菩萨戒和尚沙门”的名字“道建”，衣川缺而未录。此二字为传戒沙门签名，草体，较难辨识，审其字形，似作“道建”，作为僧名，于文意亦通。但亦不敢肯定，为行文方便，文中即以“道建”称之。

第20行，“今”字，衣川先生作空格，今据残划补录。

第20行，“于”字，衣川先生作空格，今据荒川正晴先生所见原卷补录。

第20行末字缺文，衣川先生录文无，视所缺纸幅，当有一字；所缺疑为“所”字，属下读。“所”字后为亲见原件的吉田丰先生落实。

第23—25行“未来菩萨当受当学当作，现今菩萨今□□□时学，即拟行当来作佛。如（汝）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持不？”衣川先生标点为“未来菩萨，当受当学当作；现今菩萨，今□□□时学即拟行，当来作佛。如（汝）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持不？”

二、长安大安国寺

Дx.02881＋Дx.02882《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九日沙州大云寺授菩萨戒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见最早的菩萨戒牒，而且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唐朝都城长安大安国寺的授戒师道建来到沙州，作为传授菩萨戒和尚，在敦煌县大云寺主持了一次菩萨戒授受仪式。按菩萨戒可授予僧俗两界，史籍所记一般为有威望的僧人主持授戒仪式，如唐代贞观初期玄

琬为皇太子、诸王等授菩萨戒[1]，永徽二年（651）玄奘授菩萨戒予谷州刺史杜正伦等人[2]，法藏为中宗、睿宗的菩萨戒师[3]。开元二十九年沙州大云寺的授菩萨戒仪式中，也有“众多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明这是僧俗两界都参加的一场大型授戒仪式。

我们先来看看京师大安国寺是一所什么样的寺院。大安国寺在长安街东长乐坊，宋敏求《长安志》卷八记载：

朱雀门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东之第二街。街东从北第一长乐坊。后改延政坊。

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710）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宪宗时，吐突承璀盛营安国寺，欲使李绛为碑文，绛不肯撰。后浸摧圮，宣宗欲复修，未克而崩。咸通七年（866），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酉阳杂俎》曰：红楼，睿宗在藩时造。元和中，广宣上人住此院，有诗名，时号为“红楼集”。[4]

按照妹尾达彦先生的推断，其中属于开元十年成书的韦述《两京新记》的内容当是：“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旧宅，景云元年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5]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补充了一些内容：

《寺塔记》：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西北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型。《名画记》：安国寺有吴道玄、杨廷光、尉迟乙僧画。《南部新书》：长安名

1 《续高僧传》卷二二《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第2060号，第616页。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8页。

3 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第2054号，第284页。

4 《丛书集成初编》第32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07页。

5 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8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德多聚安国寺。《唐语林》：刘相国瞻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谒餐。段成式《寂照和尚碑》：自长庆中、宝历末、大和初，皆驾幸安国寺。[1]

根据上述地理书的记载，附以相关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得知大安国寺的大体情形。

大安国寺位于长安城东北角的长乐坊，这里北面是大明宫；东面原是禁苑，开元后改作十六王宅，为皇子所居之地；西面是翊善坊，南面是大宁坊，多为贵族、宦官、禁卫将军所居。大安国寺基址位于长乐坊的东半边，原是睿宗的本宅，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这里立为佛寺，即用睿宗本来所封的“安国相王”的封号为寺名[2]。据说，睿宗当时“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传说这是大食国（阿拉伯帝国）进贡的宝珠，后来被一识宝的商胡买走[3]。虽然已经改作佛寺，但睿宗本宅的一些建筑并未拆除，如“红楼”，元和（806—820）中诗僧广宣上人住其中，于是成为文人雅集之所，白居易等人都曾有诗

1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页。

2 《唐会要》卷四八：“景云元年九月十一日，敕舍龙潜旧宅为寺，便以本封安国为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92页。）

3 《太平广记》第402卷《宝二》之《水珠》：“大安国寺，睿宗为相王时旧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场焉。王尝施一宝珠，令镇常住库，云值亿万。寺僧纳之柜中，殊不为贵也。开元十年，寺僧造功德，开柜阅宝物，将货之。见函封曰：‘此珠值亿万。’僧共开之，状如片石，赤色，夜则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议曰：‘此凡物耳，何得值亿万也？试卖之。’于是市中令一僧监卖，且试其酬直。居数日，贵人或有问者。及观之，则曰：‘此凡石耳，瓦砾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后，或有问者，知其夜光，或酬价数千。价益重矣。月余，有西域胡人，阅市（“市”原作“寺”，据明抄本改）求宝，见珠大喜。偕顶戴于首，胡人贵者也。使译问曰：‘珠价值几何？’僧曰：‘一亿万。’胡人抚弄迟回而去。明日又至，译谓僧曰：‘珠价诚值亿万，然胡客久，今有四千万求市，可乎？’僧喜，与之谒寺主。寺主许诺。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仍谓僧曰：‘有亏珠价诚多，不贻责也。’僧问胡从何而来？而此珠复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国人也。王贞观初通好，来贡此珠。后吾国常念之。募有得之者，当授相位。求之七八十岁，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军行休时，掘地二尺，埋珠于其中，水泉立出，可给数千人，故军行常不乏水。自亡珠后，行军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顷泉涌，其色清冷，流泛而出。僧取饮之，方悟灵异。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39页。

吟诵[1]。

大安国寺作为睿宗的本宅所捐之寺，在其在位时一定大力崇修过，但睿宗很快下台，其子玄宗继续修饰，其中"佛殿，开元初玄宗拆寝室施之"[2]，可见玄宗为表孝心，很重视对此寺修缮。这从大安国寺汇集了盛唐许多画坛名手的作品也可见一斑。据会昌时段成式所撰《寺塔记》上：

长乐坊安国寺。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西北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型）。[3]

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所载更详，当时还能够看到的大安国寺壁画有（序号是笔者所加）：

①东车门直北东壁，北院门外，画神两壁及梁武帝郗后等，并吴画，并题。②经院小堂内外，并吴画。③西廊南头院西面堂内南北壁，并中三门外东西壁梵王、帝释，并杨廷光画。④三门东西两壁释天等，吴画，工人成色，损。⑤东廊大法师院塔内，尉迟画及吴画。⑥大佛殿东西二神，吴画，工人成色，损。⑦殿内维摩变，吴画。⑧东北涅槃变，杨廷光画。⑨西壁西方变，吴画，工人成色，损。⑩殿内正南佛，吴画，轻成色。[4]

大安国寺也是许多高僧大德驻锡之地。《宋高僧传》第十七《唐京兆大安国寺利涉传》云：

1 如杨巨源《送定法师归蜀，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三三三；白居易《广宣上人以应制诗见示因以赠……居安国寺红楼院以诗供奉》，《全唐诗》卷四三八；陈至《红楼院》，《全唐诗》卷四八四；雍陶《安国寺赠广宣上人》，《全唐诗》卷五一八；李益、广宣、杜羔《红楼下联句》，《全唐诗》卷七八九等。

2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7页。

3 同上。

4 冈村繁《历代名画记译注》（《冈村繁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3—174页。

释利涉者，本西域人也，即大梵婆罗门之种姓。夙龄彊志，机警溢伦，宗党之中，推其达法。欲游震旦，结侣东征，至金梭岭，遇玄奘三藏，行次相逢，礼求奘度。既而群经众论，凿窍通幽，特尔远尘，归乎正道，非奘难其移转矣。奘门贤哲辐凑，涉季孟于光、宝之间。其为人也，犹帛高座之放旷。中宗最加钦重，朝廷卿相感义与游。开元中，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位矣。檀施繁炽，利动人心。[1]

因为大安国寺所在的大宁坊是靠近大明宫的官人集中居住地，所以利涉在此很容易与朝廷卿相们交游，而从利涉开元中讲经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当时大安国寺的盛况。

开元以降，大安国寺仍然是长安重要的寺院之一，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戊说："长安……名德聚之安国。"[2]而且，段成式《寂照和尚碑》说："自长庆（821—824）中、宝历（825—827）末、大和（827—835）初，皆驾幸安国寺。"[3]德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曾驾幸大安国寺[4]，显然一直受到皇家的供养。武宗会昌五年（845）诏天下毁佛废寺，大安国寺亦在其列。宣宗欲复修之，未克而崩。懿宗咸通七年（866），以先帝旧服御及孝明太皇太后金帛俾左神策军再建之。

可以说，长安的大安国寺是京城中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因为它是由皇家宅邸改建而成，所以一直受到李唐皇室的关照，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皇家供养的寺院。开元二十九年大安国寺的僧人前往沙州授戒，并不是偶然的，他显然是被挑选出来而作为皇家寺院的代言人来到敦煌的。

1 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七，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9—420页。
2 钱易《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7页。
3《全唐文》卷七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38页。
4 德宗之幸安国寺，见《宋高僧传》卷一五《唐湖州八圣道寺真乘传》，第373页。

三、长安佛教文化对敦煌的影响

这件戒牒为我们探讨盛唐时期都城长安佛教文化对边境城市沙州的影响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讯。我们注意到，作为授戒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释道建还用了14天的时间，为大云寺僧众宣讲了《御注金刚经》、《法华经》、《梵网经》三部经典。这样的内容在我们所见到的授菩萨戒牒中是没有见到过的，值得关注。

《金刚经》是大乘佛典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其篇幅不大，却涵盖了大乘般若空宗思想的精华，因此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唐玄宗为了推行儒、释、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从三教中各选一本典籍，亲自进行注释，颁行天下。与儒家的《孝经》，道教的《道德经》并列的，就是佛教的《金刚经》。敦煌歌辞《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唱道："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1]

《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四记：

> 时圣上万枢之暇，注《金刚经》，至〔开元〕二十三年著述功毕。释门请立般若经台，二十七年其功终竟。僧等建百座道场。七月上陈，墨制依许。八月十日，安国寺开经。九日暮间，西明齐集，十日迎赴安国道场，讲御注经及《仁王般若》。[2]

由此可知，开元二十三年玄宗注《金刚经》毕功，到二十七年长安僧人立般若经台，其年八月九日僧众在西明寺集合，十日赴大安国寺道场讲《御注金刚经》和《仁王般若经》。从这里可以看出，长安大安国寺是开始宣讲《御注金刚经》的地方，很可能为了纪念《御注金刚经》撰成

1 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34页。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第2－57号，第878页。

而立的般若经台，就在大安国寺内。

不到两年后的开元二十九年二月九日，从大安国寺出发的道建和尚来到沙州，在沙州大云寺宣讲玄宗新撰的《御注金刚经》，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某种政治宣传的意思[1]，就像武则天向各地颁送《大云经疏》一样。

沙州大云寺应当是武周时期的官寺，但开元十六年唐玄宗下令每州立开元寺为官寺[2]，沙州也有开元寺，因此开元二十九年时的大云寺已经不是官寺，但仍然是和龙兴、开元同等重要的沙州寺院，道建在此讲经，可能和为该寺僧人授戒有关，也可能是沙州当时的法会就设立在大云寺。《御注金刚经》在此宣讲，给敦煌的一些民众灌输了最新的精神营养。

衣川贤次先生在《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经〉的复原与研究》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御注金刚经》的流行情况，并指出现存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御注金刚经》的存在[3]。敦煌写本S.2068《御注金刚经》，可以和我们讨论的戒牒所记道建宣讲事迹相印证。

道建在沙州大云寺宣讲的第二部经典是《法华经》，即《妙法莲华经》。这本经书也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经典，鸠摩罗什的译本盛行于世，在中古中国社会流传广远，影响甚巨。敦煌写本中这本经的抄本有数千部之多[4]，可以看出社会上读诵、抄写、供养此经的人数之多。对于唐朝僧人来说，这大概是官府规定要读诵的主要经典。最近，吐鲁番巴达木113号墓发现了一件《唐龙朔二年（662）西

1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记："开元二十四年，帝亲注《金刚般若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都督河南元彦冲躬请俨重光圣日，遂阐扬幽赞，允合天心。"这条材料可以作为道建赴沙州宣讲《御注金刚经》的注脚。

2 《唐会要》卷五十"杂记"条："[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

3 衣川贤次上引文，第114—115、119—125页。

4 参看兜木正亨《敦煌法华经目录》，东京：灵友会，1978年。

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其中记载僧人的“学业”，就把诵读《法华经》放在首位[1]；而吐鲁番旧出《武周证圣元年（695）五月西州高昌县崇福寺转经历》中，记录在前面的新剃度僧人读《法华经》，而后面大概法腊稍长的僧人则是转读《大智度论》[2]。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来看，《法华经》是年轻僧人尤其要诵读的经本，因此道建在授戒法会上宣讲它，是有其道理的。

与《御注金刚经》和《法华经》相比，《梵网经》才是和授戒活动直接相关的经典。

《梵网经》两卷，鸠摩罗什译，上卷讲卢舍那佛为释迦牟尼佛解说菩萨修道阶位的四十法门；下卷主要说菩萨戒的十重四十八轻戒相[3]。该经“是所有菩萨戒经在中国流通得最广的一种”[4]，是汉地传授大乘戒的主要典据，特别是在5到10世纪，成为汉地律典的热点、菩萨戒的代表，并对净土教的礼佛忏悔和禅宗的清规都产生了直接影响[5]。在现存50件敦煌戒仪文书中，梵网经系的菩萨戒仪所占的比重最大[6]。对比开元二十九年戒牒的文字和内容，无疑许多都是直接承袭自《梵网经》的，如《梵网经》卷下说：卢舍那佛“为此大众，略开百千恒河沙不可说法门中心地，如毛头许，是过去一切佛已说，未来佛当说，现在佛今说，三世菩萨已学当学今学”[7]。接下来，卢舍那佛讲解十重罪

---

1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0—61页。

2 《吐鲁番出土文书》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1—235页。关于以上两件文书的讨论，见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文物》2007年第2期。

3 参看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3辑《梵网经》，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06—209页。

4 圣严《法鼓全集》第1辑第3册，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344页。

5 土桥秀高《敦煌的律藏》，《讲座敦煌》7《敦煌和中国佛教》，东京：大东出版社，1984年，第243页。参看湛如《敦煌菩萨戒仪与菩萨戒牒之研究》，《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第75页。

6 湛如上引文，第78页。

7 《梵网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卷，第1484号，第1003页。

时说："若受菩萨戒不诵此戒者，非菩萨非佛种子。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学，一切菩萨当学，一切菩萨今学。"[1]《开元廿九年（741）授戒牒》云："过去诸佛菩萨已受已学已成佛竟，未来菩萨当受当学当作，现今菩萨今□□□时学，即拟行当来作佛。"可见戒牒中的字句及思想是对经文承袭、整合的结果。因此可以断定，该戒牒是纯粹的《梵网经》系的菩萨戒牒，而道建在授戒法会上宣讲《梵网经》，则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

开元二十九年来到沙州讲经、授戒的释道建，应当是大安国寺中有一定律学修养的人物。上一节我们主要从政治和文化艺术层面介绍了大安国寺的情形，实际上，大安国寺也一直是长安城中一个重要的律学中心，许多有名的持律大德曾在此活动。

唐朝初年长安最有名的律僧无疑是创立南山宗的道宣（596—667）。显庆三年（658），西明寺落成，道宣被任命为该寺的上座。道宣著述丰富，弟子众多。《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说："受法传教，弟子可千百人。其亲度曰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2]虽然我们尚无材料可以说明大安国寺的律学与道宣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从《宋高僧传》等材料中，可以看出一些间接的联系。如文纲的弟子崇业，"学毗尼于文纲之法集"，至景云元年，"睿宗圣真皇帝操心履道，敕以旧邸造安国寺，有诏业入承明熏修别殿，为帝授菩萨戒，施物优渥，佥回舍修菩提寺殿宇，抑由先不畜盈长之故也。"[3]可见，睿宗在舍宅造大安国寺的同时，请崇业入内殿，给自己授菩萨戒。由此或可以推知新立的大安国寺的戒法，应当同样采用睿宗推

1《梵网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卷，第1484号，第1004页。
2《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第329—330页。
3《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崇业传》，第342页。

重的崇业一系的律学。又如释玄俨先师事富春僧晖，后在光州岸师（道岸）处受具戒，“后乃游诣上京，探赜律范，遇崇福意律师（满意）并融济律师，皆名匠一方，南山上足，咸能升堂睹奥，共所印可。由是道尊戒洁，名动京师。安国授记，并充大德”[1]。崇福意律师即满意，是相部宗创始人法砺的弟子，也曾从道成学习，与怀素同学，世称西塔律师。据本传，满意也是南山宗道宣的上足弟子，而玄俨登堂入室，成为他的学生。到大安国寺建立时，玄俨成为该寺的大德。

从玄俨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京城里虽然有道宣的南山律、满意的西塔律和怀素的东塔律三个宗派，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有些年轻僧人在寻师问道时是向各派高僧学习佛法。比如释辩才在荆州玉泉寺受具足戒，天宝十四年（755）以前，他“闻长安安国寺怀威律师、报恩寺义颁律师，法门具瞻，师资表率，遂伏膺请业。有疑必决，无义不通，厕于二宗，推为上首”[2]。又如释昙一，“开元五年，西游长安，依观音寺大亮律师传毗尼藏，崇圣寺檀子法师学唯识、俱舍等论，安国寺印度沙门受菩萨戒”[3]。据梁肃《越州开元寺律和尚塔碑铭》[4]，此安国寺的印度沙门即密教开元三大士之一善无畏，其律学体系是和中国系统的南山、西塔、东塔不同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5]。可见，开元时大安国寺的律学有着不同的系统，相容并蓄。过去研究者受后代佛教宗派的影响，总是想把唐朝的某个僧人或某个寺院指为属于某个宗派，其实这往往并不是历史事实。

1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越州法华山寺玄俨传》，第342页。
2 《宋高僧传》卷一六《唐朔方龙兴寺辩才传》，第387页。
3 《宋高僧传》卷一四《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第352页。
4 同上传校勘记，第357页。原碑载《唐文粹》卷六二。
5 参看朱立峰《佛教律宗与唐代政治——以唐代两京地区为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5年，第54—57页。

小野胜年先生指出，《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记随鉴真东渡日本的大安国寺僧道抗、璇光可能是律僧，这也表明大安国寺从盛唐以来与律宗有很深的关系[1]。按《东征传》记天宝二年（743）鉴真一行从扬州出发打算出海时，正是海盗猖獗的时期，有些人退缩，道航说“今向他国，为传戒法，人皆高德，行业肃清”[2]，表明他是传戒律僧无疑。因此，小野先生的推测可以接受。这两个大安国寺的僧人，汪向荣先生整理本《唐大和上东征传》作“道航”、“澄观”[3]，值得注意的是，道航其实是当时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家僧，所以李林宗曾写信给扬州仓曹李凑，让扬州方面造大舟，送他们出境。后来因为僧人内部矛盾，道航等被诬告与海贼联络而下狱，多亏道航的这层关系，才解救了大家[4]。

道航、澄观随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离开长安的时间是天宝元年，和道建开元二十九年或此前一年去敦煌的时间非常相近。史料有缺，虽然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大安国寺律僧的资料不多，但已有的资料告诉我们，大安国寺的律僧不仅东渡日本，而且西到敦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扬菩萨戒的律学思想。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除了以洛阳为首都的武则天时期外，高宗时期和玄宗初期，长安律学的中心应当在道宣所在的西明寺和满意、怀素所在的崇福寺（西太原寺），但是到了玄宗中后期，大安国寺因为与皇家的特殊关系，日益成为重要的律宗重镇。到了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曾诏两街临坛大德14人，齐至大安国寺，来定夺《四分律》新、旧两疏的是非，令临坛大德如净等于大安国寺律院佥定一本流行。德宗建中元年（780），《新

1 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京都：法藏馆，第71页。按：小野所据《东征传》版本所记僧名作“道抗”、“璇光”，后文所引汪向荣校注本作“道航”、“澄观”。

2 〔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页。

3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39页。

4 《唐大和上东征传》，第39—46页。

念定〈四分律〉疏》十卷完成，进呈给新即位的德宗。最后在圆照的努力下，德宗允许原来的新旧两疏并行不废[1]。这次重要的调整律宗内部问题的会议在大安国寺召开，充分体现了大安国寺的重要地位。

大安国寺僧道建在开元二十九年前往沙州授戒，同时宣讲佛经，他带给敦煌的，应当不仅仅是戒律，还有其他。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许多戒律写本可以证明，长安的戒律思想和实践已经由道建以及和许多不知名的僧人传入敦煌。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出现的一些新的画样，如绘制于天宝年间（742—755）的第103窟南壁西侧大型向心式《法华经变》，就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来[2]。虽然我们不能说，其中一些经变画就是开元末年从京师来的僧人直接带来的画样，但确实为我们考虑一些莫高窟壁画受长安的影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本文第二节所介绍的大安国寺一些佛教壁画的题材，同样也见于敦煌莫高窟，两者的关系，有待探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莫高窟第323窟东壁门两侧的初、盛唐壁画上，绘有一组表现僧人宁肯舍身也要严守戒律的图画，它们和同一洞窟南北两壁所绘佛教感应故事画以及西壁的瑞像雕塑一起，构成莫高窟一个十分独特的洞窟。马世长先生指出，这些戒律画的榜题表明，其内容主要出自《大般涅槃经》，同样的戒律内容也见于《梵网经》[3]。巫鸿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洞窟中所绘感应故事、戒律画以及瑞像雕塑，都和南山律师道宣的学说有关，而道宣有弟

1 《宋高僧传》卷一五《唐京师西明寺圆照传》，第376—379页。参看徐文明《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2卷，2002年，第471—475页。

2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153。更清晰的图版，见贺世哲编《敦煌石窟全集》7《法华经画卷》，第72页，图61。参看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48—153页。

3 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2年第2期，第80—96页。

子千百人，河西也应有其追随者，因此这个洞窟与道宣有密切关系，或许这个洞窟就是律宗授“菩萨戒”的戒坛所在[1]。这个壁画的绘制可能早于道建的到来，但从道宣的西明寺律僧和大安国寺律僧的关系来看，道建的沙州之行必然继续着道宣律学在敦煌的传播。

根据俄藏敦煌文书Дx.02881＋Дx.02882《开元廿九年（741）二月九日沙州大云寺授菩萨戒牒》，我们知道，开元二十九年二月，唐朝都城长安大安国寺僧人释道建，曾经受命来沙州主持授戒仪式，并宣讲唐玄宗刚刚编纂完毕的《御注金刚经》，以及《法华经》、《梵网经》。此举为长安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通过两地的联系，长安新的佛典、画样、艺文等，都传入敦煌，给敦煌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也为今后我们探讨长安与敦煌的关系问题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附记：本文完稿后，承张涌泉、衣川贤次、荒川正晴、吉田丰、朱玉麒、季爱民、朱立峰诸位订补，谨致谢意。2007年1月2日完稿于东京，原载《浙江大学学报》第37卷第3期，2007年5月，第15—25页

1 巫鸿《敦煌323窟与道宣》，胡素馨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333—348页；又收入《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18—430页。

《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

2001年6月，在邓小南教授和我一起主办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佐竹靖彦教授发表《〈清明上河图〉为何千男一女》，分析了《清明上河图》中不多的几个妇女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角色[1]，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定制了专门的展柜，将总长5米多的《清明上河图》画卷全部展开，呈现给观众[2]。笔者与邓小南教授、张希清教授和博士生梁建国一起，在

1 文载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785—826页。

2 关于故宫藏卷的基本情况和早期研究，参看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原载《文物精华》1959年第1期；张蔷编《郑振铎美术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221—247页；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1958年，第35—49页。关于《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汴梁都城景观的详细考察和相关问题的争论，参看R. Whitfield, “Chang Tse-tuan's *Ching-ming shanghe tu*”,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Painting*, Taipei, 1972（未见）；徐邦达《清明上河图地理位置小考》，《美术研究》第2期，1979年，第75—76页；木田知生《宋代开封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史林》第61卷第5期，1978年，第130—144页；伊原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と宋都开封の风景》，《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4号，1980年，第15—36页；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をわむ》，勉诚出版，1994年；L. C. Johnson, “The Plac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ng Dynasty Dongjing”; V. Hansen, “The Mystery of the Qingming Scroll and Its Subject: The case against Kaifeng”；以上二文载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6, 1996, pp.145-182, 183-200; J. K. Murray, “Water under a Bridge: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Qing-ming Scroll”; J. R. Allen, “Standing on a Corner in Twelfth Century China: Asemiotic-Reading of a frozen moment in the *Qingming shanghe tu*”; S. Wang, “Consistencies and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gate to the river-bend in the *Qingming shanghe tu*”；以上三文均载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7, 1997, pp.99-107, 109-125, 127-136；周宝珠《〈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9—128页；Tsao Hsingyuan（曹星源）,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the Handscroll ‘*Qingming shanghe tu*’”,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3, 2003, pp.155-179；伊原弘《王朝の都・丰饶の街》，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6年，第147—202页。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年代，一般认为在12世纪初，R. Barnhart认为在11世纪中叶，见所撰“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nd the Song Period (960-1279)”,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eds. Yang Xin et al., New Heven and Beij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and Waiwen Press, 1997, p.105。曹星源上引文对其结论做了补充。但这一年代差异对于我们的讨论影响不大。

故宫博物院展宣部的孟嗣徽研究员陪同下，一起观摩了这幅珍贵的画卷。但展室内观者排成长龙，虽然我们被特许在画卷前面多停留了片刻，也无法仔细观察那上面800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这是我去参观的主要目的。好在故宫方面早就理解像我这样的参观者的心情，用极其高精度的数码摄影技术，将全卷摄制成数字图像，我们可以在另外的展室的电脑屏幕上，清楚地看到画卷上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邓小南教授在数点着上面的女性人物，而我则想看看上面到底有没有胡人，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沿线、包括唐朝东西两京的粟特胡人。

一、《清明上河图》上的唯一胡人

我们从长卷的开始部分仔细观察，远郊的行旅，河岸边劳动的人群，热闹的过桥场面中嘈杂的人众，城内外酒楼、店铺、宅院内外和街道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我们借助电脑的放大技术，对于这些人物形象一一审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物，不论从服饰还是面相，都不能看作是深目高鼻、奇装异服的胡人。在即将没有信心的时刻，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那座雄伟的城门时，眼前为之一亮，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驶的骆驼，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驮囊，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于是，我们的目光很快集中到城门前中心位置的那位牵驼人的脸上。他的穿戴和旁边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那突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窝、高翘的鼻梁、厚重的嘴唇，都让我们不得不把他和周边的汉人区分开来。我想这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图26）。虽然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的典型，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胡人，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而且也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

的商品上，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定画家张择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

回来后翻检图书，才发现张庆捷先生早就在讨论北朝隋唐时期的胡商图像时，注意到了《清明上河图》上的这幅图像。他说："检核胡商图大量存在时间的上下限，上限是北齐、北周，下限是唐后期，与胡商骆驼俑存在的时间基本相当。到唐晚期，胡商图渐趋减少。但到宋辽时，由于社会上仍有胡商，因此在当时的绘画中，还有反映这方面的内容。"虽然他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但他这里所附的图42，就是《清明上河图》城门的部分[1]。可惜的是图中所示只是城门内侧部分，其中并没有胡人图像，而胡人图像其实是在城门之外，这大概是排版时的手民之误。在讨论《清明上河图》的论著中，很少有人注意城门内外的这个场景，作为例外的大概是张琳德（Linda C. Johnson）的《〈清明上河图〉在宋代东京的历史地理位置》一文，此文虽然没有谈到这个胡人，但指出经过城门的这个驼队是西方世界的象征，因为中古北方城市如长安、东京的西门正是这些驼队沿丝绸之路前往西方的出发点，所以她把《清明上河图》上的这座城门比定为开封的西门[2]。

《清明上河图》中的这个胡人，左手抬到肩的位置，大概是牵着缰绳；右手指向前方的道路，似乎在吆喝前面的人闪开，有驼队经过。他的身后是一匹高大的骆驼，大半个身子已经从城门中显现，背上驮着货物（图27）。在城门的另一侧，有一峰骆驼的头部已经被城墙挡住，但大半身露在外面（图28）。另外还有两峰骆驼跟在后面，身上也都驮着货物或者架子之类的东西，也可能是旅途中的

1 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荣新江、李孝聪合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94—195页，图42。

2 L. C. Johnson, "The Place of *Qingming shanghe tu*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ng Dynasty Dongjing," p.161；日文翻译，见伊原弘编《清明上河图をわむ》，第324页。

用具（图29）。从骆驼的步伐上看，行驶缓慢，好像驮载的货物很沉。驼队行走的方向是走向城外，好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

张庆捷先生在《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一文中，已经系统地探讨并揭示了北朝隋唐墓葬发现的成组或单个的胡人牵驼俑、胡人俑、骆驼俑，也注意到雕刻和壁画上的图像[1]。以这些图像来和《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牵驼图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者不少相同的地方，比如牵驼的姿势、骆驼的负载等，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确认《清明上河图》中的这个胡人形象。

骆驼和胡人，原本都不是中原城市中的主要形象，但是随着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发达，这种形象逐渐被中原汉人所熟悉。过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中原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表现异域风情的陶制的胡人俑和载货骆驼，无疑是丝绸之路胡商贸易给中原人带来的深刻印象的反映[2]。牵着骆驼的胡人形象，应当是当时唐朝许多地方都能够看到的景象。

从公元3世纪以来，以粟特商人为主体的胡人构成的商队，牵着他们的运载工具——骆驼、马、驴，驮载着各种珍稀物品，如香料、珍贵药材、金银器、玻璃器皿、珍禽异兽等等，从中亚来到中国，在丝路沿线的城市中兴贩贸易（图30），唐代首都长安的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的南北两市，应当是这些胡商集中的地方。

笔者曾经根据传统文献、出土文书、石刻碑志、图像材料等，勾勒出从粟特商人的本土索格底亚那，经西域、河西走廊，一直到东北营州，以及流寓江南的粟特商人的

1 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第174—194页。
2 参看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第6—25页。

行迹[1]，并且根据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粟特系统石棺床图像，分析了以粟特商人为首的粟特商队的人员构成、驮载牲畜的种类等情况[2]。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清明上河图》上的胡人牵驼图像，特别是近年发现的粟特商队首领——萨保的墓葬中所描绘的粟特商队，都有胡人或则步行，或则骑马，牵着或者带着驼队前进的形象，如史君墓石椁、安伽墓石屏、Miho美术馆所藏粟特石屏、青州（益都）出土的石屏（图31），可见这是当时丝路商队最主要的特征。

可以说，《清明上河图》上的胡人牵驼图像，应当也是表现的丝绸之路的情况，并且把这个形象放在整个画卷的重要位置——城门的地方。然而，这里的胡人牵驼图是否就是北宋汴梁城社会面貌的真实表现呢？

二、相同场景下的唐都长安的街市

我们先以唐朝都城长安为对照物，看看相同场景下与北宋都城汴梁的不同之处。换句话说，就是看看唐长安城中胡人应当出现的场所在宋代东京汴梁城中是否也有同样的现象。

《清明上河图》所绘城门内外，都有一些表现集市的场景，在街道两边，有酒店（正店、脚店均有）、香药铺、医药铺、邸店、卦肆、衙门、寺院等等，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买卖、饮酒、算命……但是，在这些嘈杂的人众当中，没有看到一个胡人的模样。

1 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7—172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85页；两文修订收入《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36、37—110页；又《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1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5—178页；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8—152页。

2 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第47—56页图1—6。

如果我们走进唐代长安的西市街区，那显然是另一番景观。胡人在西市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过去，前辈学者已经从唐代典籍中，找到许多有关胡人在西市寻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胡人以惊人的鉴赏能力，在嘈杂的市场中发现极其珍贵的宝物。比如《酉阳杂俎续集》五《寺塔记》上“菩提寺”条所记宰相李林甫赠予寺僧的一件宝物，后被寺僧携至西市，示予商胡。商胡见之大惊，以一千万市去，僧人问实为何物，胡人曰：“此骨宝也。”[1]同类故事的流传，透露出长安西市有不少经营珠宝的商胡。玄宗时人元澄所著《秦京杂记》，提到西市有波斯客[2]。牛僧孺（779—847）著《玄怪录》卷一“传奇”中，记长安西市有“波斯邸”[3]，即波斯人经营的邸店。这些胡人买宝故事的辑录和解说，可以参看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4]，以及薛爱华（E. H. Schafer）《唐代传奇中的伊朗系商人》[5]等论著，前辈学者已经从这些故事中把胡人和西市紧密联系起来[6]。

如果说唐代传奇还有一些杜撰的因素，我们或许不能肯定故事中的胡人是否真实的存在。但20世纪初叶以来陆续出土的唐代墓志，印证了西市周边居住的胡人的真实存在。比如醴泉坊的胡人安令节，其墓志记：“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开北

1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3页；亦见《太平广记》卷四〇三“宝骨”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251页。

2 《类说》卷四引元澄《秦京杂记》“压惊钱”条，《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73册，第58—59页。

3 又见《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条，题出自《续玄怪录》，第109页。

4 石田干之助《(增订）长安の春》，东京：平凡社，1967年。

5 E.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October 29, 1949*, ed. by W. J. Fisch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403-422.

6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7页；妹尾达彦《世界都市长安における西域人の暮らし》、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センター编《シルクロード研究丛书》9，2004年，第50—66页；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阮之居，接南邻之第。翟门引客，不空文举之座；孙馆延才，还置当时之驿。金鞍玉怗，连骑而不以骄人；画卵乳㹠，陈鼎而未为矜俗。加以冯良居室，端肃如对于严宾；仇览定交，矜庄岂闻于媟狎。义之所去，纵千乘而犹轻；道之所存，虽一介而犹重。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岂独柳市万章，贵人争揖，茂陵原口，群公慕之。"[1]居住在西市边上的安令节，已渐染汉风，他一边雅好儒业，一边又经商致富，应当说是入居长安的一位亦儒亦商的粟特人，他像《世说新语·任诞》所说的阮仲容道北的诸阮一样，所居宅第广阔，接南邻之第；其门庭如《史记·汲郑列传》所说的翟公之门，宾客阗门；其家富有，出入则金鞍玉怗，连骑而行，仗义疏财，纵千乘而犹轻，颇有侠士风格；因此，"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安令节可以说是居住在西市周边并经常出入西市的粟特商人代表。虽然没有唐朝时期的西市胡人图像保存下来，但我们可以从安伽墓出土围屏石榻上描绘北周末年粟特首领、同州萨保安伽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依稀看到安令节在长安类似的居家宴饮、观看胡人舞蹈、出门狩猎和经商等等胡人常有的行迹[2]。

其实，就在唐代，人们早就已经把西市看作是胡人集中的地方。最有名的故事见于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

1 《安令节墓志》，《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2 关于安伽等胡人首领墓葬图像表现的日常生活场景，参看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11—168页；又《有关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的几个问题》，张庆捷等编《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6—139页。

余请不问。’……俄果获贼。”[1]所以，在“商贾所凑，多归西市”[2]的商人中，就有许多胡人在内。而胡商之外，还有宿卫的质子、禁军的将领、传法的胡僧、跳舞的艺人、当垆的胡姬等等各种各样的胡人。

妹尾达彦教授曾经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描绘出一幅9世纪前半叶长安西市中部地区的局部图像（图32）[3]：大街的中央有一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驼队，前面一个胡人牵引着骆驼；对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年轻人，马背上蹲着狩猎用的猎豹——他们是粟特人输入和驯养的；大街上有各色人物，包括来自异国的胡人和僧侣；街道两边的店铺前，有胡姬在招揽生意；也有波斯来的胡姬在与客人调笑……

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像《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唐代城市的风俗画卷，所以妹尾达彦教授在这幅西市画卷上显然也借用了《清明上河图》中的“正店”、“赵太丞[家]”这样的招牌。但画卷中间位置的“安家店”的牌子，显然是考虑到粟特安国商人在唐朝西市开设店铺的可能性，所以没有借用《清明上河图》上著名的“孙羊店”招牌。妹尾教授的这幅杰作应当是非常真实地表现了长安西市的社会风貌，其中胡人的比重是相当大的。我们把这幅画和《清明上河图》的集市部分相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两者的不同，那就是，虽然都是市场，但《清明上河图》表现的宋代都市里似乎没有胡商、胡客、胡姬。

三、汴梁胡人的“消逝”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汴梁这样一座北宋的都城真的

---

1 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九《从善》第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8页。《太平广记》卷二四九《尹君》篇引《御史台记》亦记此事。

2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 妹尾达彦《世界都市长安における西域人の暮らし》，第66—67、86页（图）。

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没有胡人了吗？或者只有作为城市点缀的那样一个胡人了吗？

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后周时期，显德二年（955）四月周世宗规划扩建东京城的诏书中说：“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1]这样的表述似乎说明，当时的东京城中外来胡人还是相当可观的。

但是，进入宋朝以后，由于西边受到西夏、吐蕃的阻隔，来自中亚的胡人要比唐朝时期少得多了，而从海路来的高丽、东南亚、印度、大食（阿拉伯）人相对于陆路来讲要多得多。然而，来到东京城的外国人主要是使者，他们携带着珍贵的香料、药材等等，入贡于朝廷，宋朝以回赐的方式与之进行贸易。虽然这些来使往往都携带一些属于自己的商品，“私与商贾牟利”[2]；也有的商人冒充使者，入宋交易；但这种限制在贡赐形式下的贸易，使外来的商人很难在市场上自由地买卖[3]。因此我们很少看到东京的市场上有像唐朝西市中那样的胡商，这或许就是《清明上河图》绘制了这样繁华的市场，却没有外来的胡商的缘故吧。在记载北宋东京的著作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唯一一位属于真正伊朗系胡人后裔的，大概是卷五“京瓦伎艺”条留下的嘌唱弟子之一“安娘”[4]，但她已经不能代表粟特后裔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艺人而已。

邓小南教授在《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宋代初年具有沙陀、粟特、奚等外族背景的军事将领，认为他们“一代代相互通婚造成的血缘

1 《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2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 参考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5—591页。
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邓之诚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2页；入矢义高、梅原郁译注《東京夢華録——宋代の都市と生活》，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第172页；伊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1页。以上三家注释都没有具体考释“安娘”。

混溶关系，长期磨合中发展起来的共有文化倾向、文化心理，使他们步步融入了中原社会”，加之“宋人观念乃至叙事书写方式的演变”，使得宋代初年以来，胡人的背景似乎已经被世人淡忘，“胡／汉”语境逐渐消解[1]。因此可以认为，北宋汴梁城中虽然生活着一些从五代延续下来的胡人家族，但他们此时已经自我认定为汉人，周边的汉人也毫无异议地把他们看作汉人，从重文化而不重体质特征来判定民族归属的观点来看，这显然是我们在史料中和在《清明上河图》中很难看到有关胡人的重要原因。

笔者曾经讨论过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原的许多胡人向安、史部将建立的河北三镇迁移，因为在此他们不被汉人所歧视。与河北三镇接壤的宣武节度使衙所在的汴州（开封），应当也有一些胡人进入，我曾举出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的有关记载为证：“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1）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2]这里负责祆庙宗教事务的庙祝姓史，显然是粟特史国的后裔，他们世代任职，使这座祆庙的圣火一直不灭，持续200年，至宋代还为京师人所敬畏[3]。除去城北这一祆庙外，开封“大内西去右掖门”也有

1 文载《文史哲》2005年第5期，第57—64页。

2 《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3 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2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祆庙[1]。邓小南教授说："尽管东京城内祆庙不止一处，但看来已经很少有人知悉火祆教之详悉来历。早年进入中土的'胡人'（特别是粟特）属裔，除祆祝之类的宗教人士外，似乎少有能够坚持本民族之固有文化信仰者。"[2]

总之，我们应当说北宋东京城内原本就有一些胡族居民，同时也一定有随时而来的胡族（主要是指西方来的回鹘、于阗、大食）商人、使臣，但在整个东京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已经不再是都市历史的主角，因此退居到人们视线之外，或者隐藏在画家的幕布后面了。

四、结语：《清明上河图》中的胡人——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表现真实社会风俗的画卷，那么绘画于图像明显地方的牵驼胡人，是否是宋代都城胡人的真实反映？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由于胡人并非宋代都市中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个胡，与其说是宋代汴梁的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唐代长安以粟特商胡为代表的西域胡人的历史记忆。

唐代长安街市中常见的粟特商队在后世的记忆中不仅通过图像显示出来，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记忆也时常用文字表述。如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西游记》，在被学者认为是祖述元代版本的世德堂本第八十二回中，有"祆庙烟沉嘉会空"句。这个"祆庙"，正是唐代来自粟特胡人所传的夷教，而"火烧祆庙"也是元人常用的典故[3]。但是到了明代的李卓吾（李贽）评本，"祆庙"已经改成了后世

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第82—83页。

2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第62—63页。

3 参见陈垣《火祆教传入中国考》，原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此据《陈垣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27—328页；刘铭恕《元人杂剧中所见之火祆教》，《金陵学报》第11卷第1期，1941年；罗新《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38页。

各本普遍遵循的“佛庙”[1]。这一现在只具版本意义的“祆”字的变迁，其实也表现出唐代长安的历史记忆在中古以后的元明之际逐渐湮没的历程。

2007年6月29日完稿，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第658—666页

1 这个版本异同的发现，应归功于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此据《程毅中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73页。

韦述及其《两京新记》

中国历史发展到隋唐，进入了一个繁盛时期，都城制度也为之一新，步入中国都市史的集大成阶段。承继自隋的唐代洛阳、长安作为东、西两京，规划设计相似，在天宝以前，由于统治阶级在两地之间往来不断，使得两者经济、人文都极盛一时。这两座城市的坊里、宅第、风俗、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情状，都值得我们探寻。

文献是我们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有关唐代两京城内地理记述便不仅仅是"吟咏唐贤篇什之助"（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序》语），更是研究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起点。长安、洛阳作为一代文人的汇聚之所，有关撰述亦自较他处丰硕，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以极大的帮助。

在有关两京的现存史料中，有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这就是《两京新记》。作者韦述记载了当时两京城内的社会情景，为我们提供了长安、洛阳都市生活的生动画卷，具有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因此，了解韦述的经历和时代，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京新记》的来历及内容。

一、韦述及其著述

韦述（？—757），唐代京兆万年人。韦述的家学与他的历官生涯对他的著述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有云：

> 韦述，司农卿弘机曾孙也[1]。父景骏，房州刺史。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

1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时期韦弘机曾亲自主持过东都洛阳的建设，并撰《东都记》20卷。

异之。……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骏之姑子，为时大儒，常载书数车自随。述入其书斋，忘寝与食。行冲异之，引与之谈，贯穿经史，事如指掌，探赜奥旨，如遇师资。又试以缀文，操牍便就。[1]

韦述尚在幼年之时，就于自家丰富的藏书之外，又得以饱读当时大儒元行冲的藏书。如此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加之韦述自身嗜好，使他博闻强识，并且善属文。这些都是撰著史籍所必要的条件。

同时，其个人的经历，也为其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开元年间起，韦述历任栎阳尉、起居舍人、集贤院直学士，参与修史书，在书府40多年，居史职20多载，嗜学著书，手不释卷。自开元五年（717）始，韦述便与元行冲等一起，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其《开元谱》便是此时期于秘阁中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别撰而成的。韦述《叙书录》一文，更体现了其在集贤院得以遍览天下珍籍的便利条件。文曰：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进。寻且依文、拓两本进内，分赐诸王。后属车驾入都，却进真本，竟不果进集字。[2]

在集贤院任职，就有这样得见书法珍品的机会[3]。

另外，韦述个人的书籍、文物藏品也堪称当时一绝。《旧唐书·韦述传》云：

〔述〕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

1《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2《全唐文》卷三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67页。
3 关于集贤院本身的收藏和其中任职人员的情况，详参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0—242页。

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1]

由此可见，韦述的家学传统、任官经历、个人的收藏、文献搜集的优势等等条件，都为《两京新记》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在《两京新记》卷三中，我们时常可以看见韦述对于碑文、图画的鉴赏，这是此后两京著作中所罕见的，可以说这与韦述个人的收藏爱好有莫大的关系。

另外，我们也看出，其对于碑文、壁画的关注，也体现在《两京新记》的撰写中。例如，《新记》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条注云：

本左领军大将军、彭国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634），太宗为穆皇后窦氏追福立。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寺内有碑，面文贺兰敏之写《金刚经》，阴文寺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写太宗《圣教序》及高宗《述圣记》，为时所重。

具备了这些条件与学识基础，又有前代多部关于两京的撰述作为参考，韦述自己又是一个勤于撰述的有心人，这一切使他成为书写两京专著的合适人选。

除《两京新记》外，韦述还撰著或参加编纂了许多著作，现表列于下以见其著述全貌[2]：

（一）著作

《唐春秋》30卷，未终篇。书已佚。

《群书四部录》200卷，马怀素、元行冲先后主持，韦述参与编纂，开元九年成书。其后不久，毋煚将其略为《古今书录》40卷，而五代修《旧唐书·经籍志》，所据即《古今书录》。则书虽久佚，然可据《旧志》知其梗概。

---

1 《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第3184页。

2 主要参看《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新唐书》卷一三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开元谱》20卷，此系据柳冲《姓族系录》200卷别撰而成。已佚。

《国史》113卷，系在自令狐德芬至吴兢所撰基础上增订而成。书已佚，然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所引《唐书》，或许保留一些韦述所撰《唐书》佚文[1]。

《史例》1卷。已佚。

《东封记》1卷，开元十三年十一月从封泰山时撰[2]。已佚。

《唐六典》30卷，开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主持编成，韦述参与撰写。现完整保存[3]。

《初学记》30卷，开元中成书，徐坚等撰，韦述参编[4]。

《开元十道录》，卷次不详[5]。已佚。

《唐职仪》30卷。已佚。

《高宗实录》30卷。已佚。

《御史台记》10卷。已佚。

《集贤注记》3卷，天宝十五载（756）撰，又名《集贤记注》、《集贤记》。已佚。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有辑录，《唐研究论文选集》，第193—241页。

《唐宰相甲族》1卷，与吴兢、萧颖士等合撰[6]。或即《国朝宰相甲族》1卷[7]。又名《大唐十四家贵族》[8]。已佚。

《百家类例》3卷[9]。已佚。

1 户崎哲彦认为即韦述所撰《唐书》，见所撰《唐临事迹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2页及注3。

2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第1492页。

3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值得提到的是，其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条有关于两京宫殿等建制的记载。

4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1页。

5 《太平御览引用书目》著录。

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8页。

7 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88页。

8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588页。据《直斋书录解题》，《唐宰相甲族》所记为“自王方庆而下，十有四家”，当即此《大唐十四家贵族》1卷。

9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588页。

《唐集贤书目》1卷[1]。已佚。

（二）单篇文章

《请优恤苏颋疏》

《宗庙加笾豆议》

《服制议》

《对不以采苹为节判》

《对归胙判》

《答萧十书》

《改谥侍中裴光庭忠献论》

《叙书录》

《赠东平郡太守章仇府君神道之碑》[2]；

《资圣寺中窗间吴道子画高僧赞》[3]

《集贤注记序》

《唐太原节度使韦凑神道碑》

《刘仁轨论》[4]；

《大唐故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公（去奢）墓志铭并序》[5]

《唐壮武将军守左威卫大将军兼五原太守郭英奇墓志》[6]

《大唐故正义大夫行仪王傅上柱国奉明县开国子赐紫金鱼袋京兆韦府君（济）墓志铭并序》[7]

《大唐故镇军大将军行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岳阳郡开国公范公（安及）墓志铭并序》[8]。

由此足见韦述杰出的著述才能与学识素养，而这些在《两京新记》中都有体现。

---

1 郑樵《通志二十略》，第1595页。

2 以上9篇《全唐文》卷三〇二有辑录。

3 见《图画见闻志》卷五。

4 以上三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三九有辑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5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一一〇（北京图书馆藏拓本）；《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68—69页。

6《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1999年，第141—142页；《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83—84页。

7《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25—27页。

8《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66—68页。

二、韦述《两京新记》的源流

记录、考订两京建置的文献，隋代有负责建设两京的宇文恺所撰《东都图记》20卷[1]，又诸葛颍著《洛阳古今记》1卷[2]。唐时关于两京的著述见于著录者更多，主要有贞观年间杜宝撰《大业杂记》10卷[3]，高宗时释彦悰辑《大唐京寺录》10卷，邓世隆撰《东都记》30卷，韦弘机撰《东都记》20卷，开元年间韦述撰《两京新记》，会昌年间段成式撰《寺塔记》，大中年间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等等。可见，开元以前的著作，主要偏重于东都洛阳的记载。自宋至清，又有许多关于隋唐两京的著述，内容大多是以唐代两京城内的坊巷、寺观、官邸以及风俗掌故为主，如北宋宋敏求《河南志》、《长安志》各20卷，南宋程大昌《雍录》10卷，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10卷，李好文《长安志图》3卷，王士点《禁扁》5卷，此外还有明末清初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清代乾隆年间毕沅编撰《关中胜迹图志》，嘉庆时董佑诚、陆耀遹《长安县志》、《咸宁县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等等。今人又利用碑刻、墓志和考古发现进行增补、考订，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阎文儒、阎万钧《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杨鸿年《隋唐宫廷建筑考》、《隋唐两京坊里谱》、《隋唐两京考》。

在上述文献记载传承过程中，韦述撰写于开元时期的《两京新记》，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此书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开元时期长安的坊市闾巷的盛况，而且开启了后世撰述与

---

1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594页。

2 《隋书》卷七六《诸葛颍传》，第1734页。

3 《新唐书》卷五八，第1466页。关于此书及其遗文辑录，见辛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大业杂记〉遗文校录》，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5—199页。

研究唐代两京的风气，因此，《两京新记》在有关唐代两京的文献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关《两京新记》传世、收藏以及相关问题的丰富研究成果，便是此书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体现。

《两京新记》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当我们在仔细校读《两京新记》的残篇断简时，便深深地感到，如果我们要更清晰地看清它的面貌，就有必要进一步去探索与追寻它所诞生的盛唐时代，并弄清楚它在历史文献递传中的来龙去脉。

其实，记载都城的兴废变迁及其人物遗迹的著作，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在隋大兴城之前，汉长安城与汉魏洛阳城是两个中国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最重要的都城。除了那些渲染、华丽的京都赋外，考诸史书，不乏关于它们的记载。比如辛氏《三秦记》、《三辅黄图》，都是总叙都邑、宫殿、乡聚分布、关隘设置等。也有叙述一个城市中的规模制度者，据《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记载：

《洛阳伽蓝记》五卷，后魏杨衒之撰。《京师寺塔记》十卷，刘璆撰。《京师寺塔记》二卷，释昙宗撰。《西京记》三卷。《京师录》七卷。[1]

又据《玉海》卷十五地理·地理书“唐《两京新记》”条引《志》：

晋潘岳《关中记》一卷。葛洪《西京杂记》二卷。陆机《洛阳记》一卷。戴延之《洛阳记》一卷。后周薛寘《西京记》三卷。后魏《洛阳记》五卷。邓世隆《东都记》三十卷（又有邓行俨，贞观著作郎）。韦机《东都记》二十卷。韦述《两京新记》五卷。《两京道里记》三卷（书目不知作者）。[2]

1《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85页。
2《玉海》卷一五，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册，第32—327页。

我们不难体会出这些作品内在的一脉相承性，因为这些书大多数都是记载京师衙署、寺观、巷陌、宅第乃至近畿的山川、寺观，以表现京城的人物鼎盛、文化发达，在体例上必然相互影响，在内容上也必然有所传承。《两京新记》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汉唐时期有关长安、洛阳著述的集成之作。其之所以称作“新记”，大概正是表明自己是在此前有关两京著作的基础上而增新的著作。

三、韦述《两京新记》的撰著年代

《两京新记》撰于开元年间，其撰成的具体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议。韦述著此书时，为丽正殿直学士。丽正殿开元十三年改名集贤院[1]，可证此书的撰写在开元十三年以前。《玉海》卷一六〇“唐延英殿”条明确记载，《两京新记》撰于开元十年[2]。然而，因为宋敏求在《长安志》中引《两京新记》后常续天宝以后事，所以有人认为《新记》作于天宝以后[3]。足立喜六认为此书成于开元年间[4]，岑仲勉先生以卷三布政坊下明觉尼寺条开元七年以及延福坊下犹称郯王，再参《金石录》尊师碑，以此书之作约在开元八年至十二年[5]。福山敏男、平冈武夫和辛德勇也都对此加以论证，均以《玉海》之说为是[6]。笔者也赞同开元十年说。

《两京新记》问世于唐朝最辉煌的开元时代。经过贞观之治的建设与武周时代的更新，唐朝到了玄宗开元年间，

---

1 《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第3—76页。
2 《玉海》，第6册，第3030页。
3 如冢本善隆《唐中期の净土教——特に法照禅师の研究》，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第18—19页。
4 足立喜六著《长安史迹考》，杨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96页。
5 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史语所集刊》第9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546页。
6 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之《〈两京新记〉解说》，《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3年，第179—182页；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 · 资料篇》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页；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绪说》，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6页注5。

国家日臻繁盛，疆土也得以拓展，政治清明，经济上升，文化昌盛。作为强大帝国的都城长安和陪都洛阳，也因国力日盛而熠熠生辉，尤其是长安，在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唐帝国物质、文化与人物、权力的载体，长安、洛阳体现了这个帝国当日的宏大气势与发达文明。以长安而言，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官僚选任和科举制度，地方各个阶层的精英也汇聚长安；宫殿、衙署、贵族、官僚宅第林立，显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公私建立的佛寺、道观，蕴含着宗教之都的气氛；学校传授着儒家的经典和知识，传教士和取经僧带给长安丰富的精神思想；而异域风情也弥漫在这个都市。作为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亚洲的主要城镇，使得都城与地方，中国与域外的文化与物产的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作为世界性的繁荣大都市，其都市的设计也影响了周边地区。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文明的交织与碰撞，异国王公、商人、艺术家活跃其间，他们浸染着汉族文化，也把异域的文明散播到这座都城。两京作为唐代经济文化的两个中心，足以让当时的人感觉到一种帝国臣民的骄傲。——这，就是韦述的时代。韦述是长安城中的一分子，他既是长安文化的建设者之一，也在这座雄伟的都城里感受到各个方面给予的刺激。开元时代的长安，无疑为韦述的撰著提供了最佳的时点。

时至开元，两京已创立百有余年，都市的整体规划也大致定型，其内部建置与社会也经历了兴立迁转，城内宫殿、坊市、第宅、寺观、人物与景观达到最为饱和的状态。——这，就是韦述所处的都市，它为韦述提供了揣测、触摸这个繁荣国都的基础。开元时代的长安，无疑也为韦述的撰著提供了最佳的空间。

四、《两京新记》的佚存与原貌

《两京新记》全书已佚，我们现在无法见其原貌。

《旧唐书·经籍志》因本自开元年间毋煚书录[1]，故对《两京新记》未予著录。《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乙部地理类载录了此书[2]。宋人书目中，《崇文书目》及晁、陈二书均未见收，《宋史·艺文志》[3]、《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载录了此书[4]。在其他文献中，有对《两京新记》的征引[5]。可惜的是，岁月流逝，《两京新记》大致在明代开始失传[6]，今已无法得见其全貌。这样，学者们就只能凭藉散在各种史籍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来辑录拼凑《两京新记》的容颜。遗憾的是依靠各家辑佚，我们仍无法明晰《两京新记》本身体例与行文风格。这一缺陷因日本金泽文库藏《两京新记》卷三残本的存世而得以弥补。应当指出的是，该抄本大概出自僧人之手，所抄录的内容主要是寺院和道观，而略去一些坊里的住宅，如据《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引韦述《两京新记》，延寿坊有驸马裴巽宅，又有中书令阎立本宅，然均不见于金泽文库抄本。所以，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两京新记》的了解，所依据的基本史料除了这份仅存的第三卷摘抄本外，还要参考曹元忠等人的辑本。透过这些吉光片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京新记》在我们的视线里已逐渐清晰。

根据《两京新记》卷三的记载及辑佚的相关内容，福山敏男推测原书结构如下：卷一为京师总说及宫城、禁苑、

1 《新唐书》卷五八载有毋煚《古今书录》40卷，第1498页。
2 《新唐书》卷五八，第1507页。
3 《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52页。
4 《玉海》卷一六，第351页。
5 关于《两京新记》宋以后文献中记录的具体情况，详见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之《〈两京新记〉解说》，《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第167—170页。
6 辛德勇先生认为，在中国佚失的时间大致在明代中期前后，见辛德勇《关于唐代长安研究的基本文献》，关西学院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会例会演讲稿，2003年3月21日。

皇城，卷二为京城总说及万年县所领诸坊，卷三为长安县所领诸坊，卷四为东都总说及宫城、皇城、东城及诸坊，卷五为诸坊[1]。这种推测大体应当符合事实。其体例大致是先叙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的建置，外廓城则以坊、署、寺、祠、观为纲，正文顶格，系用大字书写；复为子注，为双行小字，详为阐释；而每街的坊的总数又低两格来写。于是乎隋至唐开元百余年间两京建置之废置、迁徙乃至政治、社会变动等内容，尽在其中。这种叙述体例，类似于后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而更有条理。这种体例给予以后关于两京的著述以深远的影响，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悉遵此例。今人许多的研究也以此体例为纲，如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以笔画排列诸坊，但坊下叙寺、祠、宅等建筑，仍与之相同。

《两京新记》不单叙地理沿革、城市建制的兴废变迁，实际上同时记述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以及掌故传闻。我们可以看出，韦述不仅为我们记述了唐代城内的建筑实体，同时也记述了社会各阶层的秘闻佚事，以及民间的习俗，旁及中西文化、物产的交流。所记之事或来自秘府珍籍，或属作者耳闻目睹，是研究唐代长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韦述的记载中，有不少采自隋唐小说，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两京新记》在一些著名宅第下所记录的许多委婉动人的故事，为继承它的《长安志》所删除，《唐两京城坊考》虽然有所保存，但大部分记载已经失载，殊为可惜。诸如居德坊下法庆的故事，布政坊法海寺英禅师故事，韦述就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尤如小说。好在这些传奇往往被《太平广记》所收录，能让我们辗转找到韦述

1 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第170页。

原著的感觉。这类记叙今天看来有些怪诞不经，但却是唐人生活的真实反映。包含这一部分内容的韦述原著，要比后世单纯标记空间的实体建筑、宅第的增损、寺观的兴废要生动曲折得多。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研究唐朝的长安，切不可追随《长安志》以下的著作，而应当恢复韦述所记盛唐长安的原始面貌。

五、《两京新记》的影响

韦述以当时之人，述两京之建置兴废、社会状况，其史料价值可想而知。唐人萧颖士在《赠韦司业书》中云："幼小日曾窃窥足下所著《两京新记》，长来追思，实为善作，人所知殷晋，亟接清言。"[1]可见在当时就被称为"善作"。赵彦若在为《长安志》所作的序中称："雍之为都，涉三代，历汉唐之全盛，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事变丛聚，宜其较然有明册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图牒残脱，宿老无传，求诸故志，唯韦氏所记为一时见书。"[2]又李埴《舆地纪胜序》言："最有可称者，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东西《两京新记》及本朝龙图阁直学士宋公敏求《长安》、《河南》二志尤为该赡精密。"[3]可见此书的价值一直为人称道。

北宋皇佑、熙宁年间，宋敏求修《长安志》，其京城诸章，多本此书。"唐韦述为《两京新记》，宋敏求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靡不备载。"[4]吕大防亦在元丰五年（1082）刻成《长安图》，据其题记得知，是

1 《文苑英华》卷六七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491页。
2 《长安志 · 原序》，《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4页。
3 《舆地纪胜》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4页。
4 《玉海》卷一五，地理 · 地理书"唐《两京新记》"条，第327页。

以《两京新记》和旧图为底本的[1]，现仍存有残石，为我们了解唐代长安建制结构，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长安志》20卷是目前完整保存的最早的有关长安的著作，为后代研究长安城的基本典籍。通过《长安志》，我们也能够感受《两京新记》对后世有关两京的记叙及研究的深远影响。

六、《两京新记》的整理与研究

《两京新记》一书唐朝时已传入日本，据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其在长安城就求得"《两京新记》三卷"[2]。成书年代在唐昭宗时的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两京新记》四，韦述撰"，已残一卷[3]。藤原赖长（久安五年，1149年，任左大臣）的日记《台记》1143—1144年部分，记录了藤原通宪（信西，？—1159）的藏书目录《通宪入道藏书目录》，其中有"一合（第廿四柜），《两京新记》（一卷）"；又"一合（第廿八柜），《两京新记》一卷"[4]。这里著录了《两京新记》两卷，其中之一或许就是后来的金泽文库本卷三。

目前所见的《两京新记》卷三，为金泽文库所藏孤本，后转为前田青德会尊经阁所有，原卷上印有"金泽文库"墨印[5]。此钞本的抄写年代一般认为在日本镰仓时代

1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0—142页。

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卷，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1084页中栏。

3 《古逸丛书》下，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745页。

4 王勇、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9《典籍卷》第1章（大庭修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8、69页。藤原通宪是平安时代政治家，历鸟羽、崇德、近卫三代，后出家，自号"圆空"，再号"信西"，著有《本朝世纪》、《日本纪注》等。

5 金泽文库是权臣北条即时在武藏国金泽村的别业内建立的，文永四年（1267）别业扩展成称名寺，属于真言律宗。建治元年（1275）正式建立文库。经北条氏四代经营收集，藏书递增。元弘三年（1333），镰仓幕府崩溃，北条氏灭亡，文库归称名寺管理，到中世末期，文库藏书散佚。主要藏书入江户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之私人收藏（富士见亭书库—红叶山文库），各地藩主也大力收求金泽本，前田青德会尊经阁文库也获得若干，有名者如《春秋左氏音义》、《孔子家语》等（参看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7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两京新记》或即在此时转手。

（1192—1333）初期，不会晚于南宋时代[1]，据卷末题“两京新记卷第三”，可断定为韦述之《两京新记》无疑。

尊经阁的旧钞本是一残本，由20张纸粘贴成卷子本，其顺序甚为混乱，将朱雀街西之第三街的修德坊、辅兴坊、颁政坊错置卷首；将朱雀街西之第四街怀远坊以下的长寿坊、嘉会坊、永平坊，编排于朱雀街西第五街的群贤坊以后；又把朱雀街西第五街的丰邑坊置于最后；这与长安城街坊的实际位置不符。可是，当嘉庆四年（1799）林述斋（天瀑山人）将其首次刻版印入《佚存丛书》第一帙时[2]，即按此原状态刻板。这种做法有其慎重之处，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改变了原卷每行11个字、双行夹注的形式，变为每行20字，注文单行，且字体大小相同，这样就使得原本粘贴有误的地方很难厘清。同时，还存在许多可以判别的字作为空格刻出的问题，益发使得要想从该版本去求得卷本的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佚存丛书》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黄氏活字本，多臆改。咸丰三年（1853），伍崇曜辑《粤雅堂丛书》2编第12集也收有此卷，系覆刻《佚存丛书》本。另外还有光绪年间刻印的《正觉楼丛刻》本以及1924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佚存丛书》本。这些翻刻难免存在着版本、校勘等的问题[3]。

由于《两京新记》卷三存在错简，又经过辗转抄刻，颇有脱误，鲁鱼亥豕之错讹在所难免，几个不同的翻刻本之间也均有错失与参差之处。于是，该书的校勘与订正工作，代不乏人。

---

1 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史语所集刊》第9本，1947年）据该卷讳“怀贞坊”为“怀真坊”，推断应是北宋仁宗后传本，又据《长安志》缺朱雀街西之北两坊，此卷并缺次南之丰乐、安业，崇业坊亦不全，残缺比宋敏求所见尤甚，为南宋之钞本。但平冈武夫认为这不过表示书写的情况，并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确定，以此来判别唐钞本与宋钞本具有局限性。

2 后有跋一则简述其来历，知是金泽文库本。

3 关于此卷早期版本的简单情况，可参看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7—98页。

1934年，陈子怡凭依《佚存丛书》本校以《长安志》，加以修正，又出于慎重，存原文于书后[1]。今以已发表之金泽文库之原本验之，陈氏之录文谬误颇多，其校正稍嫌粗糙。当时囿于版本，或可理解。故陈氏校本今后可以忽略。

两京中佛寺道观众多，《两京新记》对其叙述甚详。周叔迦先生在对佛教史迹进行研究时，也注意到了《两京新记》在这方面的价值。1936年，周氏因其所用《佚存丛书》本凌乱无次，而以《长安志》比对，希图复原其本来面貌[2]。

1947年，岑仲勉以商务影印《佚存丛书》本为底本，参诸《粤雅堂丛书》本、《正觉楼丛刻》本、黄氏活字本而总校之，并对其三本的特点予以比较，指出三本虽皆以《佚存》为祖本，但《正觉楼丛刻》本最近于原本，黄氏活字本虽翻刊，但多臆改，是三本中较次者。他又钩正错简五大段，钩正错字一，补入佚文一段，指出缺佚三处，补入夺文49字，其他工作还有衍去羡文、空格、举出疑文等等。其纠正错简方面稍逊于周叔迦本，文字校勘上则有明显进步，而且校注附于原文后，比较方便对照，但其对于书体的偶异、正俗通用，未进行校对[3]。

以上三位学者均依据《佚存丛书》本工作，除陈氏仍保持原来的排列顺序外，后两位都对其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列，并加以校对，但是由于没有见到尊经阁文库藏卷的原貌，所以都未能达到完美。

事实上，早在1934年，侯爵前田家育德财团编《尊经阁丛刊》第30就以珂罗版影印了《两京新记》卷三残卷，

---

1 陈子怡《校正〈两京新记〉》(西京筹备委员会丛刊之二)，西安：和记印书馆，1936年。

2 周叔迦《订正〈两京新记〉》，原载《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1936年，第503—521页；收入《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53—968页。

3 岑仲勉《〈两京新记〉卷三残卷复原》，《史语所集刊》第9本，第545—580页；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可惜中国学者无缘得见。1953年，福山敏男在《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一文中，据此影本，重新排列了《两京新记》残卷的顺序，以原卷格式加以复原转写，然后做了详细的校注和系统研究。由于残卷原本首阙，朱雀街西前四坊缺失，第五坊崇业坊只余注35个字。福山根据《长安志》等书做了推补，其中把朱雀门大街西第一街第一、二坊的名字复原为善和、通化，极有见地。同时，他还就该卷对开元三至十年的坊予以推定，并以图的形式表现出来[1]。

1954年，平冈武夫将1934年尊经阁影印本重新影印，但根据前人研究的成果和长安城坊里的实际情况，复原了该残卷的正确顺序，将此影本收入所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篇》,使学者们得以较方便地看到此卷原貌。然后，又在周、岑、福山等人工作的基础上，正讹、钩正若干校注，纠正一些前人的错误[2]。

除了上述围绕着《两京新记》卷三残本所做的校正、复原工作外，早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曹元忠就以《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玉海》为主要资料来源，并参考《秘笈新书》、《汉简》、《长安志》、《事文类聚》、《七修类稿》、《通鉴》胡注、《太平寰宇记》、《事类赋》、《佩觿》、《河南志》等书，辑佚成《两京新记集本》两卷，收入《南菁札记》。平冈武夫在肯定曹元忠的功绩的同时，指出曹氏辑本的不完备之处：一、曹氏所用的书中如《太平广记》、《玉海》中韦述的记述仍有遗漏而未辑者；二、除了上述的典籍，其他的著述中也保存有韦述的记载而为其所忽视；三、各种书中重出的记载，作为辑佚，应该一并收集；四、有的非原文引用，但却是《两京新记》所记的内容，也应收集

1 《美术研究》第170号，1953年，第31—66页；收入《福山敏男著作集》之六《中国建筑と金石文の研究》，第170—172页。
2 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序说，第9—30页。

起来。如上所述，基于这四点，平冈武夫又辑成《两京新记续拾》，共计43条，其中长安26条，洛阳17条，亦载《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1]。

最近，《两京新记》辑佚工作创获最大的应属陈尚君先生。他于《晏殊类要》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近30则，其中有10多则为卷三残卷和以前辑本未见之文，此外，一些记载亦较现在的辑本详细[2]。另外，辛德勇先生也在从事《两京新记》的辑佚和校注工作，其中利用了20年前山东新发现的《永乐大典》真字韵下的新材料，唯其辑校本尚未发表[3]。

通过以上对《两京新记》残本、刻本、辑本的分析，笔者认为，除了对前面辑佚的疏漏进行补充外，今后就《两京新记》所做的工作仍然主要是辑录与校勘。鉴于前人的一些经验，在从文献中辑录《两京新记》佚文时，特别应当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如何分辨《两京新记》的各种不同书名，以便不要误将同名或类似书名的材料辑为《新记》，这是辑佚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曹元忠和平冈武夫辑本所用书中，题为《两京新记》者很少，多数写作《记》、《两京记》、《西京记》、《东京记》、《东京杂记》、《西京杂记》。以《西京杂记》为例，以此为名的书就有汉刘歆撰，晋葛洪录，另外有梁萧贲的60卷本[4]。因此，在辑录工作之后，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订和辨别工作。如与后周薛寘《西京记》的重复，须甄别判断以免收入非《两京新记》的内容。

二、许多文献在引用《两京新记》时，并非直抄其文，

1 平冈武夫《唐代长安和洛阳·资料篇》序说，第211—214页。
2 陈尚君《晏殊〈类要〉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3 参看辛德勇《关于唐代长安研究的基本文献》讲演稿。
4 关于《西京杂记》版本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参考西野贞治《〈西京杂记〉の传本について》，《人文研究》第3卷第7号，1952年，第101—118页。

而多为转述，因而文字表达上存在着差异，有时殊难区分哪一个为《新记》原文。但由于卷三抄本的存在，根据其文体和记载规律，部分可以藉此判断哪个更忠实于原文。

三、因为《长安志》是从《两京新记》脱胎而来的，因此，开元十年以前的有关记录有些很可能就是抄自《新记》原文，这需要根据已确定的《新记》用词特征和叙述方法加以推定。比如《长安志》卷九记："通义坊西北隅右羽林大将军邢国公李思训宅。本左光禄大夫李安远宅，武太后时，高平王武重规居焉。神龙中，又为中宗女成安公主宅。又为思训所居。思训善画。"从语气及《两京新记》称武后皆作"武太后"来推测，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新记》原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从现存的《长安志》里剥离出部分《两京新记》的本文来。

总之，学界对于《两京新记》所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亟待对这些工作（订正、校注、辑佚）做一总结。在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两京新记》的体例和记载顺序，将辑佚和推补的材料依次排列，不难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两京新记》新本。同时，一些考古发现，如长安寺院遗址及出土墓志，也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佐证。我们之所以急切地盼望学术界尽快拥有一个《两京新记》的整理本，其实并非仅仅是从文献学上获得一个有关长安的唐代原本，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反映开元十年长安状况的佳本，并通过对它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来呈现出盛唐时代长安都城的壮丽辉煌。

与王静合撰，2003年10月22日初稿，2004年1月8日修订，原载《文献》2004年第2期，第31—48页

附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史睿君来信

荣老师：

近期翻阅王国维手稿的缩微胶卷，看到他钞的《景定建康志》的《文籍志》，其中除了记载官府藏书目录之外，还有一项专门记录官府藏书板，其中竟然有韦述《集贤注记》的书板，共61板。这证明宋代（很可能是南宋）《集贤注记》一书曾经刻板。一般南宋本多为半叶10至12行，每行20字或更多，依此推算，全部板片大致有三万字，而《集贤注记》分为3卷，字数当去此不远。那么，至少南宋景定年间（1260—1264），《集贤注记》仍然完整传世，不知何故，此后失传。目前尚未得空查证《景定建康志》原书，想此必为先生所乐闻，故驰书奉闻。颂

安

学生　史睿再拜上

2007年4月26日

隋唐长安 性别、记忆及其他



我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敦煌因为发现了一个藏经洞，出土了几万件敦煌文献，于是产生了一门"敦煌学"。但是，比起敦煌更加重要的隋唐都城长安，却没有一门叫响的"长安学"。虽然传世典籍中的隋唐历史文献有相当多的就是在长安写成的，或者是与长安有关的，但是这些资料并不是从长安的角度，或者说不是为了长安而写的，而是从隋唐的官僚制度、整个隋唐的史事、个人的文章等角度集合在一起，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没有强烈的这是长安文献的意识。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我们对于长安的重视不够，我们对于长安的研究不足。然而，不弄清楚长安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隋唐帝国，都是有缺陷的。

我曾发表《关于隋唐长安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提出我所关心的几个"长安学"研究的方向[1]。碑志资料，为这些思考提供了研究素材。以下主要根据若干年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主持的"隋唐长安读书班"的一些成果，来谈谈我们读书过程中随时所用的碑志材料对长安研究的贡献所在。

一、碑林所存长安碑刻资料的价值

什么是真正的长安文献？当然典籍中有许多写在长安的文章和诏敕，还有一些地理、典章类的书籍，其实都是长安文献。但是，毫无疑义的长安文献，就要属本文所主要论说的长安保存的碑刻和长安周边出土的墓志了。由于碑林的建立，使得隋唐长安的大量碑刻得以保存，这是在中国古代帝都中少见的奇迹。从1087年开始，长安就有

1《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页。已收入本书。

意识地保存本地的碑刻材料了。因为有了碑林，所以此后920年中发现的有关隋唐长安乃至其他时代的重要碑刻、墓志，都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些碑刻，多是当年长安城中重要的政治、文化遗迹，其上记录着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典章制度、文化建设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碑刻的保存，很难想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隋唐长安是什么样子的。

陈忠凯、王其祎、李举纲、岳绍辉编著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已经把碑林现藏的碑志材料做了整理编目，并提示这些碑志原本的所在[1]。我们可以据以把其中的碑志放回到原来隋唐长安城的空间里，再结合碑志所处的原本场景，相关的碑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长安某些局部甚至更大的历史内涵。

有些碑志原石已经不存在了，但有拓本流传下来，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碑志的内容和其规模。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它原本立在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中，这里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全国各地以及周边一些国家的年轻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长安城最有活力的地点之一。但是，我们在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务本坊下面，只读到如下简短的记录："半以西，国子监，监中有孔子庙，贞观四年(630)立。领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这条文字应当是来自韦述在开元十年（722）所撰《两京新记》，很有可能就是《两京新记》的原文。

据《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记载：

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

1　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5月。

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

对于国子监中孔子庙堂的建立，虞世南在《孔子庙堂碑》里也有相关的记录，碑文曰：

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诏立随故绍圣侯孔嗣哲子德伦为褒圣侯，乃命经营，惟新旧址。万雉斯建，百堵皆兴，揆日占星，式规大壮。凤甍骞其特起，龙桷俨以临空。霞入绮寮，日晖丹槛。窅窅崇邃，悠悠虚白。模形写状，妙绝人功。象设已陈，肃焉如在。[2]

可见，孔子庙堂的建造是从武德九年十二月开始经营，贞观二年开始建造，据《长安志》(《两京新记》)，其最后建成的时间是贞观四年[3]。《孔子庙堂碑》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了这个建造过程以及建筑物的精美，所谓“模形写状，妙绝人功”，作为国家太学的主体建筑，当然出自唐朝初年最好的工匠之手。《大唐郊祀录》卷十“文宣王庙”条对孔子庙堂的建筑群也有记载：“其庙屋四柱七间，前面两阶，堂高三尺五寸。宫垣周之。南面一屋三间，外有十戟焉。东面一屋一门。其太学讲论之堂在庙垣之西。”可知国子监孔庙的主殿是由四柱子支撑，面阔七间，高三尺

1 《贞观政要集校》卷七《崇儒学》第二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6页。

2 《全唐文》卷一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5页。

3 关于国子监孔庙的建成年代，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参见高明士《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东亚世界形成史的一侧面》，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第191页；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76页。详细的讨论，参看荒金治的硕士论文《唐初的书法与政治》，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6月。

五寸，前面有两层台阶。此外还有一些辅助建筑，这项工程恐怕不是一两年能够完成的，所以说从武德九年开始筹划，贞观二年开始建造，到四年完成，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孔子庙堂碑》是为了孔子庙堂建成而撰写刻勒上石的，碑文题“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敕撰并书”，而虞世南是贞观四年十一月由著作郎迁秘书少监，所以碑文写于四年十一月之前[1]，与《长安志》的记载相符。前面说过，《长安志》的记载可能就是韦述《两京新记》的原文，韦述或许看见过原本的拓本，上面可能就有“贞观四年”的字样。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条记载：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等，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2]

《唐会要》的记载来自唐朝的官府档案，其中与上引《贞观政要》不同之处，当以《唐会要》为准。两相对比，其中学舍从贞观二年的400余间，到贞观五年以后不久的1 200间，可以看出太宗朝国子监发展的迅速。学生人数8 000多，加上教员，可以说几近万人，规模相当宏阔。

建立孔子庙堂，立《孔子庙堂碑》，让当时最著名的书法家来书写碑文，这是新登基的唐太宗力兴文治的举措之一。碑文云：

握文履度，复见仪形。凤跱龙蹲，犹临咫尺。暟尔微笑，

1 参见内藤乾吉《虞世南について》，《书道全集》七《中国》七《隋·唐》一，东京：平凡社，1955年，第16—20页；外山军治解说《孔子庙堂碑》，见《书道艺术》第3卷《唐太宗·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91页。
2 《唐会要》卷三五《学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9页。

若听武城之弦；怡然动色，似闻箫韶之响。襜襜盛服，既睹仲由；侃侃礼容，仍观卫赐。不疾而速，神其何远？[1]

在这样一个氛围内，虞世南的文章和书法，使耸立在孔子庙堂的这座碑石，一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首先是国子监的教员和学生，然后是京城的文人学士，最后是从各地来的官人、学者，一定都不会放过观瞻、甚至捶拓碑文的机会。据说"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2]。这块碑石因为捶拓过甚，很快就有些模糊不清了，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四月八日，由当时的相王李旦主持，对不清楚的文字做了补刻，但这次补刻的更重要的政治背景，是把碑额改题为"大周孔子庙堂碑"，并且由"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的相王旦亲自书写[3]，表明这座标志着国家教育象征物的政治归属的改变。武周政权虽然很快就完结了，但可能由于这座《孔子庙堂碑》的书法异常珍贵，也由于接下来掌握政权较长时间的玄宗是相王（睿宗）的儿子，所以相王所题的碑额一直没有改动，直到晚唐的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国子祭酒冯审奏："《孔子庙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书额，备称唐德，具赞鸿猷，染翰显然，贞石斯在。洎武后权政，国号僭窃，于篆额中间，谬加'大周'两字。今岂可尚存伪号，以紊清朝，疑误将来，流传僭谬？其'大周'两字，伏望天恩，许令琢去，谨录奏闻。"这一奏请得到宣宗皇帝的准旨，把"大周"两字琢掉[4]。现在我们在碑林中见到的《孔子庙堂碑》是北宋建隆、乾德年间（960—968）模刻的（图33）[5]，其

---

1 《全唐文》卷一三八，第1405页。
2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六，《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第15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 《孔子庙堂碑》相王题名的唐拓本迭经元代周伯琦、李宗瀚等收藏，现藏日本三井氏听冰阁，见《孔子庙堂碑》，东京：二玄社，1988年，第2—3页。
4 《唐会要》卷六六，第1375页。
5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碑额上已没有“大周”字样，应当是晚唐以来的样子。

《孔子庙堂碑》是唐长安城中独立无二的碑刻，它既是国家教育的象征，又标志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动，当然它更是一座书法名碑，是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的杰作。如果我们把《孔子庙堂碑》放在原本的场景下，回溯到原来的历史时空当中，作为长安城的一所“名胜”，它是我们认识唐代长安的珍贵的历史记忆。

二、新出碑志长安资料的价值

这里更加强调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的成就，使我们今天拥有了比此前多了不知多少倍的碑志材料，这些地地道道的长安文献，打破了原本只有靠千唐志斋系统的墓志来找寻长安居民的做法，我们得以根据西安周边出土的墓志，增补大量长安城内居民的确切居住地点，而这里面有着洛阳墓志往往记载不到的皇亲、国戚、勋贵、高道、大德等等，只要我们翻看一下最近出版的李健超先生《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1]，就会发现根据墓志我们今天的认识进步了多少！这些坊里人物及其宅第的记载，借助新出土墓志得以显现，大大超过了徐松《城坊考》的记录，也比李健超先生旧版《增订唐两京城坊考》（1996）增加了大量的内容，为我们研究长安社会历史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解读隋唐长安历史的时候，总希望对于长安城不同区域的居住人群加以分类研究，这种研究如果只靠传统的史料所记载的坊里人物，是完全做不到的。但近年来大量出土并及时出版的墓志和碑刻，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能性。

在我们的“隋唐长安读书班”上，已经就一些问题做过会读，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孙英刚研究王府与政治的关系，关注到中宗、睿宗时期的政治集团的住宅分布和

1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

政治斗争的关系，特别是相王（睿宗）集团的住宅分布和政治的关系问题[1]；蒙曼研究了“唐元功臣集团”的宅第以及后来的龙武军将领的住宅的集中分布与相互通婚问题[2]；毕波对长安粟特胡人居地的分布、来源、身份构成等问题做了仔细的研究[3]；陈昊从墓志材料考察了长安的医疗空间[4]。这些都可以作为利用碑志研究长安不同社会集团的居住社区的很好研究案例。

这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碑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长安志》卷七安仁坊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长安志》这里只是说刘延景和王昕都是亲王的外家，两家人的豪宅并列而立，为京城人所羡慕。其实，这两户人家为什么并列居住在一起，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据《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记：“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刑部尚书德威之孙也，父延景，陕州刺史。景云元年（710），追赠尚书左仆射，沛国公。仪凤中（676—679），睿宗居藩，纳为孺人，寻立为妃。生宁王宪，寿昌、代国二公主。文明元年（684），睿宗即位，册为皇后，及降为皇嗣后，从降为妃。长寿中（692—694），与昭成皇后同被谴，为则天所杀。景云元年，追谥肃明皇后，招魂葬于东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迁祔桥陵。”可知刘延景是让皇帝宁王李宪的生母、后来睿宗的肃明皇后刘氏的父亲，即所谓外祖。《金石录》卷五第891条即《唐左仆射刘

1 孙英刚《隋唐王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3年6月。又参见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5—214页。
2 蒙曼《开天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团》，《文史》2001年第4辑，第95—118页。又见以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所写的专著《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
4 陈昊《隋唐长安的医疗和社会空间》，2007年“隋唐长安读书班”报告，待刊稿。

延景碑》，徐彦伯撰，张庭珪八分书，景云二年（711）二月。

又按延景父刘德威，《旧唐书》卷七七有传，父子将。德威先娶郑氏，生审礼；郑氏卒，续娶平寿县主，生延景。《刘德威传》附《刘审礼传》称：审礼“抚继母男延景，友爱甚笃，所得禄俸，皆送母处，以资延景之费；而审礼妻子处饥寒，晏然未尝介意。再从同居，家无异爨，合门二百余口，人无间言”。可知刘审礼与刘德威是同父异母兄弟。

孙英刚已经注意到，《旧唐书·刘审礼传》记审礼参加平定徐敬业叛乱后，“竟以裴炎近亲，不得叙功，迁位梓州长史”。只是说刘审礼为裴炎近亲，但语焉不详。然而据《大唐监察御史裴炎故妻刘氏墓志铭》记：“夫人讳□□，……曾祖轸，齐谏议大夫、高平太守。祖子将，齐和州刺史。……父德敏，见任潭州都督、望都县开国公。……夫人，公之第三女也。……唐显庆五年（660）正月廿六日，卒于兴道坊之第。”[1]裴炎妻刘氏曾祖轸、祖子将、父德敏，而《旧唐书·刘德威传》记其父名子将，可见刘德威与刘德敏为兄弟，所以刘审礼与裴炎之妻刘氏当为同胞兄妹或姐弟。又，刘德威子刘延景；而刘延景女为相王妃。所以裴炎在妻族的亲戚关系上，与相王有很密切的联系，因此才不得叙用[2]。

此外，《鸿胪少卿阳济故夫人彭城县君刘氏墓志铭并序》云：“汉高贵胄，楚元良裔。赫奕蝉联，为世大族。曾祖延景，皇银青光禄大夫、陕州刺史、赠开府左仆射、沛国公。祖瑗，金紫光禄大夫、国子祭酒。老姑，肃明皇后。……父为辅，皇朝朝散大夫、歧州司马。……夫人歧州第二女也。君子好逑，作嫔阳氏。建中二年（781）十月二十一日，寝疾终于安仁里私第，春秋四十。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归葬河洛旧茔。”[3]阳济夫人刘氏的祖父刘瑗，就是

1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8页。按，刘氏墓志1989年8月于西安市雁塔区裴家孔村征集，见《文博》1992年第5期。
2 孙英刚《隋唐王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3年6月。
3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肃明皇后的兄弟，这条材料说明，刘延景在安仁坊的宅第，大概一直由其后人继承下来，直到建中二年时，还为刘家所有，阳济夫人刘氏于此寝疾而终，大概是正好在娘家的缘故。

下面我们再看王昕的关系网。据《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让皇帝宪传》：让皇帝宪是睿宗长子。“宪于胜业东南角赐宅，申王捴、岐王范于安兴坊东南赐宅，薛王业于胜业西北角赐宅，邸第相望，环于宫侧。”又，同书《睿宗诸子传·惠宣太子业传》记：薛王业是睿宗第五子。“初，业母早终，从母贤妃亲鞠养之。”

1976年，陕西蒲城县文化馆抢救性发掘了陪葬于睿宗桥陵的贤妃墓。2003年，该馆孙怀彦、李百福发表了当时所得《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贤妃王氏墓志》（图34），为我们了解王昕作为薛王业之舅的关系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墓志云：“贤妃讳芳媚，太原祁人也。……国子司业、郑州刺史讳思泰之孙，司封郎中、润州刺史、赠益州大都督薛国公讳美畅之中女也。……初，妃伯姊以才淑选为安国相王德妃，生薛王。光宅三载（686）中，贤妃复有诏征入。……开元廿二年（734），薛王薨，诏赠惠宣太子，贤妃昼夜号哭，感动人神。……初，惠宣之生也，数岁而德妃薨，睿宗怜之，以贤妃慈爱，又其姨也，乃命母养，于是勤身苦体，尽心鞠育。惠宣亦至性过人，敬爱如子。”[1]贤妃以天宝四年（745）八月八日薨，陪葬桥陵。由此可见，睿宗为相王时，王美畅两女先后入为王妃，其长女封德妃，生薛王业之后几年即卒，于是贤妃王芳媚以姨的身份，作为继母来养育薛王，薛王也把贤妃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昕即为薛王业之舅，则与德妃、贤妃同辈。据《大周故润州刺史王美畅夫人故长孙氏墓志》，王美畅卒于

---

1 孙怀彦、李百福《唐桥陵陪葬墓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考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61—62、68页；樊英民《王芳媚墓志录文勘误》，《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第57、62页。

圣历元年（698），长孙氏卒于大足元年（701），志文中只提到“子昕等”[1]，推测王昕为长子，之所以没有提及德、贤二妃，估计和当时相王被武后幽闭的处境有关。王昕的父母没有等到睿宗即位就先后去世，所以受惠的成为王昕，也就是德妃、贤妃的哥哥，而实际上起作用的，应当是贤妃王芳媚。从王氏与睿宗的婚姻关系来看，王昕也应当是睿宗一系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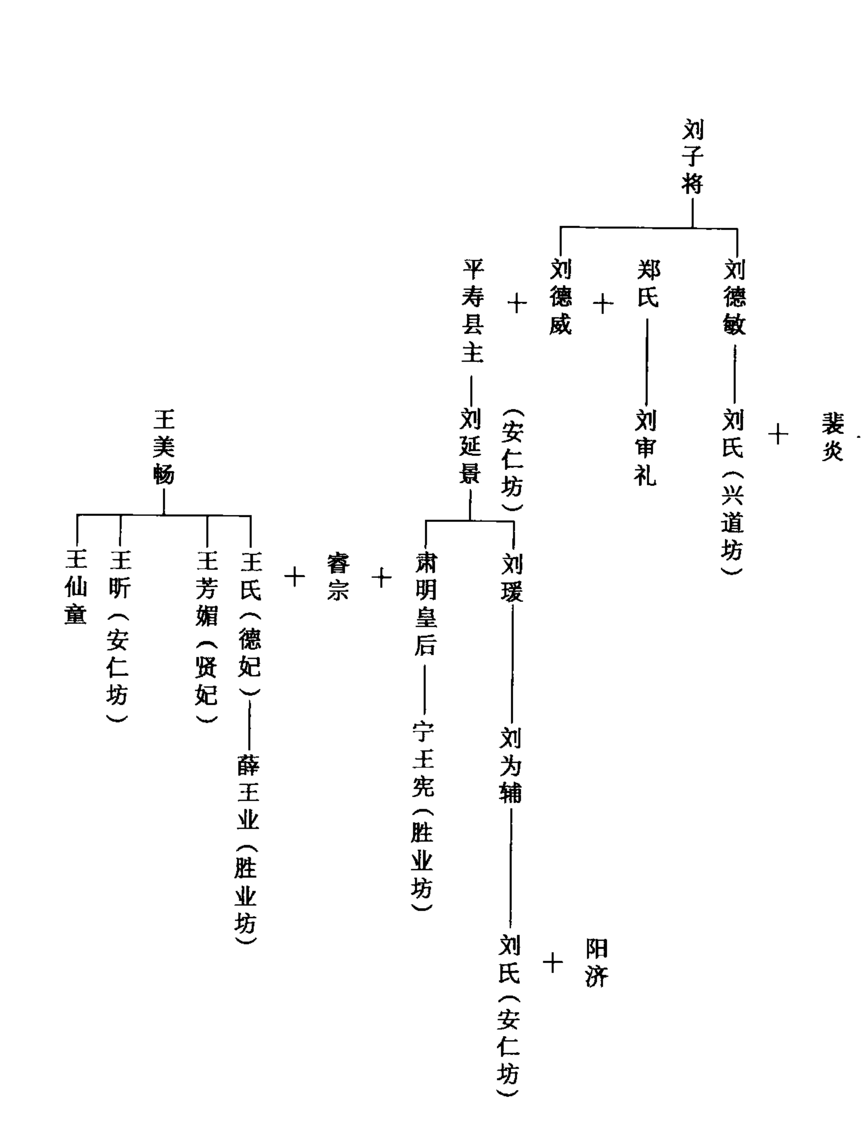
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714）正月条记载：“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上从之。由是贵戚束手。”这个王仙童也是薛王业的舅舅，贤妃王芳媚的兄弟。

我们把围绕相王（睿宗）的上述刘氏、王氏的关系表述如下页表。

由此可见，刘延景与王昕作为睿宗一系的外家，在开元十年（722）韦述撰写《两京新记》时正是最红火的时候，所以“甲第并列，京城美之”。《长安志》称刘延景为“赠尚书左仆射”，因为其卒于景云元年（710）；而称王昕为“汝州刺史”，则应当仍然在世。其注文提到宁王宪和薛王业，他们在开元十年时都还在世。因此，从《长安志》保留的称谓情况看，这段记载从正文到注文，也都应当是韦述开元十年所撰《两京新记》的文字。

新出土墓志填补了传统史料的一些空白点，让我们了解到追随相王（睿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他们的住宅——安仁坊和兴道坊，中间只隔一坊，位于宫城南面、朱雀门大街东侧的重要地理位置上，他们的宅第与宁王、薛王所居住的胜业坊，距离也不太远，容易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政治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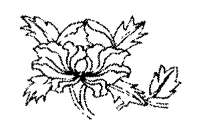
1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29—1030页。


刘子将
刘德敏
郑氏
刘德威
平寿县主
刘氏（兴道坊）
裴炎
刘审礼
（安仁坊）
刘延景
刘瑗
刘为辅
刘氏（安仁坊）
阳济
肃明皇后
宁王宪（胜业坊）
睿宗
王美畅
王氏（德妃）
薛王业（胜业坊）
王芳媚（贤妃）
王昕（安仁坊）
王仙童

总之，正像敦煌写本图录在最近20年才陆续出版一样，大量西安地区出土的碑志资料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发掘、整理、校录、考释出来，为今后“长安学”的研究，奉献丰富多彩的资料。我们在阅读理解已刊碑志的同时，也在翘首盼望更多的有关隋唐长安的碑志材料尽早发现。

此文系在2007年10月24日纪念西安碑林920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基础上改订而成，2008年3月3日改定，原载《纪念西安碑林920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6—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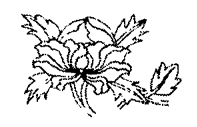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荣新江，1960年生，河北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毕业留校，现为北大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1984—1985年在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进修学习，并走访英、法、德、丹麦、瑞典，收集敦煌、新疆出土文献。主要研究敦煌学、中外关系史、隋唐五代史、西域史，先后在日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OAS, Free University Berlin）、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Paris）、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东洋文库访问研究或任客座教授，并调查海外所藏中国文献。同时经常考察新疆、甘肃古代遗址，做田野调查或带学生参观学习。参加各种国内外学术讨论会，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亦曾主持有关唐宋妇女史、佛教物质文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与研究、粟特人在中国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论文二三百篇，主编大型学术刊物《唐研究》（已刊15卷）及专题论文集数种，

并兼任《敦煌吐鲁番研究》、《西域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等刊物编委。先后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古代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学导论”、“汉唐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隋唐要籍选读”、“隋唐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隋唐长安研究”等课程。近年主要研究中古中国的外来文明，关注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整理吐鲁番文书，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隋唐长安，等等。曾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奖，被评为北大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部属院校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图版目录



著述年表



1.《于阗史丛考》（与张广达合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12月。
2.《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S.6981－1367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
3.《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与姜伯勤、项楚合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7月。
4.（主编）《唐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5.（副主编）《英藏敦煌文献》第12—1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6.《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
7.《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
8.（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
9.（主编）《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10.《敦博本禅籍录校》（与邓文宽合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11.（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

12. 《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9月。

13. （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4. （翻译）梅维恒《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与王邦维、钱文忠合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6月。

15. （主编）《唐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16. 《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

17.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2月。

18. （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

19. （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与朱玉麒合作），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4月。

20. 《敦煌学新论》（敦煌学研究丛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21. （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22. （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23. （副主编）《唐宋妇女与社会》（《北京大学盛唐研究丛书》），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

24. （主编）《唐研究》第9卷“长安：社会生活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

25.（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与李孝聪合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

26.（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与张志清合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

27.（主编）《唐研究》第10卷“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28.《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9.（主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与华澜、张志清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30.（主编）《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与邓小南合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31.（主编）《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32.（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33.（主编）《唐研究》第13卷“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与侯旭东合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34.（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李肖、孟宪实合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4月。

35.《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与张广达合著）（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36.（主编）《唐研究》第14卷“《天圣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与社会研究专号”（与刘后滨合编），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37. （主编）《唐研究》第15卷“长安学”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38. 《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

39. （编）《向达先生敦煌遗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3月。